

# 尝试集·尝试后集

胡 适 著  
陈平原 导读

贵 州 教 育 出 版 社

“20 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丛书

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持

丛书主编/陈平原

丛书编委/孙玉石 钱理群 洪子诚 葛兆光

王守常 陈平原 朱正琳

出版统筹/朱正琳 奚晓青

装帧设计/曹琼德

责任编辑/卓守忠

《尝试集》和《尝试后集》的版权  
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授予

此书受 2001 年贵州出版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资 助

## 总 序

为刚刚逝去的“20 世纪”作总结，似乎是今日中国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崛起于艰难之际、致力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人来说，20 世纪既灾难深重，又生机勃勃。时过境迁，不管是“灾难”还是“生机”，其蕴涵的酸甜苦辣，都将成为后人咀嚼回味的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遗产”。

面对如此波澜壮阔的“大时代”，阅读者最好心存敬畏。不要说风和日丽，即使是斜阳余晖，也都值得论者认真鉴赏与品味。有感于此，本丛书不取大刀阔斧放言高论的姿态，而宁愿“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似乎有必要提醒笃信“进化”的国人，略为调整视线，俯下身来，流连身边的风景。对于有心人来说，一枝一叶总关情，细微处，同样可以见精神。不妨借助一本本曾经激动过一个时代的书籍的重新阅读，触摸那很可能早就被历史的风沙抹平的精神印记，体会先辈们蹒跚的足迹。

相对于有形的政治、经济乃至学术、文化的成果，一代人的“精神遗传”显得不太张扬，故很难被心境浮躁的后来者所感知。重读“旧书”，我们不只可以了解曾经有过的知识、信仰、理想，乃至具体而微的心境，更可以通过其在历史上的“存在与遗失”，理解风光无限且变动不居的世界。

与一般意义上的遴选“经典”不同，本丛书关注的是几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故必然跨越具体的学科限制，且兼及著译与雅俗。

选书的标准,在于当时以及后世的“影响力”,而不问是否“藏诸名山,传之后世”。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影响力可能迅速消失,也可能与日俱增,更可能时起时伏。描述如此奇妙的“书的命运”,并给予恰当而深入的解读,对于测量一个时代的思想深度与文化走向来说,也许是很好的入口处。

这里有政治家的宏愿、思想家的深思、学问家的博识、文学家的激情,以及普通人的常识与悲哀。不管是哪一类,希望均有值得述说的“接受的故事”。也就是说,书本身的魅力固然重要,可那留在历史上的“长长的影子”,同样令人怦然心动。

与书斋里的宏论不同,本丛书希望沟通专家常识与大众趣味,借“读书”回顾先辈的足迹,丰富当代人的精神感受与历史意识,故关键在于“同情之理解”,而不是判断与裁定。具体的工作策略是:将书籍本身的评介与“接受史”的叙述融为一体,并掺入个人的阅读体验。假如撰写导读的专家们之“生花妙笔”能勾起大众的阅读兴趣,使“旧书”介入“新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则功莫大焉。说到底,书,并非越新越好;人,也不一定越活越精神。这才有必要不时地回顾历史——包括阅读并未完全过时的好书。

理论上,只要是真正激动过一个时代的著作,都有可能进入我们“重新阅读”的视野。可在具体操作中,却因某种难以逾越的障碍,不能不略有回避。另外,虽然丛书的选目已经大致确定,但考虑到各位专家的写作进度,出版时无法完全依照原作的年代排列。这两点,敬请读者原谅。

本丛书作为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的项目,并不划地自牢,而是期待更多学界朋友与我们携手,借助“读书”,重新理解并阐释 20 世纪中国人并非贫瘠的精神生活。

丛书主编 陈平原

1999 年 12 月 14 日

## 目 录

导读 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 .....	陈平原(1)
-----------------------------------	--------

## 尝 试 集

五年八月四日答任叔永书(代序一) .....	(67)
尝试篇(代序二) .....	(68)
四版自序 .....	(69)

## 第一编

蝴蝶 .....	(73)
赠朱经农 .....	(74)
中秋 .....	(76)
江上 .....	(77)
黄克强先生哀辞 .....	(78)
十二月五夜月 .....	(79)
沁园春·二十五岁生日自寿 .....	(80)
病中得冬秀书 .....	(81)
“赫贞旦”答叔永 .....	(82)
生查子 .....	(83)
景不徙篇 .....	(84)
朋友篇(寄怡荪、经农) .....	(85)
文学篇(别叔永、杏佛、颢庄) .....	(86)

百字令(六年七月三夜,太平洋舟中,见月,有怀。)	(88)
--------------------------	------

## 第二编

鸽子	(90)
老鸦	(91)
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	(92)
新婚杂诗(五首存一首)	(93)
老洛伯	(94)
你莫忘记	(99)
如梦令	(100)
十二月一日奔丧到家	(101)
关不住了!	(102)
希望	(103)
“应该”	(104)
一颗星儿	(105)
威权	(106)
小诗	(107)
乐观	(108)
上山	(110)
一颗遭劫的星	(112)

## 第三编

许怡荪	(115)
一笑	(117)
我们三个朋友	(118)
湖上	(120)
艺术	(121)
例外	(122)



梦与诗 .....	( 123 )
礼！ .....	( 124 )
十一月二十四夜 .....	( 125 )
我们的双生日( 赠冬秀 ) .....	( 126 )
醉与爱 .....	( 127 )
平民学校校歌 .....	( 128 )
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 附萧友梅先生作的谱 ) .....	( 130 )
死者 .....	( 133 )
双十节的鬼歌 .....	( 134 )
希望 .....	( 136 )
晨星篇( 送叔永、莎菲到南京 ) .....	( 137 )

## 附录 :法国集

自序 .....	( 140 )
耶稣诞节歌 .....	( 141 )
大雪放歌 .....	( 142 )
久雪后大风寒甚作歌 .....	( 143 )
哀希腊歌 .....	( 144 )
自杀篇 .....	( 158 )
老树行 .....	( 160 )
满庭芳 .....	( 162 )
临江仙 .....	( 163 )
将去绮色佳 叔永以诗赠别。作此奉和 即以留别。 .....	( 164 )
沁园春·别杨杏佛 .....	( 165 )
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 .....	( 166 )
相思 .....	( 168 )
秋声 .....	( 169 )

秋柳 .....	( 171 )
沁园春·誓诗 .....	( 172 )
《尝试集》序( 钱玄同 ) .....	( 173 )
《尝试集》自序 .....	( 182 )
《尝试集》再版自序 .....	( 196 )

## 尝 试 后 集

题辞 .....	( 204 )
大明湖 .....	( 205 )
回向 .....	( 206 )
烟霞洞 .....	( 207 )
秘魔崖月夜 .....	( 208 )
小诗 .....	( 209 )
江城子 .....	( 210 )
鹊桥仙·七夕 .....	( 211 )
多谢 .....	( 212 )
译白郎宁的《清晨的分别》 .....	( 213 )
译白郎宁的《你总有爱我的一天》 .....	( 214 )
一个人的话 .....	( 216 )
瓶花 .....	( 217 )
译葛德的 Harfenspieler .....	( 218 )
也是微云 .....	( 220 )
生疏 .....	( 221 )
素斐 .....	( 222 )
旧梦 .....	( 223 )
陶渊明和他的五柳 .....	( 224 )
拟中国科学社的社歌 .....	( 225 )

三年不见他(十八年一月重到北大).....	( 227 )
高梦旦先生六十岁生日 .....	( 228 )
中国公学运动会歌 .....	( 229 )
祝马君武先生五十生日 .....	( 230 )
送唐瑛女士扇子 .....	( 231 )
夜坐 .....	( 232 )
十月九夜在西山 .....	( 233 )
怎么好? .....	( 234 )
狮子(悼志摩).....	( 236 )
读了鹫峰寺的新旧碑记,敬题小诗,呈主人林行规先生 .....	( 237 )
戏和周启明打油诗 .....	( 238 )
飞行小赞 .....	( 239 )
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 公墓碑 .....	( 240 )
大青山公墓碑 .....	( 242 )
哭丁在君 .....	( 243 )
无心肝的月亮 .....	( 244 )
扔了? .....	( 245 )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从神户到东京,道中望富士山 .....	( 246 )
廿六年七月廿三日是高梦旦先生周年忌日,我在庐山 上作此诗寄慰君珊、仲洽 .....	( 247 )
从纽约省会(Albany)回纽约市 .....	( 248 )
寄给在北平的一个朋友 .....	( 249 )
追哭徐新六 .....	( 250 )
抄新六遗书三篇,题此诗 .....	( 251 )
题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给陈光甫 .....	( 252 )
一枝箭,一只曲子 .....	( 253 )
谈谈“胡适之体”的诗 .....	( 255 )

# 导读 :经典是怎样形成的

——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

陈平原

中文的“经典”与英文的“CANON”，都是相当郑重的字眼。除了泛指各宗教宣传教义的根本性著作，还指向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述；其作用，不只因自身具有长久的阅读或研究价值，还可作为同类书籍的标准与典范。因此，一时代的精神价值与文化取向，往往依靠其产生的“经典著作”来呈现。

承认每个时代每个民族甚至每个专业领域都可能为人类历史奉献自己的“经典著作”，如此开放的期待视野，无形中大大扩展了“经典”的队伍。基本含义没变，可遴选的标准却大为降低。在宽容的现代人眼中，“经典”可以是临时性的——只要为一时代的读者广泛认可，即不妨冠以此称。这个意义上的“经典”，当然不像《论语》或《圣经》那样“坚不可摧”，而是需要在历史长河中，经由一系列的沉浮，再最终确定其地位。放眼望去，你会发现，同是“经典”，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两千年，年纪大小与含金量的高低基本上成正比。两千年前的“经典”，也会面临阴晴圆缺，但有朝一日完全被遗忘的可能性不大；反过来，二十年前的“经典”，则随时可能因时势迁移而遭淘汰出局。

一部作品之成为“经典”，除了自身的资质，还需要历史机遇，需要时间淘洗，需要阐释者的高瞻远瞩，更需要广大读者的积极参与。着眼于长时段者，往往强调历史是公正的；可在中、短时段的

视野中,经典的筛选,不可避免为政治、文化、性别、种族等偏见所左右。充当伯乐的,或许只是一时冲动;随声附和者,也未见得真的十分喜欢。可声势一旦形成,将信将疑的读者,便都不敢公开挑战已成定见的“社会共识”。只是到了“忽喇喇大厦将倾”,才会腾起钱塘江大潮般的批评声浪。如此说来,历史判断的“公正性”,并非毋庸置疑。

质疑“经典”一词的含义,或者追究某部作品是否浪得虚名,在我看来,都不如探究“经典是怎样形成的”有意思。因为不管人们如何事后诸葛亮,嘲笑当初并不明智的选择;可一部经典之得以确立,必定有其值得认真辨析的“机缘”。而对于解读一时代的文化趣味,这是个绝好的切入角度。

何为经典,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读者,很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答复。在文化价值日趋多元的今日,要想推举众口一词的经典之作,实在是难于上青天。远的还好说,比如评选唐诗宋词;近的可就麻烦多多了,比如谈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想想谢冕等先生主编那两套关于百年中国的“文学经典”所激起的“公愤”<sup>①</sup>,就不难明白其中奥秘。独断之学行不通,于是退而求其次,有了广泛征求意见、由若干著名作家和学者投票确定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sup>②</sup>。比起“文学经典”来,“优秀图书”的命名,未免过于平实,在众多“世纪末大餐”面前,显得很不起眼。平静过关固然是好事,可回避了极易引起争议的“经典是怎样形成的”,还是有点可惜。

我之关注此话题,基于一个基本事实:为何世纪末大结账,没

---

① 参见《文艺报》1997年9月27日第二版《经典,失去共识——关于两部“百年经典”的讨论》所收阎晶明、李杜、韩石山三文。

② 参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8月18日第一版《文学殿堂开摆世纪胜宴:“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评选揭晓》。

有名篇入选《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的诗人胡适<sup>①</sup>,其《尝试集》竟成了“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不是评价尺度宽紧的问题,也并非评选者不同导致的偏差,作为新诗人的胡适,有名著而无名篇,此乃目前中国学界的主流意见。已经几起几落的《尝试集》,目前虽然没有多少读者,可史家就是不敢遗忘。这里涉及两种不同意义的“经典”,一是历久弥新,青春常在,依旧介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一是事过境迁,隐入背景,但作为里程碑永远存在。《尝试集》无疑属于后者。

我要追问的是,像《尝试集》这样的作品,确立其“经典”地位的,除了人所共知的历史机遇与大师推举,还有没有别的因素。比如,作者本人的努力、同道的支持以及制度的保证,是否也是重要的因素?如此立说,很大程度并非缘于理论推导,而是胡适《尝试集》删改底本的发现,使我们得以在一窥庐山真面目的同时,反省“经典是怎样形成的”这样有趣而又不大容易说清楚的命题。

## 一、删诗事件

无论你站在什么文化立场,谈论现代中国“新诗的奠基”,总无法回避胡适的《尝试集》。只是当论者淋漓尽致地褒贬抑扬时,往往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细节,即通行本的《尝试集》(增订四版),并非只是胡适个人心血的凝聚。这部前无古人的新诗集,1920年3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推出后,当即风行海内,两年间增订两次,销售万册。为使其能够更长久地领异标新,诗人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将其删繁就简。另外,又补充了若干广受好评的新作,并认真撰写了四版自序。在这一借“删诗”确立权威性的过程中,鲁迅等同好

---

<sup>①</sup> 谢冕、钱理群编《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927年前部分有作品入选的新诗人包括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朱湘、冯至等五位。

的介入,不无“锦上添花”的意味。

鲁迅、周作人等曾为胡适删诗,此事即便算不上“路人皆知”,也绝不是什么文坛秘密。因为此等雅事,搁在“我的朋友胡适之”那里,不可能藏而不露。果不其然,在《尝试集 四版自序》中,就有如下详尽的表述:

删诗的事,起于民国九年的年底。当时我自己删了一遍,把删剩的本子,送给任叔永、陈莎菲,请他们再删一遍。后来又送给“鲁迅”先生删一遍。那时周作人先生病在医院里,他也替我删一遍。后来俞平伯来北京,我又请他删一遍。他们删过之后,我自己又仔细看了好几遍,又删去了几首,同时却也保留了一两首他们主张删去的。<sup>①</sup>

胡适大举宣传的“删诗事件”,很可惜,在周氏兄弟的日记及书信集,竟没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弟弟好说,这段时间刚好生病,五个月没记日记<sup>②</sup>;哥哥呢,日记在,可就是不提。这也难怪,鲁迅记日记历来十分简要,不像李慈铭、胡适等之喜欢抄上谕、贴剪报,将日记作为著述来经营。可还是有例外,比如此前几天复胡适关于《新青年》编辑方针信,日记中便有记载<sup>③</sup>。

尽管在《尝试集》的初版、再版和四版自序中,胡适一再声称自

① 胡适《尝试集 四版自序》《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10月增订四版。

② 《周作人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一三五节“在病院中”提及,1920年12月22日赴北大参加歌谣研究会,五时散会,感觉疲倦,两天后发烧,被诊断为肋膜炎,在家养病期间写过半篇论文,还有新诗《过去的生命》。回忆如此详尽,因有日记可供查考。查已出版的《周作人日记》(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1921年1月“六日,晴,山本来诊”后有言:“以下因病未记,凡五个月,今撮要记之如左。”至6月前仅寥寥四则,自不会涉及为胡适删诗一类琐事。

③ 《鲁迅日记》1921年1月3日:“午后得胡适之信,即复。”见《鲁迅全集》第十四卷40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己的诗集只是“代表‘实验的精神’”<sup>①</sup>、“含有点历史的兴趣”<sup>②</sup>、“可以使人知道缠脚的人放脚的痛苦”<sup>③</sup>,似乎自视不高。可如果只是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尝试集》根本用不着、也不应该一改再改。仔细品味,你会发现,适之先生表面上很谦卑,但一再修订旧作,而且邀请当世名家帮助“删诗”,实际上隐含了对于自家诗集的历史定位:不满足于“开创之功”,因而必须苦心经营其“经典之作”。

关于《尝试集》,胡适有过许多“戏台里喝彩”,从具体诗作的品鉴,到“个人主张文学革命的小史”的述说,再到“胡适之体”的阐释<sup>④</sup>。作为潜心“尝试”白话诗写作的适之先生,精益求精固然值得钦佩,有点功名心也完全可以理解。在此“制作经典”的过程中,最令人惊讶的举动,还是邀请五位当世名流为其“删诗”。

诗人有权随时随地修改自家的创作,至于请别人为一部已经名满天下的诗集“动手术”,则是另一回事。不管诗人态度如何谦虚,读者都会联想到对于中国人来说再熟悉不过的孔子删《诗》之说。据《史记·孔子世家》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凡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删《诗》的真伪与是非,后世不无争议,但毕竟以相信司马迁所言者为多。胡适并未做直接的比附,但潜意识里,“删诗”乃“确立经典”的必要程序,有“历史癖”的适之先生,应该明白此中奥妙。

二十年代初的中国诗坛,开始白话诗评选,当即面临如何建立评选者权威的大问题。这时候,不约而同的,都想到了遥远的孔子

① 胡适《尝试集 自序》《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3月。

② 胡适《尝试集 再版自序》《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9月。

③ 胡适《尝试集 四版自序》。

④ 参见《尝试集》初版、再版和四版的自序,以及《谈谈“胡适之体”的诗》(《自由评论》12期,1936年2月)。



删《诗》。先是 1920 年 8 月崇文书局推出许德邻所编《分类白话诗选》,节录刘半农半篇文章为序。刘文原题为《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刊《新青年》3 卷 5 号,其中有云:

然而三千篇“诗”,被孔丘删剩了三百十一篇。其余二千六百八十九篇中,尽有绝妙的“国风”,这老头儿糊糊涂涂,用了那极不确当的“思无邪”的眼光,将他一概抹杀,简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罪人了。<sup>①</sup>

紧随其后,与胡适关系十分密切的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新诗年选》,北社同人在《新诗年选·弁言》中也提到了孔子删《诗》,不过态度与刘半农迥异:

自从孔子删《诗》,为诗选之祖,而我们得从二千年后,读其诗想见二千年前的社会情形。中国新文学自“五四”运动而大昌,凡一切制度文物都得要随世界潮流激变,今人要采风,后人要考古,都有赖乎征诗。<sup>②</sup>

不管是“分类”还是“年选”,既是筛选与淘汰,就不能不带有明显的“暴力倾向”。比附往昔孔圣人之删《诗》,无论其立论方式为赞赏抑或反驳,都是为了确立批评的标准与选本的权威。

与《分类白话诗选》和《新诗年选》的编者独掌生杀大权不同,胡适反而邀请众友人来为自家已经出版并广获好评的《尝试集》大手术。此举之异乎常情,迫使你作多种方式的解读。诗人之所以如此独辟蹊径,到底是希望依靠友人的准确判断,为读者提供更加精粹的选本,还是希望借助友人的巨大声望,为读者提供更加权威的诗集?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当事人的动机不必过于追究,需要关注的是,此举所达成的良好效果——即促成了该诗集经典地位的确立。

① 参见许德邻编《分类白话诗选》(崇文书局,1920年8月)所收刘半农序言。

② 北社同人《新诗年选·弁言》《新诗年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

在“确立经典”这个意义上，“删诗”所涉及的，远不只是诗人本身，还包括第一代白话诗人的审美眼光、新诗发展的趋向、白话诗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等饶有趣味的问题。解读此非同寻常的“删诗事件”，单靠《尝试集 四版自序》的简要介绍，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因为这只是一面之词，胡适对他人意见的转述是否准确，有无隐瞒或曲解，还有，删改的理由何在，全都不得而知。

一个偶然的机缘——北京大学图书馆新发现一批胡适遗物，其中包括当年删诗的底本，以及周氏兄弟的来信——使得揭穿谜底成为可能。本文先对新发现的史料略做介绍，再从不同侧面逐一钩稽，力图较为全面地展现这一新诗经典产生的过程。

北大图书馆新发现的《尝试集》删改本，系以1920年9月再版本做底本，封面上有如下三处或红或黑的题签：

“九，十二，廿四，用红笔删改一过。”

“十，一，一，用墨笔又删去两首。”

“叔永，莎菲，豫才，启明各删定一遍。”

数目字表示两次删改的时间，即民国九年十二月廿四日和民国十年一月一日。叔永等四人竖排并列，加一大括号，表明全都参与；本文改为横排，只好依适之先生习惯，添上三个逗号。其余的标点，均属原有。如此密集的逗号、句号，可见胡适“尝试”白话以及标点符号之信心是何等坚定。

目录页上，布满大大小小的红圈、黑圈，有代表胡适本人意见的，也有莎菲（陈衡哲）、叔永（任鸿隽）等的选择。如果众人判断分歧，胡适还会将各方意见逐一抄录，以供参考。如《蔚蓝的天上》后便有附注：“豫才删，启明以为可存。莎菲删，叔永以为可删。”目录页后面，抄录了准备补进第四版的十五首新作的篇目。初版便有的钱玄同序和作者自序，则被用红笔一笔勾销。至于正文中的若干铅笔批注（据目录页上的说明，此乃陈衡哲的手笔），以及被红笔圈掉但又“失而复得”的篇作，将在具体论述时提及。

目录上,贴一小纸片,上写俞平伯的删改意见,系胡适的笔迹。估计俞氏只是口头表述,没有留下文字材料,故意见虽明确,但“不成体统”。归纳起来是,建议删去《虞美人》、《江上》、《寒江》、《一念》、《送叔永》、《我的儿子》、《蔚蓝的天上》;主张保留《鸽子》、《看花》和《示威》。

最令人兴奋的是,目录页前,还粘贴着两封信,一署“树”,一署“周作人”。前者仅一纸,用的是“绍兴府中学堂试卷”纸,乃鲁迅笔迹无疑。后者共两页,系普通的八行笺,目前无法判断何人代笔<sup>①</sup>。

也就是说,应邀为胡适删诗的五位朋友<sup>②</sup>,都在此藏本上留下了深浅不同的痕迹。至于对胡适删诗有影响的,起码还得算上此前为其作序的钱玄同、大加讥讽的胡先骕,以及诸多书评的作者。所有这些,都为后人进一步的钩稽与阐发,提供了可能性。白话诗“奠基之作”的最终刊定,得到诸多时贤的襄助,这件事本身就耐人寻味。更何况“删诗”史料的发现,对于理解第一代白话诗人的趣味,是不可多得的机遇。因此,事虽不大,可说的话却不少。

大概是觉得白话诗的“尝试”已经过了争论期,以后当是如何“精益求精”的问题。定本《尝试集》删去颇有提倡之功的钱玄同序,对胡先骕的批评也只用戏谑的口吻轻松地打发。本文尊重胡适的选择,先围绕《尝试集 四版自序》提及的任、陈、康、俞以及两周的意见展开论述,最后落实胡适的自我调整以及经典的形成过程时,方才牵涉钱玄同、胡先骕等人的褒贬文章。

---

① 参见2000年10期《鲁迅研究月刊》所刊鲁迅、周作人致胡适信手迹以及陈平原《鲁迅为胡适删诗信件地发现》一文。

② 主动来信的康白情,虽不在“应邀”之列,其意见也受到胡适的充分重视,故一并论述。

## 二、老朋友的意见

增订四版《尝试集》前,冠有胡适 1916 年 8 月 4 日答叔永书。以早年书札作为“代序一”,这既体现适之先生“历史进化”的眼光,也可看出其对老朋友的尊重。因此,请留美时期的诗友、归国后仍过从甚密的任鸿隽、陈衡哲夫妇为其“删诗”,自在情理之中。

不必做复杂的历史考证,单是翻看《尝试集》,也能感觉到胡适与任、陈夫妇的交情非同一般。诗题中有《“赫贞旦”答叔永》、《送叔永回四川》、《将去绮色佳,叔永以诗赠别,作此奉和,即以留别》,还有副题“别叔永、杏佛、颢庄”的《文学篇》、副题“送叔永、莎菲到南京”的《晨星篇》,以及注明“赠任叔永与陈莎菲”的《我们三个朋友》。更直接的证据来自《文学篇》的“小序”：“若无叔永、杏佛,定无《去国集》。若无叔永、颢庄,定无《尝试集》。”

关于任鸿隽等人如何促成胡适的白话诗尝试,从 1919 年 8 月的《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尝试集 自序》<sup>①</sup>,到 1933 年底撰写的《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sup>②</sup>,再到五十年代的《胡适口述自传》<sup>③</sup>,经由胡适本人的再三追忆与阐发,连一般读者都已耳熟能详。值得注意的是,在白话诗写作的“尝试”中,任君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同志”,而是“论敌”。

正是绮色佳时代的诗友任叔永的反讽与戏拟,促使胡适发誓从三事入手进行“文学革命”,甚至填了那首气魄非凡的《沁园春·

① 胡适《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尝试集 自序》,《新青年》6 卷 5 号,1919 年 10 月。

② 此文初刊《东方杂志》第 31 卷 1 期(1934 年 1 月),后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广为流传,对新文学史的编纂影响极大。

③ 参见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第七章“文学革命的结胎时期”,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 年。

誓诗》：

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擎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  
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  
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至于“《尝试集》的近因”，据说也是由叔永的批评引起的。胡适在答书中称：“倘数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前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而行。”<sup>①</sup>在胡适的眼中，老朋友任鸿隽的挑剔、反驳乃至讥笑，乃是其从事白话诗‘实验’的一大动力。

这一“千里走单骑”的传奇故事，基本上出自胡适本人的自述。如此叙说，是否有贬低友人、拔高自己之嫌？看看任君的回应文字，不难明白。1919年10月30日，任鸿隽致信胡适，称其读了刊于《新青年》6卷5号上的《尝试集 自序》后：“差不多要愧汗浹背了”：

我所愧的，并不是我和你那些议论，正是我那几首旧  
诗，因为我的诗原来是不敢拜客的。<sup>②</sup>

也就是说，任君不想附会时尚，对于自家当初之反对白话诗，并无丝毫悔改的意思。实际上，此前一年，任还在给胡的信中，挖苦《新青年》之所以刊载白话诗，乃是因制作方便：“在无诗可登时，可站在机器旁立刻作几十首”。至于让胡适大喜过望的支持其文学革命主张的表态，并不包括白话诗的尝试：

隽前书“大赞成”足下之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者，乃系  
赞成作文之法及翻译外国文学名著等事，并非合白话诗

① 胡适《尝试集 自序》。

② 《任鸿隽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74~75 页，北京：华文书局，1979 年。

文等而一并赞成之,望足下勿误会。<sup>①</sup>

如此决绝的口吻,加上两个月后再次来信,坚称“兄等的白话诗(无体无韵)绝不能称之为诗”<sup>②</sup>,可见任君立场之坚定。作为科学社的创始人、科学家兼教育家的任鸿隽,并不以文学为业,吟诗只是个人爱好。二十年代的任君,仍不时给老朋友胡适寄赠诗词,但从尝试那“无体无韵”的白话诗<sup>③</sup>。

至于陈衡哲,情况则大不一样。适之先生始终对莎菲女士很有好感,这点不必多言,此处单就“文章知己”立论<sup>④</sup>。1914年留美、1920年归国,任北大西洋史兼英语系教授的陈衡哲,日后主要以欧洲文艺复兴史研究知名,但对于早期新文学的贡献,也颇受文学史家关注。《尝试集 自序》中有这么一句话:

这两年来,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诸位,美国有陈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话诗。

从1918至1920年,那位远在大洋彼岸的陈衡哲女士,已经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新诗“人家说我发了痴”、《鸟》、《散伍归来的吉普色》,以及短剧《老夫妻》、小说《小雨点》和《波儿》等“白话文学”。

① 《任鸿隽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14 页。

② 《任鸿隽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16 页。

③ 参见《陈衡哲致胡适》及《任鸿隽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253 页、273 页、399 页。

④ 唐德刚关于胡适《亡女》一诗以及夏志清关于陈衡哲小说《洛绮思的问题》的解读,均很有说服力。胡、陈二君,虽系“才子佳人,一拍皆合”,但借用唐德刚略带调侃的说法:“不幸他二人也因八字不合,而沟水东西!”参见唐德刚《胡适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第 195~198 页,以及夏志清为该书所撰的序。

为其牵线搭桥的,应该是胡适<sup>①</sup>。因为据适之先生称,当初在美国尝试白话诗写作时,任鸿隽等老朋友一致反对,只有一位女士默默地注视并表示支持,那便是莎菲女士。

因胡适在谈论白话文学起源时的再三铺陈,世人对胡、任之间的争论多有所了解;至于“我们三个朋友”中不太抛头露面的陈衡哲,其实并非与此毫无关涉。这一点,一直到1928年撰《小雨点序》时,胡适方才有所陈述:

民国五年七八月间,我同梅、任诸君讨论文学问题最多,又最激烈。莎菲那时在绮色佳过夏,故知道我们的辩论文字。她虽然没有加入讨论,她的同情却在我的主张的一面。不久,我为了一件公事就同她通第一次的信;以后我们便常常通信了。她不曾积极地加入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她是我一个最早的同志。<sup>②</sup>

在美的最后一年,胡适“和莎菲通了四五十次信”,其中不少涉及诗文创制。这种同道之间的互相支持,确实给正在从事“孤独的文学实验”的适之先生很大的安慰与鼓舞。可要进一步推断,将陈坐实为胡写作新诗的“烟丝批里纯”(Inspiration,即灵感),而且断言:“所以新文学、新诗、新文字,寻根究底,功在莎菲!”<sup>③</sup>则又未免言过其实。之所以不认同唐德刚的“大胆假设”,理由很简单,未同莎菲通讯之前,胡适已开始新诗的尝试。话题其实应该掉转过来,不是

---

① 刘半农编《初期白话诗稿》(北平:星云堂影印,1932)中收录陈衡哲《“人家说我发了痴”》一诗的钢笔手稿,其中有若干毛笔添加的引号、问号等,而且将“他们便令我将他看护”改为“他们便叫我作他的看护妇”。单是添加的标点符号,无法判断何人所为;有了那几个汉字,不难断言出自胡适手笔。

② 胡适《小雨点序》,《胡适文存三集》第1096~1097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

③ 参见唐德刚《胡适杂忆》第196页。

莎菲女士刺激了适之先生的写作灵感,而是胡、任之争以及胡适的大胆尝试勾起了莎菲的文学兴趣。“民国六年以后,莎菲也做了不少的白话诗”,其中好些还是寄给胡适并请其推荐给《新青年》或编入《努力周报》。<sup>①</sup>

莎菲女士并非一流诗人,只是修养甚佳;“作点文艺小品自遣”<sup>②</sup>,还是像模像样的。起码在我看来,其新诗创作并不比胡适逊色。在胡适 1922 年 2 月 4 日的日记中,粘附有陈衡哲的《适之回京后三日,作此诗送给他》,不妨将其与此前胡适本人的《我们三个朋友》对比,各取同样抒发依依惜别之情的最后一节为例。先看适之先生的:

别三年了,  
又是一种山川了,——  
依旧我们三个朋友。  
此景无双,  
此日最难忘,——  
让我的新诗祝你们长寿!

接下来再读莎菲女士的:

不能再续!  
只有后来的追想,  
像明珠一样,  
永远在我们的心海里,

① 参见《胡适文存三集》第 1093 ~ 1097 页和《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153 页、156 页、166 页、193 页。

② 参见《陈衡哲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166 页。胡适对于陈衡哲的学识与才情,似乎估计过高,因而也就期待太殷,对其因怀孕不能上课大发感慨,并追忆当初任、陈结婚时自己的贺联“无后为大,著书最佳”。最后的结论是:“但此事自是天然的一种缺陷,愧悔是无益的。”参见《胡适的日记》上册 211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



发出他的美丽的光亮。

二者都不算好诗,胡诗过于直白,陈诗的比喻则欠高明,但尚属平实妥帖。当然,早期白话诗的“尝试”之作,不必苛求。

一个坚持“无体无韵”的白话诗不是诗,一个则是胡适白话诗写作“最早的同志”,请这两位老朋友来帮助删诗,自是好主意。问题在于,胡适似乎更看重周氏兄弟的意见,未免有些怠慢了这对老朋友。因为,仔细比勘,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任、陈的不少意见,实际上并没有被胡适采纳。

这当然不能全怪胡适,因其牵涉到刊行增订四版的目的,到底是为了“飞鸿踏雪泥”呢,还是诗史留印记。倘若像《蔚蓝的天上》那样,“豫才删,启明以为可存。莎菲删,叔永以为可删”,那很好办,三比一,删。可仔细品味,叔永、莎菲夫妇的意见中,有些不牵涉艺术鉴赏力之高低,而只是基于怀旧心理。如《虞美人·戏朱经农》,叔永以为可留,《寒江》,莎菲拟存,看中的未必是艺术,而很可能只是对于共同的留学生涯的怀念。《送叔永回四川》俞平伯以为可删,目录页以及正文也都已用红笔圈掉,可仍有莎菲用铅笔做的批注:“A good historical record. keep?”(“一份很好的历史记录,保存?”)。以上三诗,最后都没能进入新版。显然,胡适之所以修订并重刊《尝试集》,主要目的不是纪念友情,而是为“文学革命”提供标本。

### 三、学生的建议

二十年代初,当新诗运动由轰轰烈烈的争辩,转为更艰苦卓绝的创造时,第一代白话诗人对于什么是“新诗”以及新诗发展趋势的判断,开始出现分歧。如周作人在《谈新诗》中抱怨“现在的新诗坛,真可以说消沉极了”,老诗人不大做声,新进诗人也不见得有多大出息;大家辛辛苦苦开辟出来的新诗田,却半途而废的荒芜了,

让一班闲人拿去放牛”<sup>①</sup>。而胡适则在《尝试集》初版、二版、四版的自序中,对白话新诗的突飞猛进、尤其是年轻诗人的迅速成长大声喝彩:“我现在看这些少年诗人的新诗,也很像那缠过脚的妇人,眼里看着这一班天足的女孩子们跳上跳下,心里好不妒羡。”<sup>②</sup>评价截然不同,但周、胡二君都以年轻诗人的创作占卜新诗的前途。

周作人不以新诗为主攻方向,不只对其现状表示失望,甚至逐渐关闭“文学店”,独自经营起“自己的园地”来,并最终以别具一格的散文随笔征服读者。至于自称“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适之先生,“心里好不妒羡”的,到底是哪些年轻诗人?这些没有受过“缠足”束缚的新一代诗人,又是如何看待如小脚放大般的《尝试集》?这是个有趣的话题。

1935年,胡适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时,新诗理论方面,除自家文章,还收入了郭沫若的《论诗通信》、康白情的《新诗底我见》以及俞平伯的《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还有周无的《诗的将来》,周无号太玄,专攻生物学,乃著名科学家兼教育家,后不以新诗名世,此处从略)。如此选择,恰好配合最早面世的四部新诗集《尝试集》(1920年3月)、《女神》(1921年8月)、《草儿》(1922年3月)和《冬夜》(1922年3月),可见其选文中隐含着历史及审美的判断。

尽管在日后的新文学史编纂中,郭沫若的《女神》被捧上云天,远离康白情的《草儿》和俞平伯的《冬夜》;可当初《女神》并不被新诗的“掌门人”胡适看好。按理说,郭诗非常吻合适之先生关于“少年诗人”创作之想象:“大胆的解放”与“新鲜的意味”。因此,胡适不可能完全漠视这一正声名鹊起的同道。查适之先生1921年8月9日日记,果然有会晤郭沫若后的感想:

① 周作人《谈新诗》《谈虎集》,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

② 胡适《尝试集 四版自序》。

沫若在日本九州学医,但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工力也不好。<sup>①</sup>

激情澎湃的《女神》与清新平淡的《尝试集》,二者在艺术风格上可谓天差地别,而泛神论的主张,在信仰实验主义的胡适看来,起码是无法“拿证据来”。单就文学趣味而言,胡、郭之不能互相欣赏,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至于晚年胡适的转而欣赏“郭沫若早期的新诗”<sup>②</sup>,如果不是别有寄托,便是事过境迁后的自我调整。

那么,让适之先生“心里好不妒羨”的,应该就是康白情和俞平伯了。《尝试集 自序》中提到的近两年“都努力作白话诗”的友人,属于学生辈的有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三位。而傅很快转向学术研究,不再继续新诗的尝试;只有俞、康二君确实可做早期白话诗人的代表。

《胡适文存二集》中,有《评新诗集》一文,乃是集合两则书评而成:一说《草儿》,一评《冬夜》。扬康而抑俞,在书评中可谓表露无遗。如此说来,那“使我一头高兴,一头又很惭愧”的少年诗人,应该就是康白情。这一点,几乎可以板上钉钉。因为,就在写作《尝试集 四版自序》的当天晚上(1922年3月1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下这么一段富于感情色彩的话:

康白情的《草儿》诗集出版了。近来诗界确有大进步,使我惭愧,又使我欢喜。白情的诗,富于创作力,富于

① 《胡适的日记》上册 180 页。

②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 81 页称:“胡先生也常向我说:‘郭沫若早期的新诗很不错!他并且告诉我一个故事: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他称赞了郭沫若几句。郭氏在另外一桌上听到了,特地走了过来在胡氏脸上 kiss 了一下以表谢意。’”此事胡适 1923 年 10 月 13 日的日记(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四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有记载:“是夜沫若,志摩,田汉都醉了。我说起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第 72 页关于此事的叙述多有失误,除事隔多年,更因其过于强调“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

新鲜味儿,很可爱的。《草儿》附有他的旧诗,几乎没有一首好的。这可见诗体解放的重要。<sup>①</sup>

在半年后写作的书评中,胡适将这意思发挥得淋漓尽致。看来,胡适真的很欣赏康诗,以至突破一贯的稳重与矜持,说了不少过头话。如称“白情的《草儿》在中国文学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纪游诗”;占《草儿》八十四页的《庐山纪游》三十七首,自然是中国诗史上“一件很伟大的作物了”<sup>②</sup>。

胡适看中的是康白情之“自由吐出心里的东西”,以及语言的清新活泼,这确实很符合适之先生对于新诗出路的想象。可照康白情的自述:“我不过剪裁时代的东西,表个人的冲动罢了”<sup>③</sup>。这里所说的“冲动”,主要指向瞬间的情绪与感悟,而不是胡适所欣赏的“思想清楚”。康君所谓“诗是主情的文学。没有情绪不能作诗;有而不丰也不能作好”的说法<sup>④</sup>,远离胡适明白晓畅的诗歌理念,与郭沫若开列的关于“诗”的公式更有缘分:“诗=(直觉×情调×想像)×(适当的文字)”<sup>⑤</sup>。更有意思的是,康文引述“我的畏友宗白华”的话,强调诗意诗境得益于直接的观察、体悟与感兴,而郭文本身就是写给宗白华的信。

其时已留学美国的康白情:“从三万里外来信,替我加上了一个‘了’字,方才合白话的文法”,胡适是用很赞赏的口吻提及此事的。而且,还做了借题发挥:“做白话的人,若不讲究这种似微细而实重要的地方,便不配做白话,更不配做白话诗。”可恰恰是胡诗中这几乎无所不在的“了”字,日后备受诗人和史家的讥笑。朱湘称

① 《胡适的日记》上册 282 页。

② 《评新诗集·康白情的〈草儿〉》《胡适文存二集》卷四第 274、277 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 年。

③ 康白情《草儿自序》《草儿》,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 年 3 月。

④ 康白情《新诗底我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 329 页。

⑤ 郭沫若《论诗通信》《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 348 页。

《尝试集》中只有十七首是真正意义上的新诗,可“这十七首诗里面竟用了三十三个‘了’字的韵尾(有一处是三个‘了’字成一联)”。在讲究音律的诗人朱湘看来,如此重叠使用“刺耳”的“了”字韵,未免令人发生一种作者艺术力的薄弱的感觉了”<sup>①</sup>。将近半个世纪后,史家周策纵在《论胡适的诗》中旧事重提,批评胡诗“最大一个毛病或痼疾,就是用‘了’字结句的停身韵太多了”。周氏甚至下工夫做了一番认真的统计,连《尝试集》带《尝试后集》、《后集未收诗稿》;总计新体诗(旧体诗词不算)共六十八题,有‘了’结的诗行共一百零一条好汉,平均几乎每诗快到两行,不为不多‘了’”<sup>②</sup>。在白话诗提倡者适之先生眼中,首先应该关注的,是“白话”而不是“诗”。为了突出“白话的文法”,而相对割舍音律、意境以及想象力,在胡适看来,很可能是“必要的丧失”。因此,我宁肯从“性情执着”而不是“才情枯竭”的角度,来理解胡适这一不近情理的追求。

欣赏康白情的三万里外来信,“替我加上了一个‘了’字”,与不太喜欢俞平伯的凝炼与幽深,二者互为表里。就在撰写《尝试集四版自序》五天后,胡适读到俞平伯刚出版的新诗集《冬夜》,在日记中写下这么一段话:

俞平伯的《冬夜》诗集出来了。平伯的诗不如白情的诗,但他得力于旧诗词的地方却不少。他的诗不很好懂,也许因为他太琢磨的原故,也许是因为我们不能细心体会的原故。<sup>③</sup>

俞平伯的诗“不很好懂”,这不是胡适一个人的意见。诗集尚未出版,已经有不少这样的批评,以至朱自清必须在序言中预先澄清:

① 朱湘《新诗评(一)·尝试集》,1926年4月1日《晨报副刊》。

② 周策纵《论胡适的诗》,见唐德刚著《胡适杂忆》附录,第232页、235页。

③ 《胡适的日记》上册287页。

平伯底诗,有些人以为艰深难解,有些人以为神秘;我却不曾觉得这些。……或者因他的诗艺术精炼些,表现得经济些,有弹性些,匆匆看去,不容易领解,便有人觉得如此么?那至多也只能说是“艰深难解”罢了。但平伯底诗果然“艰深难解”么?据我的经验,只要沉心研索,似也容易了然,作者底“艰深”,或竟由于读者底疏忽哩。<sup>①</sup>

最后一句对适之先生颇有刺激,以至日后撰文时还专门予以引述与辩解<sup>②</sup>。日记中之所以在批评俞诗“太琢炼”的同时,又留下“也许是因为我们不能细心体会的原故”这样的活口,也可见适之先生立论的谨慎。对照俞氏“努力创造民众化的诗”之主张,胡适提及这位得意门生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大矛盾:“平伯自有他的好诗”,却是新诗人中“最不能‘民众化’的”<sup>③</sup>。

俞诗之旖旎缠绵,可谓一目了然,确实不大具有五四时期所推崇的“平民风格”。照康白情的说法,这既得益于古诗词的修养,也与其天生的“诗人性”有关:

俞平伯的诗旖旎缠绵,大概得力于词。天生就他的诗人性,随时从句子里浸出来。做诗最怕做不出诗味。所谓“就是那土和泥,也有些土气息、泥滋味”,深可发明。所以古人说:“不是诗人莫做诗”。若平伯呢,只怕虽欲不做诗而不可得了。<sup>④</sup>

就个人气质而言,俞氏很可能是尝试白话诗写作的年轻诗人中“文

① 朱自清《冬夜序》《冬夜》,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3月。

② 《评新诗集·俞平伯的冬序》《胡适文存二集》卷四第282~283页。

③ 参见俞平伯《诗底进化的还原论》《诗》1卷1期,1992年1月)《冬夜自序》和胡适的《评新诗集·俞平伯的冬夜》。

④ 上海亚东图书馆1992年8月《新诗年选》中愚庵关于俞平伯语,据胡适和朱自清推断,应属康白情的手笔,参见胡适《评新诗集》和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诗话》(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

人结习”最深、最不具有“平民风格”的。胡适的批评,让俞平伯猛醒过来,开始顺应自家的天性,不再强求诗歌之“民众化”。

在《冬夜 自序》中,俞平伯还在认真地自我检讨:“我虽主张努力创造民众化的诗,在实际上做诗,还不免沾染贵族的习气,这使我惭愧而不安的。”<sup>①</sup>而胡适关于《冬夜》的书评发表后,俞平伯当即开始调整思路。先是借为康白情的《草儿》做序,称新诗初期将“平民的”误会成“通俗的”,实在不应该;后又以《致汪君原放书》作为再版本《冬夜》的“代序”,强调“平民贵族这类形况于我久失却了它们底意义,在此短札中更不想引起令人厌而笑的纠纷”<sup>②</sup>。在趣味和口号不太统一的情况下,俞氏忠实于自己的文学感觉,而扬弃先前的激进主张。至于“作诗不是求人解,亦非求人不解;能解固然可喜,不能解又岂作者所能为力”<sup>③</sup>,明显是在回应胡适的批评。而以下这段话,更具有积极进取的意味:

笼统迷离的空气自然是不妙;不过包含隐曲却未尝和这个有同一的意义。一览无余的文字,在散文尚且不可,何况于诗?<sup>④</sup>

此后,无论吟诗作文,俞平伯不再偏离这一方向,始终以“曲折幽深”而不是“一览无余”为主导风格。

在早期白话诗中,俞诗之所以显得精练、幽深;有“不可把捉的风韵”,与其讲求音律有关。而照朱自清的说法:“平伯这种音律底艺术,大概从旧诗和词曲中得来。……我们现在要建设新诗底音律,固然应该参考外国诗歌,却更不能丢了旧诗,词,曲。”<sup>⑤</sup>

① 俞平伯《冬夜 自序》《冬夜》,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3月。

② 参见俞平伯的《草儿 序》和《致汪君原放书(代序)》《冬夜》,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5月再版本。

③ 俞平伯《致汪君原放书(代序)》。

④ 俞平伯《草儿 序》《草儿》,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3月。

⑤ 朱自清《冬夜 序》《冬夜》。

闻一多大致认同朱自清的见解,在《冬夜评论》中,虽对俞诗“幻想之空疏庸俗”等有所批评,但也承认“凝炼,绵密,婉细是他的音节特色”;关于这点,当代诸作家,没有能同俞君比的。这也是俞君对新诗的一个贡献”。并且断言:“这种艺术本是从旧诗和词曲里蜕化出来的。”<sup>①</sup>问题正在这里,俞诗中古典诗词的印记格外醒目,而这在正热心提倡白话诗写作的胡适看来,无疑是一大缺陷。

其实,俞平伯本人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点。在《做诗的一点经验》中,俞氏庆幸自己欣逢诗歌变革的关头,“使我能离开一切拘牵,赤裸显出诗中的自我”,可又坦承“其中或还不免有旧诗词底作风。这是流露于不自觉的,我承认我自己底无力”<sup>②</sup>。而在《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中,俞氏提出关于新诗写作的四条具体见解,最关键的是“限制文言的使用”,即竭力与旧诗划清界线。擅长旧体诗词的俞平伯,“时时感用现今白话做诗的苦痛”,故慨叹:“说白话诗容易做的,都是没有尝试过的外行话。依我的经验,白话诗的难处,正在他的自由上面。”<sup>③</sup>

应该说,俞平伯早年关于白话诗的见解,大体不出胡适论述的范围,只是以自家创作经验来予以证实。尽管从一开始胡、俞二君的诗文趣味就不太一致,但在体味白话诗写作的艰难与利弊得失方面,师生二人颇多共同语言。比如,俞平伯撰《白话诗的三大条

---

① 闻一多《冬夜评论》,见《俞平伯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213~249页。闻一多还将胡适与俞平伯关于新诗音节的见解相对比,批评胡适自序再版《尝试集》时自鸣得意的纯粹的“自由诗”音节,称“所谓‘自然音节’最多不过是散文的音节。散文的音节当然没有诗的音节那样完美。俞君能熔铸词曲的音节于其诗中,这是一件极合艺术原则的事,也是一件极自然的事,用的是中国的文字,作的是诗,并且存心要作好诗,声调铿锵的诗,怎能不收那样的成效呢?我们若根本地不承认带词曲气味的音节为美,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甘心作坏诗——没有音节的诗,或用别国的文字作诗。”

② 俞平伯《做诗的一点经验》《新青年》8卷4期,1920年12月。

③ 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2卷1期,1919年10月。



件》称诗乃“发抒美感的文章”；“用白话做诗，发挥人生的美，虽用不着雕琢，终与开口直说不同”<sup>①</sup>。此文刊于《新青年》6卷3号时，胡适加一按语，对俞所举三条建议极表赞成，尤其欣赏“雕琢是陈腐的，修饰是新鲜的”的提法。

正因为师生之间颇为相知，胡适的批评带有自省的成分。白话诗是否需要如此“艰深难懂”，趣味不同，只好各说各的。至于新诗需要具体性，而不应该沉湎于哲理的陈述，其实也是胡适本人所面对的难题。俞诗“很有意味”，而且“长于描写”，只是喜欢说理这一点，让胡适无法接受：

平伯最长于描写，但他偏喜欢说理；他本可以作好诗，只因为他想兼作哲学家，所以越说越不明白，反叫他的好诗被他的哲理埋没了。

紧接下来，胡适马上补充一句：“这不是讥讽平伯，这是我细心读平伯的诗得来的教训。”<sup>②</sup>在我看来，这不完全是客套话。在《谈新诗》中“戏台里喝彩”，介绍做诗该如何“抽象的题目用具体的写法”<sup>③</sup>，以及针对鲁迅建议删去《礼！》一诗的辩解——“他虽是发议论而不陷于抽象说理”<sup>④</sup>，都显示了抵抗抽象说理对于白话新诗严重的危害性。五四“新青年”之喜欢说理，与其单独归功于泰戈尔哲理诗的影响，还不如承认大转折时代追问人生意义以及重建价值观念的迫切性。

应邀为老师删诗的俞平伯，只留下一增删篇目，而未见具体阐释。不过，仔细寻觅，还是能发现若干蛛丝马迹。建议删去《江上》，这与鲁迅的意见相同，保留《鸽子》的主张，则又与周作人的看

① 俞平伯《白话诗的三大条件》《新青年》6卷3期，1919年3月。

② 《评新诗集·俞平伯的〈冬夜〉》《胡适文存二集》卷四第288页。

③ 胡适《谈新诗》《胡适文存》卷一第254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

④ 参见陈平原《鲁迅为胡适删诗信件地发现》《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10期。

法暗合。前者之不被接纳,出于主人的个人偏好:“我因为当时的印象太深了,舍不得删去。”<sup>①</sup>至于《鸽子》,原已被作者用红笔圈掉,纯粹是因周、俞的大力保荐,才得以存留。此前两年撰《谈新诗》,胡适曾做自我检讨:“我自己的新诗,词调很多,这是不用讳饰的”,举的例子就包括这首《鸽子》<sup>②</sup>。而周、俞二君明知故犯,不因《鸽子》带着词调而嫌弃,其对于新诗的预想目标,显然与胡适颇有距离。这涉及到新诗与旧诗的界限,以及白话诗中能否采用文言、借鉴词曲,真正将此话题挑开的,并非作为学生的俞平伯,而是更具理论自觉的周作人。

#### 四、二周的眼光

任、陈夫妇乃留美及归国后多有交往的老友,俞、康为北大任教时的学生,至于周氏兄弟,则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同道与相知——如此不同视角交叉使用,可见胡适的请人删诗,计划是相当周详的。虽是六人三组,着眼点不同,各有其功用,但相对而言,胡适最看重的,无疑是周氏兄弟的意见。而实际上周氏兄弟也不负所托,提供的建议最为详尽,且十分得体。不妨先看看此次新发现的周氏兄弟致胡适的信,再做进一步的分析。1921年1月15日鲁迅致胡适信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

今天收到你的来信。《尝试集》也看过了。

我的意见是这样:

《江上》可删。

《我的儿子》全篇可删。

① 胡适《尝试集 四版自序》。

② 胡适《谈新诗》《胡适文存》卷一第236页。

《周岁》可删,这也只是《寿诗》之类。

《蔚蓝的天上》可删。

《例外》可以不要。

《礼!》可删;与其存《礼!》,不如存《失望》。

我的意见就只是如此。

启明生病,医生说是肋膜炎,不许他动。他对我说,“《去国集》是旧式的诗,也可以不要了。”但我细看,以为内中确有许多好的,所以附着也好。

我不知道启明是否要有代笔的信给你,或者只是如此。但我先写我的。

我觉得近作中的《十一月二十四夜》实在好。

树 一月十五日夜

三天后(即1921年1月18日)病中的周作人还是请人代笔,给胡适去信,表明其对于“删诗”一事的重视。信件全文如下:

适之兄:

你的信和诗稿都已收到了;但因生病,不能细看,所以也无甚意见可说。我当初以为这册诗集既纯是白话诗,《去国集》似可不必附在一起;然而豫才的意思,则以为《去国集》也很可留存,可不必删去。

集中《鸽子》与《蔚蓝的天上》等叙景的各一篇,我以为都可留存;只有说理,似乎与诗不大相宜,所以如《我的儿子》等删去了也好。

关于形式上,我也有一点意见,我想这回印起来可以考究一点,本文可以用五号字排;又书页可以用统的,不必一页隔为上下两半。书形也不必定用长方形,即方的或横方的也都无不可。

你近作的诗很好,我最喜欢最近所作的两首。

一月十八日 周作人

在具体论说前,请注意周作人关于书籍“形式”的建议。开本改方或横,或许是不够庄重,或许是制作困难,反正没被采纳;但书页用统的,不必隔为上下两半,这点实现了。病中的周作人,为何特别提醒“这回印起来可以考究一点”,是否意识到这将是“定本”,甚至可能是传世的“经典”?事后证明,周作人确实有先见之明:一直到1940年印行第十六版,1982年上海书店刊行影印本,以至今日学界普遍引用的,都是此经由众时贤参与删定的“增订四版”。

胡适对周氏兄弟的意见,可说是“分外重视”。查《胡适来往书信选》,1921年2月14日,胡适曾致信周作人,转达燕京大学的邀请,后有一“附启”:

你们两位对于我的诗的选择去取,我都极赞成。只有《礼》一首,我觉得他虽是发议论而不陷于抽象说理,且言语也还干净,似尚有可存的价值。其余的我都依了你们的去取。<sup>①</sup>

其实,胡适不曾接纳鲁迅意见的,不只是《礼》,还有一首《江上》。在《尝试集 四版自序》中,有如下的说明:

他们删过之后,我自己又仔细看了好几遍,又删去了几首,同时却也保留了一两首他们主张删去的。例如《江上》;“鲁迅”与平伯都主张删,我因为当时的印象太深了,舍不得删去。又如《礼》一首(初版再版皆无);“鲁迅”主张删去,我因为这诗虽是发议论,却不是抽象的发议论,所以把他保留了。<sup>②</sup>

诗人当然有理由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周氏兄弟等人的意见也只“仅供参考”。必须在书信及序言中再三解释为何没有接纳鲁迅的

① 《胡适致周作人》《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124 页。

② 胡适《尝试集 四版自序》。

意见,本身就说明后者在诗人心目中的分量非同一般。

五四时期的周氏兄弟与胡适,乃互相支持的“同道”,但很难说是心心相印的“密友”。知识背景不同(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界,留学欧美的与留学日本的学者之间,不无隔阂),个人气质迥异(周氏兄弟偏于怀疑,而胡适则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再加上年龄的差异(1921年的胡适,刚届而立,已是名满天下;相对而言,四十岁的鲁迅与三十六岁的周作人,反不及前者“风光”),胡与二周不可能“亲密无间”。这还不涉及《新青年》该往何处去,哪一种“主义”更适合于当下的中国等大大小小的争论。

胡适与二周的关系前后有别,对于这一点,学界的看法基本一致。问题是,在描述前期的“合作”与后期的“矛盾”时,论者往往基于自身言说的需要而夸大其辞。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二周与胡适确有许多精彩的合作,比如《新青年》的编纂、北大课程的改革、新文学的提倡、小说史的研究,乃至白话诗的尝试等。在好交朋友且待人宽厚、性情平和的适之先生心目中,周氏兄弟当然是他“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而周氏兄弟则未必这么看待:书札往来,彬彬有礼,加上专业上的互相支持,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交”。

1929年8月30日,周作人给远在上海的胡适去信,劝其不要留恋那里的“便利与繁华”,也不必“说闲话惹祸祟”,还是回萧条的北平“教书做书”,以便“在冷静寂寞中产生出丰富的工作”。周自称写这信时,不是没有顾虑:“我自己觉得有点踌躇,这未免有交浅言深之嫌吧?”<sup>①</sup>胡适接获此信,大为感动;只是对最后一句,颇表惊诧:

你信上提起“交浅言深”的话,使我有点感触。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

<sup>①</sup> 《周作人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539 页。

情意殷厚 ,果符平日的愿望 ,欢喜之至 ,至于悲酸。此是真情 ,想能见信。<sup>①</sup>

并非近期“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才导致二周和胡适的“交浅”,这点是少年得志、朋友遍天下的适之先生所难以理喻的。胡信中所表达的对于周氏兄弟“最诚意的敬爱”,我相信是真的;可反过来,不能要求二周也如此“相去虽远,相期至深”。这涉及各自为人处世的原则,不必强分轩輊。

进入三十年代,鲁迅、胡适的政治立场日渐对立,以至前者在杂文中对后者颇多讥讽。可即便如此,据胡思杜告诉罗尔纲,1932年11月鲁迅因母病重返北平时,还专门“到胡适家探访,在将进书房时边笑边说:‘卷土重来了!’”<sup>②</sup>此事鲁迅日记中没有记载,也与鲁迅学界的叙述大相径庭<sup>③</sup>,但以胡思杜对鲁迅的崇拜以及罗尔纲治学之严谨,不太可能伪造此史料。而鲁迅去世后,苏雪林给备受鲁迅讥讽的胡博士去信,表白自己“向鲁党挑战”的决心,希望胡适支持其发起对于“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鲁迅的总攻击<sup>④</sup>,胡适却在回信中表彰鲁迅的功绩: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

① 《胡适致周作人》《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542 页。

② 参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第 144 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 年。

③ 鲁迅博物馆和鲁迅研究室合编的《鲁迅年谱》增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第三册是这样叙述鲁迅的北上的:“左翼文化人士和青年学生大受鼓舞,而反动派则如临大敌,买办文人借机攻击鲁迅‘卷土重来了’”(351 页)。“在同来访者谈话中,鲁迅幽默地说:我这次一来,便有很多的人放冷箭,说我是来抢他们的饭碗,说我是卷土重来。何苦叫这些人不放心,倒不如赶快卷土重去。这是对胡适等人的顺便一刺。”(355 页)

④ 参见苏雪林致胡适、致蔡元培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325—334 页。

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俚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en 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sup>①</sup>

鲁迅的“深刻”与胡适的“宽容”,二者其实均有不可及处<sup>②</sup>。放开一点历史视野,未见得不能同时欣赏。当初之立场不同且性格迥异,尚且不一定是“你死我活”;后世论者在褒贬抑扬时,更应该多点“理解之同情”。

三十年代同在北大任教的周作人与胡适,倒是相处得不错。最明显的例证是,1934年初,针对周作人发表引起很大争议的《五十自寿诗》,胡适连续写了《戏和周启明打油诗》、《再和苦茶先生打油诗》、《苦茶先生又寄打油诗来,再叠答之》,第二年底、第三年初又有《和周启明贺年诗》、《和周启明“二十五年贺年”打油诗》。而1938年在伦敦写的《寄给在北平的一个朋友》(又名《寄苦雨庵》),更因其寄托遥深而被广泛征引。周作人晚年撰写回忆录,由于时局的关系,不愿多提与胡适的交谊,但对当初远在英国的适之先生专门写诗劝“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南下,以及自家之“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sup>③</sup>,还是很肯花笔墨的。而胡适晚年着意收集周作人的

①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339 页。

② 千家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的附录)中有这么一句话:“在当代学人中,我最佩服的两位——一位是鲁迅,一位是胡适。他们两人性格刚好相反,鲁迅的偏狭,胡适的豁达,适成鲜明的对照。”这里所说的鲁迅性格“偏狭”,并不是讥讽之语,因是指向“观察问题之深刻”与“文笔之犀利”。

③ 参见《周作人回忆录》471~473 页。

著述 遥想五四时之并肩作战 ,感慨今日老友之落寞<sup>①</sup> ,人所共有的怀旧心理外 ,也可见适之先生性情之醇厚。

回到删诗事件。胡适之所以格外看重周氏兄弟的意见 ,因其认定二周的文学才华在自己之上。在五四时期影响极大的理论表述《谈新诗》中 ,胡适称道周作人的《小河》：“这首诗是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 ,但是那样细密的观察 ,那样曲折的理想 ,决不是那旧式的诗体词调所能达得出的。”<sup>②</sup> 而讨论过新诗写作的诸多困难 ,表白自己以及众新秀如何未能写出真正的新诗 ,接下来就是：

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 ,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sup>③</sup>

特别表彰周氏兄弟的新诗 ,强调其不受旧诗词的牵制 ,不能说胡适没有眼光。鲁迅 1918 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梦》、《爱之神》、《桃花》、《他们的花园》、《人与时》等新诗 ,拒绝直白的说理 ,追求意境的幽深 ,其象征手法的娴熟 ,以及驾御白话的能力 ,确非同期半词半曲的“放大的小脚”可比。如果再考虑 1919 年陆续发表总题为《自言自语》的散文诗 ,称道鲁迅的“诗才” ,不是没道理的。至于将《小河》断为早期新诗的代表作 ,胡适的这一观点 ,现已被许多文学史家所接受。

但周氏兄弟之尝试新诗写作 ,基本上只是“客串” ,所谓“打打边鼓 ,凑些热闹”<sup>④</sup> ,日后主要文学成就在小说与散文。即便吟诗 ,

① 《胡适致杨联陞》,《论学谈诗二十年》第 289 页 ,台北 :联经出版公司 ,1998 年。

② 胡适《谈新诗》,《胡适文存》卷一第 228 页 ,上海 :亚东图书馆 ,1921 年。

③ 胡适《谈新诗》,《胡适文存》卷一第 235 页。

④ 鲁迅在《集外集 序言》中称：“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 ,所以打打边鼓 ,凑些热闹 ,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 ,就洗手不作了。”(《鲁迅全集》第七卷 4 页)1926 年周作人撰《扬鞭集 序》,也有类似的说法：“我对于中国新诗曾摇旗呐喊过 ,不过自己一无成就 ,近年早已歇业 ,不再动笔了。”



周氏兄弟更擅长的还是旧体。鲁迅旧诗写得好早有定评，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其实也颇可观。自称对于新诗“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胡适，显然是在与周氏兄弟的接触中，意识到自己的局限。1922年3月4日的日记中，胡适记下鲁迅的期待以及自己的反省：“豫才深感现在创作文学的人太少，劝我多作文学。我没有文学的野心，只有偶然的文学冲动。”<sup>①</sup>六天后，《尝试集 四版自序》脱稿，其中多处提及鲁迅的判断。将近半年后，胡适又在日记中写下这么一段对于周氏兄弟文学才华的由衷赞赏：

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sup>②</sup>

事后证明，胡适的直觉相当准确，这段话几乎可以不做修改就“进入文学史”。

胡适对于二周删诗的建议，无论接纳与否，都经由一番认真的思考。比如《礼！》以叙事的口吻，对世俗之以礼责人大加嘲讽，所谓“你们串的是什么丑戏，也配抬出‘礼’字的大帽子！你们也不想想，究竟死的是谁的老子”，在胡适，肯定是有感而发。可鲁迅出于对诗歌特性的理解，不主张将此诗收入。对此，胡适不以为然，在《四版自序》中略做辩解。而为祝贺《晨报》一周年而作的《周岁》，虽是“白话”，却很难说是“诗”<sup>③</sup>。更重要的是，鲁迅对刚诞生的白话诗有可能成为新的应酬工具，保持高度的警惕，故特别点出此乃源远流长的“寿诗”传统<sup>④</sup>。听从鲁迅的意见，胡适最终还是

① 《胡适的日记》上册 276 页。

② 《胡适的日记》下册 424 页。

③ 《周岁》共三节，请看最后一节：“我再贺你一杯酒，祝你奋斗到底；你要不能战胜病魔，病魔会战胜了你！”

④ 吟过《周岁》的第二年，胡适真的为陈仲骥父亲七十大寿撰一《寿诗》，只是没入集而已（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11 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假如不是鲁迅的提醒，以胡适喜交游的性格，真不知日后诗集中该有多少此类纯粹应酬之作。

“忍痛割爱”。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此前两年,在《尝试集 再版自序》中,胡适怕被误读;因此,我老着面孔,自己指出那几首诗是旧诗的变相,那几首诗是词曲的变相,那几首是纯粹的白话新诗”<sup>①</sup>。他所郑重推荐的十四首“真正白话的新诗”,在增订四版中,除《周岁》外,全都赫然在目。这自然是鲁迅的意见起了作用。

周氏兄弟的删改,固然让胡适感动;而周氏兄弟的表彰,肯定更让胡适欢欣。鲁迅肯说出“我觉得近作中的《十一月二十四夜》实在好”这样的话,实在不容易。更何况周作人的信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你近作的诗很好,我最喜欢最近所作的两首。”1921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8卷5号,刊有胡适写于1920年10月10日的《梦与诗》和写于1920年11月25日的《礼!》和《十一月二十四夜》。所谓“最近所作的两首”,当系《礼!》和《十一月二十四夜》无疑。这么说来,胡适之所以坚持保存《礼!》,或许还基于周氏兄弟意见并不一致的缘故。

比起具体篇目的增删,更重要的是对于“新诗”定义的重新调整。《尝试集》自初版起,便附有旧体诗词《去国集》。至于白话诗集中为何夹杂旧体诗词,胡适在《去国集 自序》中有所交代:

胡适既已自誓将致力于其所谓“活文学”者,乃删定其六年以来所为文言之诗词,写而存之,遂成此集。名之曰“去国”,断自庚戌也。昔者谭嗣同自名其诗文集曰“三十以前旧学第几种”。今余此集,亦可谓之六年以来所作“死文学”之一种耳。

集中诗词,一以年月编纂,欲稍存文字进退及思想变迁之迹焉尔。<sup>②</sup>

① 胡适《尝试集 再版自序》。

② 《去国集 自序》《尝试集》第125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10月增订四版。

依此序所言，之所以保存《去国集》，纯粹是为了记录当初学步的蹒跚足迹，同时以“死文学”来反衬“活文学”的无穷魅力。为了第一部“白话诗集”体例的统一，周作人一开始建议删除《去国集》，后又转而接受兄长的意见，“以为《去国集》也很可留存”。

为什么《去国集》可以留存？周作人并没做进一步的说明。读了鲁迅的意见，你会明白，同样主张保留《去国集》，周氏兄弟与胡适的思路，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简单说，胡适关注的是“白话”，周氏兄弟看重的是“诗”，故鲁迅才会对被判为“死文学”的《去国集》另眼相看：“但我细看，以为内中确有许多好的，所以附着也好。”不以“文白”定“死生”，二周的文学趣味，显然与胡适之一味强调白话诗该如何脱离词曲的羁绊大有差别。

回过头来，再仔细品味那首已经被胡适本人删去、可又被周作人和俞平伯抢救回来的《鸽子》：

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

有一群鸽子，在天空中游戏。

看他们三三两两，

回环来往，

夷犹如意，——

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十分艳丽！

确实像胡适原先自暴短处时所说的，此诗明显受词调的影响。问题在于，旧诗修养颇深的周、俞二君，不是不明白这一点，可还是不理睬胡适的解释，建议重新收录。或许，在周作人看来，诗歌只问好坏，而不必强分新旧。

这么说，不是毫无根据的猜测。两年后，即1923年4月，周作人为刘大白新诗集《旧梦》做序，专门针对时人之过于强调如何“摆脱旧诗词的情趣”，表示不同意见：

虽然他自己说诗里仍多传统的气味，我却觉得并不这样。据我看来，至少在《旧梦》部分内，他竭力的摆脱旧

诗词的情趣 ,倘若容我的异说 ,还似乎摆脱太多 ,使诗味未免清淡一点——虽然这或者由于哲理入诗的缘故。现在的新诗人往往喜学做旧体 ,表示多能 ,可谓好奇之过 ,大白先生富有旧诗词的蕴蓄 ,却不尽量的利用 ,也是可惜。我不很喜欢乐府调词曲调的新诗 ,但是那些圆熟的字句在新诗正是必要 ,只须适当的运用就好。因为诗并不专重意义 ,而白话也终是汉语。<sup>①</sup>

从综论性质的《谈新诗》,到自我定位的《尝试集》各版自序 ,再到谈论康、俞的《评新诗集》,胡适论述白话诗之演进 ,基本上就是一个标准 :即如何摆脱旧诗以及词曲的束缚。不要说五言七言的整齐句法不能用 ;“想用双声叠韵的法子来帮助音节的谐婉 ”,也是不可取的。“真正白话的新诗 ”,其音节应是“近于自然 ”。意识到自家“旧文学的习惯太深 ,故不容易打破旧诗词的圈套 ”<sup>②</sup> ,胡适于是更多强调与词曲传统之决裂 ,这自然有其合理性。可作为理论表述与运动纲领 ,不讲个人才性 ,也不利用丰富的传统资源 ,而只是一味逃避旧诗词那几乎无所不在的影响 ,其实是有欠缺的。

又过了三年 ,周作人为刘半农的《扬鞭集》作序 ,提及《新青年》时期的白话诗人 ,是这样评说的 :“那时做新诗的人实在不少 ,但据我看来 ,容我不客气地说 ,只有两个人具有诗人的天分 ,一个是尹默 ,一个就是半农。”前者驾御得住文言 ,后者则尤擅口语 ,各自发挥所长 ,故皆有所得<sup>③</sup>。在这里 ,周作人偏偏不提白话诗的倡导者胡适 ,大概是觉得适之先生缺乏“诗人的天分 ”。下面这两段话 ,更是有感而发 :

① 周作人《旧梦序》《旧梦》,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3 年。

② 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

③ 这一表述风格 ,很像章太炎《与人论文书》中的“并世所见 ,王闿运能尽雅 ,其次吴汝纶以下 ,有桐城马其昶为能尽俗。”(见《章太炎全集》第四卷 168 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

新诗的手法我不很佩服白描,也不喜欢唠叨的叙事,不必说唠叨的说理,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而写法则觉得所谓“兴”最有意思,用新名词来讲或可以说是象征。……中国的文学革命是古典主义(不是拟古主义)的影响,一切作品都象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彻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朦胧,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正当的道路恐怕还是浪漫主义——凡诗差不多无不是浪漫主义的,而象征实在是其精意。<sup>①</sup>

相信“新诗总是要发达下去的”的周作人,欣赏新诗因模仿而获得的“自由与豪华”,但强调“自由之中自有节制,豪华之中实含清涩,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这里将新诗之缺乏“余香与回味”,归结为语言表述上的“唠叨”,而骨子里则是没有节制的“自由”。

1926年的诗坛,早已不是胡适们的天下。远比俞平伯“艰深难解”的新诗正迅速崛起,诗坛上也不再只是传统与欧化之争;而且“象征”之取代“白描”,已成了实实在在的大趋势。周作人之批评新诗“晶莹透彻得太厉害了”,主要针对的不是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所标榜的“理性节制情感”原则以及“新诗格律化”追求,不是王独清之突出“感觉”与穆木天之主张“纯诗”,更不是正逐渐浮出海面的象征派诗人李金发、戴望舒。这与其说是在展望新诗的未来,不如说是为包括自己在内的五四一代新诗人撰写“墓志铭”。而这中间,最值得深刻反省的,当是曾领尽风骚的适之先生。

## 五、胡适的自我调整

如果说周氏兄弟可以先讲“诗”,而后才是“白话”,作为白话诗

<sup>①</sup> 周作人《扬鞭集序》《扬鞭集》,北新书局,1926年。

最早的积极倡导者(这比“新诗老祖宗”之类文学性表述更为恰当),胡适则只能先讲“白话”,而后才是“诗”。这可是时势逼出来的,由不得个人做主——谁让胡适必须时刻扛着“文学革命”的大旗。所谓“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擎旗作健儿”,开始只是表示一种义无反顾的决心与志气;可一旦文学革命已成燎原之势,作为最早的提倡者,胡适因而暴得大名,很难再有修正自家主张的机会。

就个人气质而言,胡适更像个温文尔雅的学者,而不是刚毅果断的革命家。在三十年代撰写《四十自述》以及五十年代口述自传时,胡适都曾提及陈独秀和钱玄同的鼎力支持乃文学革命成功的基本保证。单是书斋里的“刍议”,再精彩也不可能有多大的影响力;正是由于“三大主义”、“十八妖魔”、“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等充满火药味的口号,以及“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武断,方才激起轩然大波,也因此推动文学革命迅速展开<sup>①</sup>。有陈、钱这样“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当然是胡适的幸运。考虑到群众的麻木以及对抗中必不可少的损耗,革命家往往语不惊人死不休,故意将问题推到极端,既便于警醒公众,又保留折中回旋的余地。在《无声的中国》中,鲁迅曾论及这种革命家的思维方式: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sup>②</sup>

这废掉汉字的“极端言论”,正是出于思想“偏激”、“所主张常涉两

① 参见胡适《逼上梁山》和《胡适口述自传》第七章。

② 《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四卷 13~14 页。

极端”，说话“必说到十二分”的钱玄同先生<sup>①</sup>。作为一种运动策略，极端思维自有其好处。但另一方面，过于讲求“策略性”，追求最大限度的“现场效果”，未免相对忽视了理论的自恰与完整。假如革命不成功，这种“决绝的姿态”，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但万一革命成功，如何真正履行当初的诺言，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聪明者随着运动的深入而移步变形，逐渐修正姿态，转换角色，尚能在新一轮建设中发挥作用；至于立场坚定者，死守当初带有策略性的宣言，不肯做必要的妥协与调整，虽能博得“首尾一致”的赞赏，却很难再有进一步突破的可能。

胡适以文言白话断文学之死活，作为文学革命口号，简单明了，十分有效。可如此粗陋且武断的理论设计，本身存在许多问题，胡适不是不知道，也做过几番自我修正的努力，比如不断扩大“白话”的含义等<sup>②</sup>，但始终不敢模糊“斗争的大方向”。听适之先生谈论白话诗文，你会感慨其几十年没有大的变化，基本上保持少年时代的理想，这点颇令人惊讶。可仔细分辨，你还是可以发现，适之先生偶尔也会出现动摇，只不过由于更具革命家气质的钱玄同从旁提醒，于是继续前行。

针对胡适新作显示出的某种倒退的迹象，钱玄同1917年10月31日去信，语重心长地强调：“现在我们着手改革的初期，应该尽量用白话去作，才是。倘使稍怀顾忌，对于‘文’的一部分不能完全舍去，那么，便不免存留旧污，于进行方面，很有阻碍。”胡适得

---

① 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提及“玄同所主张常涉两极端”，而且这种思想“偏激”，“是他自己所承认的”。据黎锦熙先生在《钱玄同先生传》（载曹述敬《钱玄同年谱》147～202页，济南：齐鲁书社，1986）中追忆：“从前鲁迅批评他：十分话最多只须说到八分，而玄同则必须说到十二分。（见曹书173页）”

② 参见1917年11月20日的《答钱玄同书》（见《胡适文存》卷一）以及1928年6月的《白话文学史 自序》（见《白话文学史》，上海：新月书店，1928）。

信 幡然悔悟 ,于是在 11 月 20 日作复 ,表白自己的惶惑与苦恼 :

先生论吾所作白话诗 ,以为“ 未能脱尽文言窠臼 ”。此等诤言 ,最不易得。吾于去年( 五年 )夏秋初作白话诗之时 ,实力屏文言 ,不杂一字。如《朋友》《他》《尝试篇》之类皆是。其后忽变易宗旨 ,以为文言中有许多字尽可输入白话诗中。故今年所作诗词 ,往往不避文言。……但是先生十月三十一日来书所言 ,也极有道理。……所以我在北京所作的白话诗 ,都不用文言了。①

由“ 力屏文言 ”到“ 不避文言 ” ,再到“ 都不用文言了 ” ,经过这一番曲折 ,胡适坚定了纯用白话写作的宗旨。即便如此 ,在为《尝试集》撰写序言时 ,钱玄同还是很客气地批评胡适仍受旧诗词的牵制 :

不过我对于适之的诗 ,也有小小不满意的地方 ,就是其中有几首还是用“ 词 ”的句调 ;有几首诗因为被“ 五言 ”的字数所拘 ,似乎不能和语言恰合 ;至于所用的文字 ,有几处似乎还嫌太文。②

对于朋友如此严苛的挑剔 ,胡适心悦诚服 ,在《尝试集》初版自序中专门提及此事 ,并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 ,称自己所作新诗半新不旧 :“ 这些诗的大缺点就是仍旧用五言七言的句法。句法太整齐了 ,就不合语言的自然 ,不能不有截长补短的毛病 ,不能不时时牺牲白话的字和白话的文法 ,来牵就五七言的句法。”接下来关于诗体大解放的论述 ,在新诗创立期影响极大 ,值得认真对待 :

因此 ,我到北京以后所做的诗 ,认定一个主义 :若要做真正的白话诗 ,若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 ,白话的文法 ,和白话的自然音节 ,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这种主张 ,可叫做“ 诗体的大解放 ”。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

① 《答钱玄同书》《胡适文存》卷一第 54 ~ 55 页。

② 钱玄同《尝试集序》,见初版本《尝试集》。



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的文学可能性。<sup>①</sup>

话说得何等痛快淋漓,可流弊也就在这里。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散文尚且不可“话怎么说,就怎么说”,更何况历来以语言精粹著称的诗歌。

沉醉于“大解放”的幸福感,再加上本就不太具备“诗人的天性”,胡适于是抓住是否摆脱传统诗词束缚作为新诗的惟一标准。1919年撰《谈新诗》,提及“此外新潮社的几个新诗人——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也都是从词曲里变化出来的,故他们初做的新诗都带着词或曲的意味音节”<sup>②</sup>,显然感觉不无遗憾。到了1922年,胡适为三本新诗集撰写序言或书评,进一步阐述其理想中的新诗。基本思路是“诗体的大解放”,即如何摆脱旧诗词的影响,即便因此而失之于幼稚、直白、浅露,也都无所谓。以此标准衡量,康白情高于俞平伯,而后起的汪静之更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理由很简单:“白情受旧诗的影响不多,故中毒也不深”;汪静之等少年诗人更上一层楼,因“他们受的旧诗词的影响更薄弱了,故他们的解放也更彻底”<sup>③</sup>。以是否摆脱“旧诗词的鬼影”作为评价新诗好坏的惟一指标,在后世的诗人及史家看来,或许有点荒谬;可对于更多关注新诗出路的适之先生来说,关键在于“白话”还是“文言”,故“稚气究竟远胜于暮气”、“太露究竟远胜于晦涩”<sup>④</sup>。

过于执着“诗体的大解放”,再加上笃信“文学进化观念”,使得在小说研究方面颇有定见的适之先生,评价新诗时,常把握不住。

① 胡适《尝试集自序》。

② 胡适《谈新诗》《胡适文存》卷一第238页。

③ 参见《评新诗集》和《蕙的风序》《胡适文存二集》卷四第269~288页,295~308页。

④ 胡适《蕙的风序》《胡适文存二集》卷四第295~308页。

有艺术判断力的问题 ,但也与胡适尝试新诗 ,很大程度不是基于诗神驱使 ,而是服务于自觉的文学主张有关 :

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今尚需人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耳。<sup>①</sup>

基于白话必为将来文学之利器这一信仰 ,胡适“单枪匹马”前去“开辟一文学殖民地” ,其再三强调写诗只是“实验” ,并非故作谦虚。从这个角度看 ,只要白话文运动成功 ,即便《尝试集》因缺乏“诗性”而被遗弃 ,对于胡适来说 ,也没有太大的遗憾。正因为入手处是“文” ,着眼点是“白话” ;“白话诗”只是有待征服的最后一块阵地 ,很长时间内 ,胡适的兴奋点集中在如何摆脱“文言”以及“旧诗词” ,而不太追问是否具有诗的“意境”——直到 1924 年《胡思永的遗诗序》和 1936 年的《谈谈“胡适之体”的诗》 ,才将语言表达与意境营造结合起来。而一旦“白话”不是评判新诗好坏的惟一标准 ,根基深厚的传统诗词之影响必将浮出海面。在这中间 ,与周氏兄弟以及梁启超的书信往来 ,对胡适重新反省关于“新诗”的想象 ,很可能起关键作用。

鲁迅称《去国集》中“确有许多好的” ,周作人批评传统根基深厚的刘大白“竭力的摆脱旧诗词的情趣” ,这些“异议” ,对于一直检讨自家白话诗中残留词调的胡适来说 ,应该说颇有触动。而与梁启超关于白话诗的争辩 ,以及借鉴小令写作新诗之可能性的探讨 ,对于胡适的调整思路 ,当也不无关系。

在白话诗问题上 ,梁启超与胡适意见不一致 ,并且有过直接的

<sup>①</sup> 《胡适留学日记》第四册 996 页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7 年。

争论,可惜相关史料大多缺失,故史家语焉不详<sup>①</sup>。1920年10月18日梁启超致信胡适,希望胡评阅《清代学术概论》,并称自己准备撰文讨论《中国哲学史大纲》,另外,还有“超对于白话诗问题,稍有意见,顷正作一文,二三日内可成,亦欲与公上下其议论”<sup>②</sup>。《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收有一大约写于1920年底或1921年初的《胡适致陈独秀》,其中也涉及此事:

梁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告诉他“这些问题我们这三年都讨论过了。我很不愿意他来旧事重提,势必又引起我们许多无谓的笔墨官司”,他才不发表了。<sup>③</sup>

以梁启超之“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见胡适暴得大名,竟“有时稍露一点点争胜之意”<sup>④</sup>,如此性情,不大可能因后辈的反驳而隐匿自己的意见。查《张元济日记》,1920年10月21日张氏往访梁启超时,梁“言有论本朝诗学一稿,亦即可交稿”<sup>⑤</sup>。据夏晓虹考证,梁氏信函与张氏日记所述,应同指一文,即梁启超为选编金和与黄遵宪二家诗所写之序。书未编成,序也未定稿,可这则收入《饮冰室合集》的《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sup>⑥</sup>,对于理解这场隐匿在历史深处的争论,还是很有帮助的。

梁启超的基本观点是“因为诗是一种技术,而且是一种美的

① 张朋园《胡适与梁启超——两代知识分子的亲和与排拒》(见李又宁主编、纽约天外出版社1990年12月印行的《胡适与他的朋友》第一集)着重讨论梁、胡政治上的接触、学术上的见解、彼此的友谊三方面,其中涉及关于白话诗的争论,可参考。

② 梁启超致胡适信,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922页。

③ 《胡适致陈独秀》《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19~120页。

④ 参见1929年1月20日胡适参加梁启超大殓归来所写的日记《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八册。

⑤ 《张元济日记》下册77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⑥ 参见夏晓虹《诗骚传统与文学改良》第293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

技术”故“格律是可以不讲的，修辞和音节却要十分注意”。自称“并不反对白话诗”的任公先生，在批评守旧的“老先生”不该蔑视文学史上早已“粲然可观”的白话诗的同时，顺带扫了一下完全排斥文言的“偏激之论”：

至于有一派新进青年，主张白话为唯一的新文学，极端排斥文言，这种偏激之论，也和那些老先生不相上下。就实质方面论，若真有好意境好资料，用白话也做得出好诗，用文言也做得出好诗。如其不然，文言诚属可厌，白话还加倍可厌。

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论调，当然是胡适等新派人士所不愿接纳的。说梁启超因胡适的反驳而不愿发表此文，目前尚无确凿证据，但梁氏此文迟迟未能定稿，起码是知道其立说关系重大，需要从容斟酌。白话缺乏锤炼，表达复杂的情感与思绪有困难，这是五四时期反对废除文言者常持的见解，梁启超不过是将其限制在新诗写作：“我觉得极端的‘纯白话诗’，事实上算是不可能，若必勉强提倡，恐怕把将来的文学，反趋到笼统浅薄的方向，殊非佳兆。”以上的说法还偏于防守，接下来任公先生开始主动出击了：

我也曾读过胡适之的《尝试集》，大端很是不错。但我觉得他依着词家旧调谱下来的小令，格外好些。为什么呢？因为五代两宋的大词家，大半都懂音乐，他们所创的调，都是拿乐器按拍出来。我们依着他填，只要意境字句都新，自然韵味双美。我们自创新音，何尝不能？可惜我们不懂音乐，只成个“有志未逮”。而纯白话体有最容易犯的一件毛病，就是枝词太多，动辄伤气。试看文言的诗词“之乎者也”，几乎绝对的不用。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伤气，有碍音节。如今做白话诗的人，满纸“的么了哩”，试问从那里得好音节来？……字句既不修饰，加上

许多滥调的语助辞,真成了诗的“新八股腔”了。<sup>①</sup>

批评“满纸的么了哩”的新诗,直接指向已经名满天下的“尝试”,如此刻薄的评价,自然不可能为胡适所接受。至于表彰《尝试集》中“依着词家旧调谱下来的小令,格外好些”,估计也不会让胡适高兴。因为,未能完全摆脱词调的影响,这正是他在《尝试集》的三则序言中所再三检讨的。

而在梁启超,如此立说,绝无挖苦讽刺的意味。日后,梁氏甚至受胡适成功“尝试”的引诱,写作起分行加标点的小词来。即所谓“近忽发词兴”;“日来颇为小词消遣”,并相信“此间可辟出新国土也”<sup>②</sup>。1925年6月22日,梁启超致信胡适,附一小词,且称“即用公写法录一通奉阅,请一评,谓尚要得否?”同月26日,又寄上《好事近》和《西江月》各一首<sup>③</sup>。大概是胡适回赠两诗,7月3日复信中,梁启超除再次附词三首外,还对胡诗略加点评:

两诗妙绝,可算“自由的词”。石湖诗书后那首若能第一句与第三句为韵——第一句仄,第三句平,——则更妙矣。

去年八月那首“月”字和“夜”字用北京话读来算有韵,南边话便不叶了(广东话更远)。念起来总觉不顺嘴。所以拆开都是好句,合诵便觉情味减。这是个人感觉如此,不知对不对?

我虽不敢说无韵的诗绝对不能成立,但终觉其不能移我情。韵固不必拘定什么《佩文斋诗韵》、《词林正韵》等,但取用普通话念去合腔便好。句中插韵固然更好,但

① 《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三,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② 参见梁启超致林志钧及梁启勋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042~1043页。

③ 参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038~1041页。

句末总须有韵(自然非句句之末,隔三几句不妨)。若句末为语助词,则韵挪上一字(如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我总盼望新诗在这种形式下发展。

拙作《沁园春》过拍处试如尊论(犯复),俟有兴,当更改之,但已颇觉不易。又有寄儿曹三词写出呈教(乞赐评)。公勿笑其舐犊否?①

强调新诗必须讲究音节,而且最好有韵,这点与章太炎、鲁迅师徒的意见大致相同②。新诗在寻求突破的过程中“以解放相号召”,惟恐受制于旧诗词曲。可三十年后,朱自清发现,新诗独独接收了“韵脚”这一宗遗产;足见中国诗还在需要韵,而且可以说中国诗总在需要韵”③。此说并未为所有诗人及史家所接受,新诗是否需要押韵,始终是个争议很大的问题。至于称入《尝试后集》的《瓶花》和胡适生前未曾入集的《八月四夜》“两诗妙绝”,实在很有眼光。这可是以理智冷静著称的适之先生平生少有的好情诗,后者以周邦彦《关河令》一词的“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作结,乃巧妙

①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044~1045页。其中若干错漏,据台北世界书局1959年版《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校改。又,1961年9月20日胡适与秘书谈话时,特别提到梁启超“他给我的信很多,有封很长的谈词的信”,指的应该就是这一则(见《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220页)。

② 据曹聚仁《关于章太炎先生的回忆》(见《文思》,北新书局,1937),章太炎认为:“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鲁迅则在《致窦隐夫》(《鲁迅全集》第十二卷556页)中称:“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

③ 《新诗杂话·诗韵》(《朱自清全集》第二卷402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

的文体挪用<sup>①</sup>，前者以范成大《瓶花》作引子，也明白无误地标示其诗学渊源。二诗都是白话，但传统的印记十分清晰，故梁启超一针见血地指认其为“自由的词”。

若是早年，对于如此评价，胡适可能很不高兴。可现在不一样，经由二周以及梁启超的提示，加上自家撰写《白话文学史》和遍选《词选》的体会，胡适对于“白话诗”之夹杂“词调”，有了全新的认识。1928年6月的《白话文学史》自序重提他所理解的白话“有三个意思”<sup>②</sup>，故“白话文学”应该“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这样一来，不只《史记》、《汉书》里有许多白话，乐府歌辞、佛书译本基本上是白话；“唐人的诗歌——尤其是乐府绝句——也有很多的白话作品”。词呢，尤其是东坡、稼轩的小词，不也符合“说得出，听得懂”、“不加粉饰”、“明白晓畅”这白话三大特征吗？当然也该算是“白话文学”了。

作为定本的《白话文学史》只论述到唐代，此前的《国语文学史》则有专门讨论两宋的“白话词”的第三编第四、第五两章。“这

① 初刊《现代评论》二卷46期（1925年10月）的《八月四夜》全诗如下：

我指望一夜的大雨  
把天上的星和月都遮了；  
我指望今夜喝得烂醉，  
把记忆和相思都灭了。

人都静了，  
夜已深了，  
云也散干净了，——  
仍旧是凄清的明月照我归去，——  
而我的酒又早已全醒了。

酒已都醒，  
如何消夜永？

② 在1917年11月20日的《答钱玄同书》中，胡适为反驳对手的批评，曾大为扩展“白话”的含义。

种词用的当日小百姓的言语,写的是当日的感情生活,所以他们是宋代白话文学的代表。”基于这一判断,胡适极为赞赏欧阳修、柳永、李清照、辛弃疾、陆游等人的“白话小词”,称其创作“真是绝妙的文字”,与吴文英那样“古典文学的下下品”不可同日而语<sup>①</sup>。

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编选的《词选》<sup>②</sup>,前有一胡适撰写的自序,将词史分成三段:“苏东坡以前,是教坊乐工与娼家妓女歌唱的词;东坡到稼轩、后村,是诗人的词;白石以后,直到宋末元初,是词匠的词。”对“诗人的词”,胡适最为欣赏:“这些作者都是有天才的诗人,他们不管能歌不能歌,也不管协律不协律,他们只是用词体作新诗。这种‘诗人的词’,起于荆公、东坡,至稼轩而大成。”在叙述词的演变历史时,胡适强调的是“词的用处推广了,词的内容变复杂了,词人的个性也更显出了”,故特别喜欢表彰“绝好的小词”<sup>③</sup>。比如谈论辛弃疾,便是:“他的小令最多绝妙之作;言情、写景、述怀、达意,无不佳妙。辛词的精彩,辛词的永久价值,都在这里。”<sup>④</sup>

胡适本人对于白居易的诗以及辛弃疾的小词早有兴趣,《胡适留学日记》中不乏记载,《四十自述》中也有所交代。只是由于提倡白话诗的需要,胡适方才压抑这一趣味,竭力摆脱“旧诗词”的影响。以“删诗事件”作为标志,胡适开始调整自己的阅读与写作姿态。一方面是白话诗已基本站稳脚跟,不必再刻意回避文言或词调的渗透;另一方面也是因教学需要以及个人兴趣转移,胡适开始选读“旧诗词”。对于如此转折,二周信件到底起多大作用,尚难断言。但写于1928年3月9日的《读双辛夷楼词致李拔可》,希望

① 参见《国语文学史》《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八册92~115页。

② 1958年台北读者书店重印此书时,改题《白话词选》。改题不见得是胡适本人的主意,但起码胡适的论述,容易给人这种印象。

③ 《词选自序》《胡适文存三集》卷八第997~1005页。

④ 参见胡适编选《词选》中论辛弃疾则,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



对方注意自己的小诗“不知颇有词的意味否”，抄录的正是被梁启超断为“自由的词”的《瓶花》，可见梁氏意见受到尊重。这与前几年的不断检讨无法摆脱词调的影响，真有天渊之别。更重要的是以下这段话：

近年因选词之故，手写口诵，受影响不少，故作白话诗，多作词调，但于音节上也有益处，故也不勉强求摆脱。<sup>①</sup>

我想补充的是，促使其作白话诗时“多作词调”的，远不只是“因选词之故”。

1935年12月，文学史家陈子展发表《略论“胡适之体”》，分析胡适新作《飞行小赞》之不同于《尝试集》：

老路没有脱去模仿旧诗词的痕迹，真是好像包细过的脚放大的。新路是只接受了旧诗词的影响，或者说从诗词蜕化出来，好像蚕子已经变成了蛾。即如《飞行小赞》一诗，它的音节好像辛稼轩的一阕小令，却又不像是有意模仿出来的。<sup>②</sup>

两个月后，胡适撰《谈谈“胡适之体”的诗》作答，公开亮明其借鉴词调写作新诗的经验。而且强调这不是“新路”，而是自己驾轻就熟早已“走惯了的一条‘老路’”。对于如何借变换韵脚、松动平仄、调整句式来获得写作的自由，没有比这段自述说得更明白的了：

其实《飞行小赞》也是用“好事近”词调写的，不过词的规矩是上下两半同韵，我却换了韵脚。我近年爱用这个调子写小诗，因为这个调子最不整齐，颇近于说话的自然；又因为这个调子很简短，必须要最简练的句子，不许有一点杂凑堆砌，所以是做诗的最好训练。我向来喜欢

① 《读 双辛夷楼词 致李拔可》《东方杂志》25卷6号，1928年3月。

② 陈子展《略论“胡适之体”》，1935年12月6日《申报·文艺周刊》第6期。

这个调子,偶然用它的格局做我的小诗组织的架子,平仄也不拘,韵脚也可换可不换,句子长短也有时不拘,所以我觉得自由得很。至少我觉得这比勉强凑成一首十四行的“桑籁体”要自由得多了!①

至此,作为新诗人的适之先生,总算完成了艰难的自我调整,直面所谓的“胡适之体”的生机与缺陷,坦然宣布“我近年只做我自己的诗”,而不再力不从心地扮演什么“领路人”的角色。

作为白话诗的提倡者,胡适始终坚守文言/白话这个边界,此乃其安身立命的根基,故矢志不移,这点很好理解。在保卫自己的学术贡献方面,胡适有充分的自觉。从早年的《尝试集 自序》,到晚年的《胡适口述自传》,凡提及新诗,胡适总是死死咬住两个关键词:“白话”与“实验”。至于早年很计较的摆脱词调的影响,二十年代中期开始逐渐松动。到了自己出场介绍如何借鉴小令创作新诗时,我们对“胡适之体”的特色以及走向,便都心中有数了。胡适从来不是大诗人,《尝试集》的价值主要在于“尝试”;但除此之外,语言的清通,意境的平实,还有上接中国诗歌史上的元白诗或苏辛小词,仍然自有一番天地,不该被后来者一笔抹杀②。

## 六、经典地位的确立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横空出世的《尝试集》,一开始辉煌夺目,但很快就遭遇各种严峻的挑战;几经沉浮,历尽沧桑,

① 《谈谈“胡适之体”的诗》《自由评论》12期,1936年2月。

② 胡适晚年的诗友周策纵在《论胡适的诗》(见《胡适杂忆》附录)中称胡适欣赏元、白与袁枚,喜欢看小说;“他早期新诗的试作,往往脱不了浅显绝句、歌行、小令、苏、辛所喜用的中调,以至打油诗等的气氛,不为无故也。”“我以为胡适的诗较好的一面是文字流利,清浅而时露智慧。最好的几首往往有逸趣或韵致,……梁启超说他特别喜欢的还是胡的小词,可说很有道理。”

方才战胜各种巨大的障碍——从艺术趣味到意识形态——最终屹立在世纪末的文学领奖台上(假如“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也算一种奖的话)。这对于本不具有艺术天赋的适之先生来说,实在是个奇迹。

想当初,即便是好朋友,比如陈西滢,也都对胡适的白话诗不太恭维。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中,陈源推举的是《胡适文存》,而不是《尝试集》,理由是:

我不举《尝试集》是因为我不信胡先生是天生的诗人,虽然他有些小诗极可爱。我们只要看他说的:“文中三个条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和“美就是‘懂得性(明白)与‘逼人性(有力)二者加起来自然发生的结果”,就可以知道他的诗不能成家的缘故,同时也可以了解他的说理考据文字的特长了。<sup>①</sup>

被认为不是“天生的诗人”的胡适,竟凭借一部只有若干“极可爱”的“小诗”的《尝试集》,闯入“经典作家”的行列,确实是不可思议。

可细细寻觅,你还是能发现《尝试集》之走向成功,并非纯属偶然。这里包括二十年代之经由“删诗”而产生“定本”,三十年代的经由“辨体”而凝结“风格”,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经由“批判—平反”而形成“经典”。在这中间,作品本身的潜能以及时代思潮的激荡,固然是主要因素,但周氏兄弟的推波助澜,也起了不小的积极作用。

《尝试集》初版时,为其大力鼓吹的,是刚结识不久的好友钱玄同。在《尝试集序》中,擅长“疑古”的玄同先生,对这第一部个人撰写的新诗集褒奖有加:

适之这本《尝试集》第一集里的白话诗,就是用现代的白话达适之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不用古语,不抄袭前人

<sup>①</sup> 陈西滢《西滢闲话》第335页,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3版。

诗里说过的话。我以为的确当得起“新文学”这个词。<sup>①</sup>

不愧是目光如炬的史家,专门在“用现代的白话达适之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上做文章,钱氏此说,即便到了今日,也还站得住脚。

正因为是“第一部”《尝试集》的出版,招来不少批评。其中三胡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先是自称“这二十多年里头,几乎没有一年不在诗里讨生活”的胡怀琛,站出来大批《尝试集》,而且自告奋勇,替胡适改写诗句。在他看来,胡适这一派新诗“根本的缺点”在于:

(一)不能唱。只算白话文,不能算诗。

(二)纤巧。只算词曲,不能算新诗。<sup>②</sup>

如此批评,火气太盛,毫无善意可言,颇有将白话诗一棍子打死的架势。不过一年后上海泰东书局出版此君所编《尝试集》的批评与讨论》,辑录不少相关论述,与后世的“批判集”还是大有差别。其中收有朱执信的《诗的音节》和《答胡怀琛函》,二文初刊《星期评论》第51、52号,着重反驳胡怀琛《读胡适之《尝试集》对新诗音节的批评》,强调“一切文章都要使所用字的高下长短,跟着意思的转折来变换”;“音节决不是就这样可以有刻板的规则定出来的”<sup>③</sup>。朱文反过来嘲笑胡怀琛根本不懂新诗的音节,并且逐一批驳其为《尝试集》所做的修改。

如果说胡怀琛的缺点是“食古不化”,那么,胡先骕的毛病则是“食洋不化”。刊于《学衡》第1、2期的《评《尝试集》》,洋洋洒洒两万余言,大量引用西儒语录,且夹杂不少英文单词,最后只是想说明“《尝试集》之价值与效用,为负性的”,即让人明白“此路不通”。

① 钱玄同《尝试集序》。

② 胡怀琛《胡适之派新诗根本的缺点》,1921年1月11日《时事新报·学灯》。

③ 朱执信《诗的音节》《星期评论》第51号,1920年5月23日。

具体论述时,批评胡诗乃“枯燥无味之教训主义”、“肤浅之征象主义”、“纤巧之浪漫主义”、“肉体之印象主义”,所言多大而无当;至于称集中最佳之诗作为《新婚杂诗》、《送叔永回四川》,则更让人摸不着头脑<sup>①</sup>。如此文风,自然招来读者的反唇相讥。式芬刊于《晨报副镌》的《评尝试集 匡谬》,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故意挑出胡文关于外国文学的四点谬误“略加匡正”,进而指责其“不合于‘学者之精神’”<sup>②</sup>。

至于胡适本人,对胡怀琛“这种不收学费的改诗先生”只是觉得好笑,并没有认真对待。1920年5月和9月的《时事新报·学灯》上,分别刊有胡适致张东荪和胡怀琛的信,对此略加辩驳。称“我很希望大家切实批评我的诗,但我不希望别人替我改诗”<sup>③</sup>,还是比较客气的;下面这段话,可就有点居高临下了:

我在我的《尝试集》再版自序(已付印)里,对于先生最初评《尝试集》的几段意见——胡适之上了钱玄同的当,别人又上了胡适之的当——略有几句评论,因为我认那个意思还有讨论的价值,至于先生后来“正谬”的四条,恕不答辩了。<sup>④</sup>

不屑与胡怀琛争论的适之先生,在《尝试集 再版自序》中,只是以“守旧的批评家”轻轻打发,甚至不提论敌的姓名。相对而言,胡适还是比较在意喝过洋墨水的胡先骕的批评的。《尝试集 四版自序》并没有直接回应《评 尝试集》的具体观点,而是避实就虚,以“胡先骕教授居然很大度的请陀司妥夫士忌来陪我同死同朽,这更是过誉了,我更不敢当了”作结,虽则俏皮,却未免过于轻巧。或

① 胡先骕《评 尝试集》《学衡》第1、2期,1922年1、2月。

② 式芬《评尝试集 匡谬》,1922年2月4日《晨报副镌》。

③ 胡适《致张东荪》,1920年5月12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④ 胡适《答胡怀琛》,1920年9月12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许,两年中销售一万部,而且得到周氏兄弟等“天才都很高”的朋友诸多好评,让胡适有点飘飘然。

虽然胡适颇为谦恭地称自家诗集之所以值得再版,只是“可以使人知道缠脚的人放脚的痛苦”,但广泛征求朋友意见,大规模地增删修订,还是有艺术上的追求。甚至可以说,适之先生其实是踌躇满志,对《尝试集》很有信心,希望其流传久远,这才需要如此精雕细磨。就在撰写《尝试集 四版自序》的前几天,胡适完成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其中述及文学革命时有言:

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

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sup>①</sup>

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胡适不屑与胡怀琛争论,对胡先骕的批评也没有认真回应。可“白话诗”的“反对党”破产了,不等于《尝试集》可以免受批评。接下来,原本处于同一阵营的新诗人的批评,更使胡适难堪。

1923年的中国诗坛,出现两则“横扫千军如卷席”的雄文,一是周灵均的《删诗》,将胡适《尝试集》、郭沫若《女神》、康白情《草儿》、俞平伯《冬夜》等八部新诗集分别以“不是诗”、“未成熟的作品”等罪名大加讨伐<sup>②</sup>。对批评家之为了一己“快意”、“提起一支屠城的笔,扫荡了文坛上一切野草”的做法,鲁迅甚为不满<sup>③</sup>。相对来说,成仿吾的《诗之防御战》更具理论意义。也是拿《尝试集》、《草儿》、《冬夜》等开刀,语气也很激烈,可还是讲道理的。此文发在《创造周报》第1号,批评对象减去郭沫若,添上周作人,颇有“党同伐异”的嫌疑。但指出早期新诗“摆脱了词调”、“洒脱了白话”以

①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211页。

② 周灵均《删诗》《文学周刊》17号,1923年12月。

③ 《“说不出”》《鲁迅全集》第七卷39页。

后,所选择的“小诗”以及“哲理诗”方向存在很大偏差<sup>①</sup>,还是颇有见地的。

笼统地批评白话诗,不管语气如何刻薄,对胡适来说都无伤大雅。到了1926年,才气横溢的新诗人朱湘登场,形势为之一变。在《评闻君一多的诗》中,朱湘称为避免朋友间互相标榜“越熟的人越在学问上彼此激励”,为自己立下这么一个批评准则:

宁可失之酷,不可失之过誉。

其实,不只评闻诗,评胡适、康白情、徐志摩、郭沫若等人的诗集,朱君都取此策略。如欣赏郭沫若的浪漫激情与雄奇想象,可批评其“对于艺术是很忽略的,诚然免不了‘粗’字之讥”;轮到康白情,更是不客气,称其取“反抗的精神与单调的字句”的努力“完全失败了”,批评康君时,顺带连“与康君同行的”俞平伯也一起嘲笑一番。至于徐志摩,朱湘的评价更加刻毒:

徐君没有汪静之的灵感,没有郭沫若的奔放,没有闻一多的幽玄,没有刘梦苇的清秀,徐君只有——借用徐君朋友批评徐君的话——浮浅。<sup>②</sup>

如此脾性,如此眼光,落在《尝试集》上,当然不会特别宽容。刊于1926年4月1日《晨报副刊》上的《新诗评(一)·尝试集》,以这么一句全称判断结尾:

“内容粗浅,艺术幼稚”,这是我试加在《尝试集》上的八个字。

如此“盖棺论定”,乃基于以下几个判断《尝试集》中真正的新诗不多,倒是旧诗或旧诗的变体占优势;在诗歌中谈主义本就是笑话,“胡君居然以诗的经验主义相号召”;胡君的诗没有一首不是平庸

<sup>①</sup> 成仿吾《诗之防御战》《创造周报》第1号,1923年5月。

<sup>②</sup> 参见朱湘《中书集》第328页、376页、379页、382页、397页,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

的”；胡君‘了’字的‘韵尾’用得那么多”，起码证明作者艺术力的薄弱<sup>①</sup>。朱氏的批评，虽稍嫌刻薄，却不无洞见，因而颇受关注。朱自清讲授“新文学研究”课程时，专门引述其批评《尝试集》“‘了’字的‘韵尾’用得太多”<sup>②</sup>；而草川未雨《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之谈及《尝试集》：“没有一首能称得起完全的新诗体，也就没有一首使人满意的”<sup>③</sup>，基本上是抄袭朱湘的意见。

朱湘横刀立马的英姿，预示着新一代诗人的崛起。此后十年，作为新诗人的胡适，基本上隐入历史深处。不只胡适一人，早期白话诗的提倡者，此时已大都归隐山林，很少在诗坛抛头露面了。以至1932年底刘半农编印《初期白话诗稿》时，感慨文艺界的变动“把我们这班当初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一挤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sup>④</sup>。假如不是文学史家陈子展关于“胡适之体”的提法引起争议，胡适与后起的新诗人，很可能就此相忘于江湖。

1935年12月6日《申报·文艺周刊》第6期发表陈子展的《略论“胡适之体”》，谈及“新诗运动隔成功之日还远，到新诗的路决不止一条，不妨殊途而同归”。其中称“胡适之体”也是新诗发展的一条新路<sup>⑤</sup>，引起很大争议。一个月后，还是在《申报·文艺周刊》上，子模发表《新诗的出路与“胡适之体”》，批评胡诗在“旧诗词的骨架中翻筋斗”，体现“有闲阶级的‘闲适的’意态”，并断言“放脚似的‘胡适之体’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新诗出路，在于充实的社会内容以及熟练的口语。文章的结论很明确：“在这个时候还把‘胡适

① 朱湘《新诗评（一）：尝试集》，1926年4月1日《晨报副刊》。

② 参见《朱自清全集》第八卷88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

③ 参见草川未雨《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第51页，北平：海音书局，1929年。

④ 刘半农《初期白话诗稿 序目》，《初期白话诗稿》，北平：星云堂书店影印，1933年。

⑤ 陈子展《略论“胡适之体”》，1935年12月6日《申报·文艺周刊》第6期。



之体’特别提出来,认为新诗的一条路,结果只有‘此路不通’吧。”<sup>①</sup>

在这场争论中;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听说是反对的居多”,这并不出乎胡适意料之外。倒是陈子展的殷切期待<sup>②</sup>,很让胡适感动,于是以《谈谈“胡适之体”的诗》作答,顺便表白自己做诗的三条戒约,连带对批评家之忽略《尝试集》中真正的好诗表示惋惜。

这起码是胡适第三次谈论自己作为早期新诗代表人物的“体”与“派”了。只不过前两回发言不甚要紧,也不被关注,这回可不一样,乃生死攸关。1920年为《老树行》作跋,胡适提及1915年在美国留学时撰写此诗,如何惹来朋友的嘲笑,以至“他们都戏学‘胡适之体’,用作笑柄”<sup>③</sup>。1924年为《胡思永的遗诗》写序,其中有云:“他的诗,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注重意境,第三是能剪裁,第四是有组织,有格式。如果新诗中真有胡适之派,这是胡适之的嫡派。”<sup>④</sup>轮到《谈谈“胡适之体”的诗》,主要是表白“我做诗的戒约至少有这几条”:“第一,说话要明白清楚”;“第二,用材料要有剪裁”;“第三,意境要平实”。梁实秋称这三条中;“惟独胡先生所标榜的‘明白清楚’是不可不特别注意的”,并进而大谈“‘白话诗’亦可释为‘明白清楚的诗’,所以‘明白清楚’应为一切实话诗的共有的特点,不应为‘胡适之体’独有的特点”之类,实在是不得要领,只能理解为梁氏在“借题发挥”<sup>⑤</sup>。胡适倒是很清醒,再三强调这三

① 子模《新诗的出路与“胡适之体”》,1936年1月17日《申报·文艺周刊》第11期。

② 陈子展的《略论“胡适之体”》,是这样结尾的:“胡先生啊!你不要说‘提倡有心,创造无力’。我很希望你仍旧拿出先驱者的精神,在新诗上创造一种‘胡适之体’。”

③ 《跋“老树行”》,见增订四版《尝试集》第171页。

④ 胡适《胡思永的遗诗序》,《胡思永的遗诗》,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

⑤ 梁文着重强调:“近年来新诗有很大一部分日趋于晦涩”,原因是“模仿一部分堕落的外国文学,尤其是模仿所谓‘象征主义’的诗”。见《我也谈谈“胡适之体”的诗》,《自由评论》12期,1936年2月。

大戒约只适应“我自己的诗”，并不具有普遍性与绝对性。

适之先生此文的新意与重点，在于将文体上的“明白清楚”与意境上的“平实淡远”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总算较好地为“胡适之体”做了定位。“在诗的各种意境之中，我自己总觉得‘平实’；‘含蓄’；‘淡远’的境界是最禁得起咀嚼欣赏的。”回首平生，最能代表这一方向、也最值得向读者推荐的，是那首写于1920年11月25日、刊于《新青年》8卷5号的《十一月二十四夜》：

老槐树的影子，  
在月光的地上微晃；  
枣树上还有几个干叶，  
时时做出一种没气力的声响。

西山的秋色几回招我，  
不幸我被我的病拖住了。  
现在他们说快要好了。  
那幽艳的秋天早已过去了。

引录完全诗后，胡适感叹：“这诗的意境颇近于我自己欣羨的平实淡远的意境。十五年来，这种境界似乎还不曾得着一般文艺批评家的赏识。”<sup>①</sup>这里所说的“一般文艺批评家”，当不包括周氏兄弟。因为这首《十一月二十四夜》，正是当初鲁迅和周作人为删诗事复信时所着力表扬的。

经由这一番自我调整与自我表彰，“胡适之体”定位明确了，但其历史意义之得以凸显，还有赖于现代教育制度以及文学史著述的形成。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成果，除“德”、“赛”先生的普及等外，还包括大学课程的巨大变化：此前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成了必修课；一改中国人的崇古倾向，将“近世文学”纳入考察视

① 胡适《谈谈“胡适之体”的诗》《自由评论》第12期，1936年2月。

野,注重“欧洲文学”的讲授等<sup>①</sup>。刚刚过去的“文学革命”,在胡适撰于1922年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还只是个“光明的尾巴”,而1929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则已“登堂入室”。一旦“新文学”的历史成为大学乃至中学课堂讲授的对象,有开创之功的《尝试集》必定优先进入新一代读书人的视野。与之相关的文学史著述,在为“新文学”追根溯源时,也都不可能遗漏胡适的贡献。“中国新文学”课程及著述,作为一种知识传授,首先强调作品的“历史意义”,其次才是已经变化了的“审美标准”。读者不再单独面对具体诗作,而是更多地从整体上思考新文学的历史发展轨迹,这使得本已“退居二线”的《尝试集》重新焕发了“青春”。

对早期白话诗评价不太高的朱自清<sup>②</sup>,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时,似乎故意冷落开创者胡适——仅入选9首,与闻一多的29首、徐志摩的26首、郭沫若的25首,实在不成比例。以篇数计,排在胡适前面的,依次还有李金发、冰心、俞平伯、刘大白、汪静之、康白情、朱自清、何植三、冯至、潘漠华、朱湘、徐玉诺、蓬子等。可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时,却不能不在“初期的诗论”以及“初期的创作”两节中,将胡适排在第一位<sup>③</sup>。与此相类似,王哲甫所撰《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认定胡适“在新诗的创作上并不算是成功”,可还是承认“他在新诗坛上实地试验,为提倡新诗的急先锋”,

---

① 参见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北大精神及其他》246~27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

② 在《选诗杂记》(见《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朱自清称:“我们现在编选第一期的诗,大半由于历史的兴趣:我们要看看我们启蒙期诗人努力的痕迹。他们怎样从旧镣铐里解放出来,怎样学习新语言,怎样寻找新世界。”只有“历史的兴趣”而已,说不上什么榜样了。”

③ 参见《朱自清全集》第八卷85~88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

其功绩不可谓不大”<sup>①</sup>。而表扬“胡适之体”的陈子展,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也给予胡诗恰当的评价:“其实《尝试集》的真价值,不在建立新诗的轨范,不在与人以陶醉于其欣赏里的快感,而在与人以放胆创造的勇气。”<sup>②</sup>

应该说,到了抗战前夕,对于诗人胡适的历史定位,学界的意见已渐趋一致。如果不是五十年代急风骤雨的批胡运动,此故事本该告一段落。可说来有趣,正是这风云突变,以及随之而来的长达二十多年的“冷冻”,使《尝试集》赚够了大批正直学者的同情,以至在七十年代末“重现江湖”时,当即获得不少不虞之誉。甚至可以说,当二十世纪末中国学者投票选举“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时,《尝试集》之所以能够顺利入围,与这被打入冷宫二十多年的“苦难的历程”不无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为统一思想、规范课程而设计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其第一讲第一章第二节“文学革命的理论及其斗争”,本该是胡适最有可能露脸的地方,可开篇竟是“胡适主张的批判”<sup>③</sup>,这几乎预示着此后三十年胡适在大陆学界的命运。1951年出版的王瑶所撰《中国新文学史稿》,虽也批评胡适在五四时期“形式主义的态度”,但毕竟在第二章“觉醒了的歌唱”中开篇明义:“胡适的《尝试集》出版在1920年,是中国的第一部新诗集。”随着政治局势日益紧张,胡适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岌岌可危,越来越趋向于扮演反面角色。1955年,作家出版社刊行丁易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因作者去世,没来得及修改,还在欣赏胡适的《人力车夫》

① 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第100页,北平:杰成印书局,1933年。

② 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第227页,太平洋书店,1937年。

③ 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中国新文学史 教学大纲》,《新建设》4卷4期,1951年7月。

“表示对劳动者的同情”<sup>①</sup>。紧接其后出版的张毕来著《新文学史纲》和刘绶松著《中国新文学史初稿》，都称《尝试集》“不但思想感情不是新的，连表现方法也几乎完全没有新的因素”；至于胡适参加新文化运动，那是因“作为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企图投机取巧，以达到其个人野心和反动的政治目的”<sup>②</sup>。有趣的是，在1955年那场席卷全国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尝试集》领受的炮弹其实是最少的<sup>③</sup>，专门的批判文章只有林彦刊于《西南文艺》1955年2月号的《胡适的 尝试集 批判》。这场批判运动，主要针对的是胡适的“反动政治思想”，而不是什么诗才之高低，故林文也努力在胡诗如何“直接为资产阶级、为帝国主义服务”上做文章。如此偏颇的视角，给日后的平反留下很大的空间——只要政治形势变迁，《尝试集》就可以毫不费力地重返文学史。

接下来的故事很具戏剧性，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路线后，“忽如一夜春风来”，正面评价胡适的论文大量出现在大陆报刊上——此前二十多年，只有台湾、香港和日本有过若干像样的研究论著。而最早集中出现“平反”声音的，莫过于《尝试集》研究。单是1979年，就先后有蓝棣之、秦家琪、文振庭、龚济

---

① 见该书第249页。顺便说一句，胡适发表在《新青年》4卷1号上的这首《人力车夫》，因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 导言》中给予表彰，而后又被各种现代文学史所引录，影响极大，其实，这并非胡适的“代表作”，刊行增订四版《尝试集》时，胡适已将此诗删去，鲁迅等人也未表示异议。

② 参见张毕来《新文学史纲》第一卷86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和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卷4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

③ 参见北京三联书店1955～1956年刊行的八辑《胡适思想批判》。

民、周晓明、朱德发、亦坚等分别撰文“重新评价《尝试集》”<sup>①</sup>，这还不包括若干讨论五四文学革命或新文化运动中的胡适的文章。最后提及的亦坚之作，题为《从鲁迅为胡适删诗说起》，是一则不到五百字的短文，但很值得玩味。该文借用胡适《尝试集 四版自序》的叙述，指出：“单是五四时期鲁迅为胡适删诗一事”，就足以说明鲁迅与胡适的关系非同一般。以鲁迅的崇高地位，来为胡适的重新出场提供合法性，实在是妙不可言。另外几篇论文，也都在论述中提及此充满玄机的逸事。

此后二十年，随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讲授与著述日趋成熟，作为新诗开创者之一，胡适的贡献得到了充分肯定<sup>②</sup>，《尝试集》也就成了每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必须知道的“文学常识”。只要白话诗的路子不被完全否定，这所谓的“新诗的老祖宗”就不可能被一笔抹杀。许多比胡适更有天赋的诗人，比如朱湘，也不可能取而代之。在这个意义上，《尝试集》确实成了“经典之作”。

诗人兼批评家艾略特(T. S. Eliot)在《什么是经典作品》中，曾区分绝对的与相对两种不同的经典作品，主要着眼点在作品的魅力与生存时空。“其一是普遍的经典作品”，不受时间与地域的

---

① 参见刊于《四川师院学报》1979年2期的《中国新诗的开步——重评胡适的《尝试集》和他的诗论》(蓝棣之)、《南京师院学报》1979年3期的《重评胡适的《尝试集》》(秦家琪)、《江汉论坛》1979年3期的《胡适《尝试集》重议》(文振庭)、《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3期的《评胡适的《尝试集》》(龚济民)、《破与立》1979年5期的《重新评价胡适的《尝试集》》(周晓明)、《山东师院学报》1979年5期的《论胡适早期的白话诗主张与写作》(朱德发)和《上海师大学报》1979年2期的《从鲁迅为胡适删诗说起》(亦坚)。

② 进入九十年代，胡适作品大量刊行，最有影响的当属(北京)中华书局陆续推出的《胡适学术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版《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胡适书信集》(3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胡适文集》(12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胡适精品集》(16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胡适文集》(7册)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胡适著译精品选》(19册)。

限制,永久地为全人类所欣赏;其二是那些相对于本国语言中其他文学而言的经典作品,或者是按照某一特定时期的人生观而言的经典作品”。除了个人才华;“普遍的经典作品”之得以产生,还有赖于某一文明、语言、文学乃至心智与习俗的“成熟”<sup>①</sup>。在这一论述框架中,经典的产生明显受制于政治生态及文化霸权。比如,在欧美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十九、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的想象与表述,便因与之密不可分之文明、语言、心智、习俗的“不成熟”,而在很多论者看来不可能具有“普遍性”。美国学者布鲁姆(H. Bloom)所设想的走向经典之路——与政治利益无涉,乃纯粹的美学竞争<sup>②</sup>,起码在东西文化、南北经济尚存在巨大落差的今日,是不太现实的。

即便将论题局限在同一文化传统,经典的推举,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权力的渗透与时代思潮的激荡。尤其是当世人谈论“经典”时,实际上是将“阅读趣味”与“文化记忆”混合起来。许多耳熟能详的作家与作品,并没有真正进入当代人的阅读视野,而不少当代读者欣赏的作品,又未能登大雅之堂。这种“历史的”与“审美的”视角之相对分离,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合理的,因其所设想的目标并不相同。必须经由很长时间的对话与磨合,两条视线才有可能基本重叠——到那时候,专家与公众的趣味依然有异,那是另一个问题。在此之前,作品距离我们太近,其流风余韵依旧影响着今日的文学创作,论者在为某一文学现象、流派、风格、文体追根溯源时,很容易将其做为“鼻祖”或“祸首”来褒贬抑扬。再加上文学史家的推波助澜,我们所面对的,其实并非素面的、而是经由多重化

---

① 参见艾略特《什么是经典作品》,王恩衷编译《艾略特诗学文集》第188~205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

② 参阅 Harold Bloom, *The Western Can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93) 第15~41页。

装 ,因而有着巨大的光环或阴影的作品。

正如本文所着力阐发的《尝试集》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经典之作”,主要不系于胡适本人的才情,很大程度是“革新与守旧”、“文言与白话”、“诗歌与社会”等冲突与对话的产物。在史家眼中,与文学生产同样重要的,是文学接受的历史。而制约着公众趣味与作品前程的,包括若干强有力者的独立判断与积极引导(比如周氏兄弟之应邀删诗),以及作为知识传播的大学体制(比如“中国新文学”课程的开设)<sup>①</sup>。至于因意识形态纷争而导致某部作品“突然死亡”或“迅速解冻”,使得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接受史显得扑朔迷离,因而也更具戏剧性,更值得追踪与玩味。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同样值得我们深思:在经典形成的过程中,作者并非毫无可为。像胡适那样借助于自我完善(不断修订自家作品)、自我阐释(撰写《尝试集》三序)以及自我定位(关于“胡适之体”的论述),有效地影响读者的阅读与史家的评价,这在文学史上既非前无古人,也不是后无来者。因此,在讨论文学生产、文学接受以及文本阐释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已被“杀死”了好多次的“作者”依旧顽强地活着,并迫使史家无法完全漠视其存在。

## 七、版本选择

《尝试集》的版本不少,但最关键的只有初版、再版与增订四版三种。除了专门研究者,一般人阅读的,均是作为定本的增订四版——后世许多影印或重排本,依据的也都是这一经由胡适以及周

<sup>①</sup> 参见 John Guillory, “Canon”,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Edited by Frank Lentricchia and Thomas McLaughli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第 233 ~ 249 页, 中译本见《文学批评术语》张京媛等译,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4 第 319 ~ 340 页。



氏兄弟等共同审定的增订四版。近期比较有新意的版本,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的《尝试集》,一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的《胡适文集》第九卷。前者以增订四版为底本,附录增订四版所删初版、二版诗作。后者将一、二、四版的诗作补齐,依次排列并注明出处。这两种处理方式,都是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尝试集》的全貌——好处是全,缺点则是相对模糊了定本的面目。

本书着眼于“经典”的形成,因而倾向于尊重作者本人的选择,《尝试集》单取增订四版,只是补入一、二版序言,以便凸显胡适思路的演进。另外,1952年9月,胡适曾检点自1922年以来所撰诗作几十首,编成《尝试后集》,可惜不曾正式付印。据毛子水称,胡适在世时,常想编纂《尝试集》以后诗作,并留下《努力集》、《日黄中》、《新诗第二集》、《尝试后集》等遗稿。其中尤以《尝试后集》最为可靠,也最为完整:所录的诗,只有几首不是先生的亲笔;即在这几首里,亦多有先生自己校改的地方。凡见于以前各稿件里的诗而收入这个后集的,差不多每首都有字句上的变动。”故将此集看作适之先生“第二诗集的最后定本”<sup>①</sup>,一点也不过分。此集绝大部分诗作,吟成于1936年前,对于理解“胡适之体”的定型,可说是必不可少。而前、后集的“珠联璧合”,使得胡适诗歌的主要面貌十分清晰。其余未入集的诗作还有不少,与此二集规模大致相当。不想编成胡诗全编,以免过多损伤本就有点勉强的“盛名”。

胡适谈论新诗的文章不少,除《尝试集》三序以及原就作为《尝试后集》附录的《谈谈“胡适之体”的诗》,剩下的要数写于1919年的《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最为重要。至于晚年诗论,基本上是老调重弹。所谓“我的主张,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量,第三要美”,以及“无论诗或文,第一要做通”;“怎么叫做通?第一

---

<sup>①</sup> 参见毛子水《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 后记》《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

要懂文法 ,第二要把意思表达出来。作诗是如此 ,作文也是如此 ”等<sup>①</sup> ,都可在早年著述中找到几乎完全相同的表述。早年的《谈新诗》着眼于整个诗坛的发展动向 ,晚年的“谈话录”又变不出什么新花样 ,有鉴于此 ,本书删繁就简 ,只收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2 年 10 月增订四版《尝试集》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4 年 12 月台一版《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中的《尝试后集》 ,以及原本就有的序言或附录。

2000 年 10 月初至 2001 年 1 月底 ,撰于北京—海德堡—东京

---

<sup>①</sup> 参见《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 23 页、94 页、63 页。



# 尝试集



## 五年八月四日答任叔永( 代序一 )

……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学之器也。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作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今尚需人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耳。……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开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吾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国尽是沙磧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狂言人道臣当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为重轻。”足下定笑我狂耳。……

## 尝试篇( 代序二 )

“ 尝试成功自古无 ” ,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 :自古成功在尝试 !

莫想小试便成功 ,那有这样容易事 ! 有时试到千百回 ,始知前功尽抛弃。即使如此也无愧 ,即此失败便足记。告人此路不通行 ,可使脚力莫浪费。

我生求师二十年 ,今得“ 尝试 ”两个字。作诗做事要如此 ,虽未能到颇有志。作“ 尝试歌 ”颂吾师 ,愿大家都来尝试 !

( 五·九·三〇· )

## 四 版 自 序

《尝试集》是民国九年三月出版的。当那新旧文学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当那初次试作新诗的时候，我对于我自己的诗，选择自然不很严，大家对于我的诗，判断自然也不很严。我自己对于社会，只要求他们许我尝试的自由。社会对于我，也很大度的承认我的诗是一种开风气的尝试。这点大度的承认遂使我的《尝试集》在两年之中销售到一万部。这是我很感谢的。

现在新诗的讨论时期，渐渐的过去了。——现在还有人引了阿狄生，强生，格雷，辜勒律己的话来攻击新诗的运动，但这种“诗云子曰”的逻辑，便是反对论破产的铁证。——新诗的作者也渐渐的加多了。有几位少年诗人的创作，大胆的解放，充满着新鲜的意味，使我一头高兴，一头又很惭愧。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它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我现在看这些少年诗人的新诗，也很像那缠过脚的妇人，眼里看着一班天足的女孩子们跳上跳下，心里好不妒羨！

但是缠过脚的妇人永远不能恢复他的天然脚了。我现在把我这五六年的放脚鞋样，重新挑选了一遍，删去了许多太不成样子的或可以害人的。内中虽然还有许多小脚鞋样，但他们的保存也许可以使人知道缠脚的人放脚的痛苦，也许还有一点历史的用处，所以我也不避讳了。

删诗的事，起于民国九年的年底。当时我自己删了一遍，把删剩的本子，送给任叔永、陈莎菲，请他们再删一遍。后来又送给“鲁



迅”先生删一遍。那时周作人先生病在医院里，他也替我删一遍。后来俞平伯来北京，我又请他删一遍。他们删过之后，我自己又仔细看了好几遍，又删去了几首，同时却也保留了一两首他们主张删去的。例如《江上》，“鲁迅”与平伯都主张删，我因为当时的印象太深了，舍不得删去。又如《礼》一首（初版再版皆无），“鲁迅”主张删去，我因为这诗虽是发议论，却不是抽象的发议论，所以把他保留了。有时候，我们也有很不同的见解。例如《看花》一首，康白情写信来，说此诗很好，平伯也说他可存，但我对于此诗，始终不满意，故再版时，删去了两句，四版时竟全删了。

再版时添的六首诗，此次被我删去了三首，又被“鲁迅”、叔永、莎菲删去了一首。此次添入《尝试集》十五首，《去国集》一首。共计：

《尝试集》第一编，删了八首，又《尝试篇》提出代序，共存十四首。

《尝试集》第二编，删了十六首，又《许怡荪》与《一笑》移入第三编，共存十七首。

《尝试集》第三编，旧存的两首，新添的十五首，共十七首。

《去国集》，删去了八首，添入一首，共存十五首。

共存诗词六十四首。

有些诗略有删改的。如《尝试篇》删去了四句，《鸽子》改了四个字，《你莫忘记》添了三个“了”字，《一笑》改了两处，《例外》前在《新青年》上发表时有四章，现在删去了一章。这种地方，虽然微细的很，但也有很可研究之点。例如《一笑》第二章原文

那个人不知后来怎样了。

蒋百里先生有一天对我说，这样排列，便不好读，不如改作

那个人后来不知怎样了。

我依他改了，果然远胜原文。又如《你莫忘记》第九行原文是

暖哟，……火就要烧到这里。

康白情从三万里外来信，替我加上了一个“了”字，方才合白话的文

法。做白话的人 ,若不讲究这种似微细而实重要的地方 ,便不配做白话 ,更不配做白话诗。

《尝试集》初版有钱玄同先生的序和我的序。这两篇序都有了一两万份流传在外 ;现在为减轻书价起见 ,我把他们都删去了。(我的《自序》现收入《胡适文存》里。)

我借这个四版的机会 ,谢谢那一班帮我删诗的朋友。至于我在再版自序里说的那种“戏台里喝彩”的坏脾气 ,我近来也很想矫正他 ,所以我恭恭敬敬的引东南大学教授胡先骕先生“评”《尝试集》的话来作结。胡先骕教授说 :

胡君之《尝试集》,死文学也。以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 ,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将死 ,必精神神失其常度 ,言动出于常轨。胡君辈之诗之卤莽灭裂趋于极端 ,正其必死之征耳。

这几句话 ,我初读了觉得很像是骂我的话 ,但这几句话是登在一种自矢“平心而言 ,不事嫚骂 ,以培俗”的杂志上的 ,大概不会是骂罢 ?无论如何 ,我自己正在愁我的解放不彻底 ,胡先骕教授却说我“卤莽灭裂趋于极端” ,这句话实在未免过誉了。至于“必死必朽”的一层 ,倒也不在我的心上 ,况且胡先骕教授又说 :

陀司妥夫士忌 ,戈尔忌之小说 ,死文学也。不以其轰动一时遂得不死不朽也。

胡先骕教授居然很大度的请陀司妥夫士忌和戈尔忌来陪我同死同朽 ,这更是过誉了 ,我更不敢当了。

十一 ,三 ,十 胡适

# 第一编

## 蝴 蝶

两个黄蝴蝶，  
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  
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  
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  
天上太孤单。

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 赠 朱 经 农

经农自美京来访余于纽约，畅谈极欢。三日之留，忽忽遂尽。别后终日不乐，作此寄之。

六年你我不相见，  
见时在赫贞江边；  
握手一笑不须说：  
你我于今更少年。  
回头你我年老时，  
粉条黑板作讲师；  
更有暮气大可笑，  
喜作丧气颓唐诗。  
那时我更不长进，  
往往喝酒不顾命；  
有时尽日醉不醒，  
明朝醒来害酒病。  
一日大醉几乎死，  
醒来忽然怪自己：  
父母生我该有用，  
似此真不成事体。  
从此不敢大糊涂，  
六年海外颇读书。  
幸能勉强不喝酒，

未可全断淡巴菰。  
年来意气更奇横，  
不消使酒称狂生。  
头发偶有一茎白，  
年纪反觉十岁轻。  
旧事三天说不全，  
且喜皇帝不姓袁，  
更喜你我都少年，  
“辟克匿克”来江边，  
赫贞江水平可怜，  
树下石上好作筵，  
黄油面包颇新鲜，  
家乡茶叶不费钱，  
吃饱喝胀活神仙，  
唱个“蝴蝶儿上天”！

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

（注）西人携食物出游，即于野外聚食之，谓之“辟克匿克”（Picnic）。

## 中 秋

九月十一夜 ,为旧历八月十五夜。

小星躲尽大星少 ,  
果然今夜清光多 !  
夜半月从江上过 ,  
一江江水变银河。

## 江 上

十一月一日大雾，追思夏间一景，因此成诗。

雨脚渡江来，  
山头冲雾出。  
雨过雾亦收，  
江楼看落日。



## 黄克强先生哀辞

当年曾见将军之家书，

字迹娟逸似大苏。

书中之言竟何如？

“一欧爱儿，努力杀贼！”——

八个大字，读之使人慷慨奋发而爱国。

呜乎将军，何可多得！

五年十一月九日

## 十二月五夜月

明月照我床，卧看不肯睡。  
窗上青藤影，随风舞娟媚。

我爱明月光，更不想什么。  
月可使人愁，定不能愁我。

月冷寒江静，心头百念消。  
欲眠君照我，无梦到明朝！

## 沁园春·二十五岁生日自寿

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是我二十五岁的生日。独坐江楼 ,回想这几年思想的变迁 ,又念不久即当归去 ,因作此词 ,并非自寿 ,只可算是一种自誓。

弃我去者 ,二十五年 ,不可重来。看江明雪霁 ,吾当寿我 ,且须高咏 ,不用衔杯。种种从前 ,都成今我 ,莫更思量更莫哀。从今后 ,要怎么收果 ,先那么栽。

忽然异想天开 ,似天上 诸仙采药回。有丹能却老 ,鞭能缩地 ,芝能点石 ,触处金堆。我笑诸仙 ,诸仙笑我。敬谢诸仙我不才 ,葫芦里 ,也有些微物 ,试与君猜。

## 病中得冬秀书

一

病中得他书 ,不满八行纸 ,  
全无要紧话 ,颇使我欢喜。

二

我不认得他 ,他不认得我 ,  
我总常念他 ,这是为什么 ?  
岂不因我们 ,分定长相亲 ,  
由分生情意 ,所以非路人 ?  
海外“土生子” ,生不识故里 ,  
终有故乡情 ,其理亦如此。

三

岂不爱自由 ? 此意无人晓 :  
情愿不自由 ,也是自由了。

六年一月十六日

## “赫贞旦”答叔永

叔永昨以五言长诗寄我，有“已见赫贞夕，未见赫贞旦。何当侵晨去，起君从枕畔”之句。作此报之。

“赫贞旦”如何？听我告诉你。  
昨日我起时，东方日初起，  
返照到天西，彩霞美无比。  
赫贞平似镜，红云满江底。  
江西山低小，倒影入江紫。  
朝霞渐散了，剩有青天好。  
江中水更蓝，要与天争皎。  
休说海鸥闲，水冻捉鱼难，  
日日寒江上，飞去又飞还。  
何如我闲散，开窗面江岸，  
清茶胜似酒，面包充早饭。  
老任倘能来，和你分一半。  
更可同作诗，重咏“赫贞旦”。

六年二月十九日

## 生 查 子

前度月来时，  
仔细思量过。  
今度月重来，  
独自临江坐。  
风打没遮楼，  
月照无眠我。  
从来没见过，  
梦也如何做？

六年三月六日

## 景不徙篇

《墨经》云：“景不徙，说在改为。”说曰：“景。光至景亡。若在，尽古息。”《庄子·天下》篇云：“飞鸟之影未尝动也。”此言影已改为而后影已非前影。前影虽不可见而实未尝动移也。

飞鸟过江来，投影在江水。  
鸟逝水长流，此影何尝徙？

风过镜平湖，湖面生轻绉。  
湖更镜平时，毕竟难如旧。

为他起一念，十年终不改。  
有召即重来，若亡而实在。

六年三月六日

# 朋 友 篇

(寄怡荪、经农)

(将归诗之一)

粗饭还可饱 ,破衣不算丑。  
人生无好友 ,如身无足手。  
吾生所交游 ,益我皆最厚。  
少年恨污俗 ,反与污俗偶。  
自视六尺躯 ,不值一杯酒。  
倘非朋友力 ,吾醉死已久。  
从此谢诸友 ,立身重抖擞。  
去国今七年 ,此意未敢负。  
新交遍天下 ,难细数谁某。  
所最敬爱者 ,也有七八九。  
学理互分割 ,过失赖弹纠。  
清夜每自思 ,此身非吾有 :  
一半属父母 ,一半属朋友。  
便即此一念 ,足鞭策吾后。  
今当重归来 ,为国效奔走。  
可怜程(乐亭) 郑(仲诚) 张(希古) ,  
少年骨已朽。  
作歌谢吾友 ,泉下人知否 ?

六年六月一日



## 文学篇(别叔永、杏佛、覲庄)

### (将归诗之二)

吾将归国 ,叔永作诗赠别。有“君归何人劝我诗”之句。因念吾数年来之文学的兴趣 ,多出于吾友之助。若无叔永、杏佛 ,定无《去国集》。若无叔永、覲庄 ,定无《尝试集》。感此作诗别叔永 ,杏佛 ,覲庄。

我初来此邦 ,所志在耕种。  
文章真小技 ,救国不中用。  
带来千卷书 ,一一尽分送。  
种菜与种树 ,往往来入梦。

匆匆复几时 ,忽大笑吾痴。  
救国千万事 ,何事不当为 ?  
而吾性所适 ,仅有一二宜。  
逆天而拂性 ,所得终希微。

从此改所业 ,讲学复议政。  
故国方新造 ,纷争久未定。  
学以济时艰 ,要与时相应。  
文章盛世事 ,今日何消问 ?

明年任与杨 ,远道来就我。  
山城风雪夜 ,枯坐殊未可。  
烹茶更赋诗 ,有倡还须和。

诗炉久灰冷 ,从此生新火。

前年任与梅 联盟成劲敌。  
与我论文学 经岁犹未歇。  
吾敌虽未降 吾志乃更决。  
暂不与君辩 且著《尝试集》。

回首四年来 积诗可百首。  
做诗的兴味 大半靠朋友：  
佳句共欣赏 论难见忠厚。  
如今远别去 此乐难再有。

暂别不须悲 诸君会当归。  
请与诸君期 明年荷花时，  
春申江之湄 有酒盈清卮，  
无客不能诗 同作归来辞！

六年六月一日

---

（注）吾初至美国，习农学一年半，后改入文科习政治经济，兼治文学哲学，最后乃专治哲学。

# 百字令(六年七月三夜,太平洋舟中,见月,有怀。)

几天风雾，  
险些儿把月圆时孤负。  
待得他来，  
又还被如许浮云遮住！  
多谢天风，  
吹开明月，  
万顷银波怒！  
孤舟载月，  
海天冲浪西去！  
念我多少故人，  
如今都在明月飞来处。  
别后相思如此月，  
绕遍地球无数！  
几颗疏星，  
长天空阔，  
有湿衣凉露。  
低头自语：  
“吾乡真在何许？”

## 第二编

## 鸽子

云淡天高 ,好一片晚秋天气 !  
有一群鸽子 ,在空中游戏。  
看他们三三两两 ,  
回环来往 ,  
夷犹如意 ,——  
忽地里 ,翻身映日 ,白羽衬青天 ,十分鲜丽 !

## 老 鸦

## —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 二

天寒风紧，无枝可栖。  
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又寒又饥。——  
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飞；  
也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把小米！

## 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

雪色满空山，  
抬头忽见你！  
我不知何故，  
心里很欢喜；  
踏雪摘下来，  
夹在小书里；  
还想做首诗，  
写我欢喜的道理。  
不料此理很难写，  
抽出笔来还搁起。

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 新婚杂诗(五首存一首)

十三年没见面的相思 ,于今完结。  
把一桩桩伤心旧事 ,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住我 ,  
我也不说我对不住你 ,——  
且牢牢记取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



## 老洛伯“ Auld Robin Gray ”

### 序

著者为苏格兰女诗人 Anne Lindsay 夫人( 1750 ~ 1825 )。夫人少年时即以文学见称于哀丁堡。初嫁 Andrew Barnard ,夫死 ,再嫁 James Bland Burges。当代文人如 Burke 及 Sheridan 皆与为友。Scott 尤敬礼之。

此诗为夫人二十一岁时所作 ,匿名刊行。诗出之后 ,风行全国 ,终莫知著者为谁也。后五十二年 ,Scott 于所著小说中偶言及之 ,而夫人已老 ,后二年 ,死矣。

此诗向推向世界情诗之最哀者。全篇作村妇口气 ,语语率真 ,此当日之白话诗也。

### 一

羊儿在栏 ,牛儿在家 ,  
静悄悄地黑夜 ,  
我的好人儿早在我身边睡了 ,  
我的心头冤苦 ,都进作泪如雨下。

### 二

我的吉梅他爱我 ,要我嫁他。  
他那时只有一块银圆 ,别无什么 ;  
他为了我渡海去做活 ,

要把银子变成金 ,好回来娶我。

### 三

他去了没半月 ,便跌坏了我的爹爹 ,病倒了我的妈妈 ;  
剩了一头牛 ,又被人偷去了。

我的吉梅他只是不回家 !

那时老洛伯便来缠着我 ,要我嫁他。

### 四

我爹爹不能做活 ,我妈他又不能纺纱 ,  
我日夜里忙着 ,如何养得活这一家 ?  
多亏得老洛伯时常帮衬我爹妈 ,  
他说 :“ 锦妮 ,你看他两口儿分上 ,嫁了我罢 ”。

### 五

我那时回绝了他 ,我只望吉梅回来讨我。  
又谁知海里起了大风波 ,——  
人都说我的吉梅他翻船死了 !  
只抛下我这苦命的人儿一个 !

### 六

我爹爹再三劝我嫁 ;  
我妈不说话 ,他只眼睁睁地望着我 ,  
望得我心里好不难过 !

我的心儿早已在那大海里，  
我只得由他们嫁了我的身子！

## 七

我嫁了还没多少日子，  
那天正孤孤凄凄地坐在大门里，  
抬头忽看见吉梅的鬼！——  
却原来真是他，他说：“锦妮，我如今回来讨你”。

## 八

我两人哭着说了许多言语，  
我让他亲了一个嘴，便打发他走路。  
我恨不得立刻死了，——只是如何死得下去！  
天呵！我如何这般命苦！

## 九

我如今坐也坐不下，那有心肠纺纱？  
我又不敢想着他：  
想着他须是一桩罪过。  
我只得努力做一个好家婆，  
我家老洛伯他并不曾待差了我。

七年三月一夜译

## Auld Robin Gray

When the sheep are in the fauld and the kye at hame ,  
And a 'the warld to rest are gane ,  
The waes o 'my heart fa 'in showers frae my e 'e ,  
While my gudeman lies sound by me .

Young Jamie lo 'ed me weel and sought me for his bride ;  
But saving a croun he had naething else beside :  
To make the croun a pund ,young Jamie gaed to sea ;  
And the croun and the pund were baith for me .

He hadna been awa 'a week but only twa ,  
When my father brak his arm and the cow was stown awa ;  
My mother she felt sick ,—and my Jamie at the sea—  
And auld Robin Gray came a - courtin ' me .

My father couldna work and my mother couldna spin ;  
I toil 'd day and night but their bread I couldna win ;  
Auld Rob maintain 'd them baith and wi 'tears in his e 'e  
Said Jennie ,for their sakes ,O ,marry me !

My heart it said nay ;I look 'd for Jamie back ;  
But the wind it blew high and the ship it was a wrack ;

His ship it was a wrack - Why didna Jamie dee ?  
Or why do I live to cry ,Wae 's me ?

My father urged me sair ,my mother didna speak ;  
But she look 'd in my face till my heart was like to break :  
They gi 'ed him my hand ,but my heart was at the sea ;  
Sae auld Robin Gray he was gudeman to me .

I hadna been a Wife a week but only four ,  
When mournfu ' as I sat on the stane at the door ,  
I saw my Jamie 's wraith ,—for I couldna think it he ,  
Till he said ' I 'm come hame to marry thee . '

O sair ,sair did we greet ,and muckle did we say ;  
We took but ae kiss ,and I bad him gang away ;  
I wish that I were dead ,but I 'm no like to dee ;  
And why was I born to say ,Wae 's me ?

I gang like a ghaist ,and I carena to spin ;  
I daurna think on Jamie ,for that wad be a sin ;  
But I 'll do my best a gude wife aye to be ,  
For auld Robin Gray he is kind unto me .

——Lady Anne Lindsay

## 你莫忘记

(参看《太平洋》第十期“劫余生”通信)

你莫忘记：

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兵，  
逼死了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枪毙了高升！……

你莫忘记：

是谁砍掉了你的手指，  
是谁把你老子打成了这个样子！  
是谁烧了这一村，……

暖哟！……火就要烧到这里了，——

你跑罢！莫要同我一齐死！……

回来！……

你莫忘记：

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  
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  
都可以，——  
总该不至——如此！……

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初稿

七年八月二十三夜改稿

十一年三月十夜改稿

## 如 梦 令

去年八月作《如梦令》两首：

—

他把门儿深掩，不肯出来相见。  
难道不关情？怕是因情生怨。  
休怨！休怨！他日凭君发遣。

二

几次曾看小像，几次传书来往，  
见见又何妨！休做女孩儿相。  
凝想，凝想，想是这般模样！

今年八月与冬秀在京寓夜话，忽忆一年前旧事，遂和前词，成此阙。

天上风吹云破，月照你我两个。  
问你去年时，为甚闭门深躲？  
“谁躲？谁躲？那是去年的我！”

## 十二月一日奔丧到家

往日归来 ,才望见竹竿尖 ,才望见吾村 ,  
便心头乱跳 ,遥知前面 ,老亲望我 ,含泪相迎。  
“ 来了？好呀！”——更无别话 ,说尽心头欢喜悲酸无限情。  
偷回首 ,揩干泪眼 ,招呼茶饭 ,款待归人。

今朝 ,——  
依旧竹竿尖 ,依旧溪桥 ,——  
只少了我的心头狂跳！——  
何消说一世的深恩未报！  
何消说十年来的家庭梦想 ,都——云散烟销！——  
只今日到家时 ,更何处能寻他那一声“ 好呀 ,来了！”



## 关不住了！

我说“我把心收起，  
像人家把门关了，  
叫爱情生生的饿死，  
也许不再和我为难了。”

但是五月的湿风，  
时时从屋顶上吹来；  
还有那街心的琴调  
一阵阵的飞来。  
一屋里都是太阳光，  
这时候爱情有点醉了，  
他说“我是关不住的，  
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

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译美国 Sara Teasdale 的 Over the Roofs

## 希 望

要是天公换了卿和我，  
该把这糊涂世界一齐都打破，  
要再磨再炼再调和，  
好依着你我的安排，把世界重新造过！

八年二月二十八日译英人 Fitzgerald 所译波斯诗人 Omar Khayyam( d1123 A.D. )的 Rubaiyat( 绝句 )诗第一百零八首。

Ah ! Love could you and I with Him conspire  
To grasp this Sorry Scheme of Things entire ,  
Would not we shatter it to bits and then  
Remould it nearer to the Heart 's Desire

## “ 应      该 ”

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  
但他总劝我莫再爱他。

他常常怪我；

这一天，他眼泪汪汪的望着我，

说道：“你如何还想着我？

想着我，你又如何能对他？

你要是当真爱我，

你应该把爱我的心爱他，

你应该把待我的情待他。”

他的话句句都不错：——

上帝帮我！

我“应该”这样做！

八年三月二十日

## 一 颗 星 儿

我喜欢你这颗顶大的星儿。  
可惜我叫不出你的名字。  
平日月明时，月光遮尽了满天星，总不能遮住你。  
今天风雨后，闷沉沉的天气，  
我望遍天边，寻不见一点半点光明，  
回转头来，  
只有你在那杨柳高头依旧亮晶晶地。

八年四月二十五夜

## 威 权

威权坐在山顶上，  
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  
他说：“你们谁敢倔强？  
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  
头颈上的铁索渐渐的磨断了。  
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我们要造反了！”

奴隶们同心合力，  
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  
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

八年六月十一夜。是夜陈独秀在北京被捕，半夜后，某报馆电话来，说日本东京有大罢工举动。

## 小 诗

也想不相思，  
可免相思苦。  
几次细思量，  
情愿相思苦！

有一天我在张慰慈的扇子上，写了两句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陈独秀引我这两句话，做了一条随感录（《每周评论》二十五号）加上一句按语道：“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这条随感录出版后三日，独秀就被军警捉去了，至今还不曾出来，我又引他的话，做了一条随感录（《每周评论》二十八号。）后来我又想这个意思可以入诗，遂用“生查子”词调，做了这首小诗。

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 乐 观

《每周评论》于八月三十日被封禁，国内的报纸很多替我们抱不平的。我做这首诗谢谢他们。

### 一

“这柯大树狠可恶，  
他碍着我的路！  
来！  
快把他斫倒了，  
把树根也掘去。——  
哈哈！好了！”

### 二

大树被斫做柴烧，  
树根不久也烂完了。  
斫树的人狠得意，  
他觉得狠平安了。

### 三

但是那树还有许多种子，——

狠小的种子 ,裹在有刺的壳里 ,——  
上面盖着枯叶 ,  
叶上堆着白雪 ,  
狠小的东西 ,谁也不注意。

#### 四

雪消了 ,  
枯叶被春风吹跑了。  
那有刺的壳都裂开了 ,  
每个上面长出两瓣嫩叶 ,  
笑迷迷的好像是说 :  
“ 我们又来了 !”

#### 五

过了许多年 ,  
坝上田边 ,都是大树了。  
辛苦的工人 ,在树下乘凉 ;  
聪明的小鸟 ,在树上歌唱 ,——  
那斫树的人到那里去了 ?

八年九月二十夜



# 上 山

（一首忏悔的诗）

“努力！努力！  
努力望上跑！”

我头也不回，  
汗也不揩，  
拼命的爬上山去。

“半山了！努力！  
努力望上跑！”

上面已没有路，  
我手攀着石上的青藤，  
脚尖抵住岩石缝里的小树，  
一步一步的爬上山去。

“小山点！努力！  
努力望上跑！”

树桩扯破了我的衫袖，  
荆棘刺伤了我的双手，

我好不容易打开了一线路爬上山去。

上面果然是平坦的路，  
有好看的野花，  
有遮阴的老树。

但是我可倦了，  
衣服都被汗湿遍了，  
两条腿都软了。

我在树下睡倒，  
闻着那扑鼻的草香，  
便昏昏沉沉的睡了一觉。

睡醒来时，天已黑了，  
路已行不得了，  
“努力”的喊声也灭了。……

猛省！猛省！  
我且坐到天明，  
明天绝早跑上最高峰，  
去看那日出的奇景！

八年九月二十八夜

## 一颗遭劫的星

北京《国民公报》响应新思潮最早，遭忌也最深。今年十一月被封，主笔孙几伊君被捕。十二月四日判决，孙君定临禁十四个月的罪。我为这事做这首诗。

热极了！  
更没有一点风！  
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  
动也不动一动！

好容易一颗大星出来；  
我们知道夜凉将到了：——  
仍旧是热，仍旧没有风，  
只是我们心里不烦躁了。

忽然一大块黑云，  
把那颗清凉光明的星围住；  
那块云越积越大，  
那颗星再也冲不出去！

乌云越积越大，  
遮尽了一天的明霞；  
一阵风来，

拳头大的雨点淋漓打下！

大雨过后，  
满天的星都放光了。  
那颗大星欢迎着他们，  
大家齐说：“世界更清凉了！”

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 第三编

# 许 怡 荪

## 序

七月五日 ,我与子高过中正街 ,这是死友许怡荪的住处。旁晚与诸位朋友游秦淮河 ,船过金陵春 ,回想去年与怡荪在此吃夜饭 ,子高、肇南都在座 ,我们开窗望见秦淮河 ,那是我第一次见此河 ,今天第二次见秦淮 ,怡荪死已一年多了 !夜十时我回寓再过中正街 ,凄然堕泪。人生能得几个好朋友 ?况怡荪益我最厚 ,爱我最深 ,期望我最笃 !我到此四日 ,竟不忍过中正街 ,今日无意中两次过此 ,追想去年一月之夜话 ,那可再得 ?归寓后作此诗 ,以写吾哀。

怡荪 !

我想像你此时还在此 !

你跑出门来接我 ,

我知道你心里欢喜。

你夸奖我的成功 ,

我也爱受你的夸奖 ;

因为我的成功你都有份 ,

你夸奖我就同我夸奖你一样。

我把一年来的痛苦也告诉你 ,

我觉得心里怪轻松了 ;

因为有你分去了一半 ,

这担子自然就不同了。

我们谈到半夜，  
半夜我还舍不得就走。  
我记得你临别时的话：  
“适之，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车子忽然转弯，  
打断了我的梦想。  
怡荪！  
你的朋友还同你在时一样！

# 一 笑

十几年前，  
一个人对我笑了一笑。  
我当时不懂得什么，  
只觉得他笑的很好。

那个人后来不知怎样了，  
只是他那一笑还在：  
我不但忘不了他，  
还觉得他越久越可爱。  
我借他做了许多情诗，  
我替他想出种种境地：  
有的人读了伤心，  
有的人读了欢喜。

欢喜也罢，伤心也罢，  
其实只是那一笑  
我也许不会再见着那笑的人，  
但我很感谢他笑的真好。



## 我们三个朋友

（九 八 二二 赠任叔永与陈莎菲。）

### 上

雪全消了，  
春将到了，  
只是寒威如旧。  
冷风怒号，  
万松狂啸，  
伴着我们三个朋友。

风稍歇了，  
人将别了，——  
我们三个朋友。  
寒流秃树，  
溪桥人语，——  
此会何时重有？

### 下

别三年了！  
月半圆了，

照着一湖荷叶；  
照着钟山，  
照着台城，  
照着高楼清绝。

别三年了，  
又是一种山川了，——  
依旧我们三个朋友。  
此景无双，  
此日最难忘，——  
让我的新诗祝你们长寿！

## 湖 上

九 八 二四 夜游后湖——即玄武湖，——主人王伯秋要我作诗，我竟做不出诗来，只好写一时所见，作了这首小诗。

水上一个萤火，  
水里一个萤火，  
平排着，  
轻轻地，  
打我们的船边飞过。  
他们俩儿越飞越近，  
渐渐地并作了一个。

## 艺 术

报载英国第一“莎翁剧家”福北洛柏臣(Forbes - Robertson)(复姓)现在不登台了,他最后的《告别辞》说他自己做戏的秘诀只是一句话:我做戏要做的我自己充分愉快。”这句话不单可适用于做戏;一切艺术都是如此。病中无事,戏引伸这话,做成一首诗。

我忍着一副眼泪,  
扮演了几场苦戏,  
一会儿替人伤心,  
一会儿替人着急。

我是一个多情的人,  
这副眼泪如何忍得?  
做到了最伤心处,  
我的眼泪热滚滚的直滴。

台下的人看见了,  
不住的拍手叫好。——  
他们看他们的戏,  
那懂得我的烦恼?

## 例 外

我把酒和茶都戒了，  
近来戒到淡巴菰；  
本来还想戒新诗，  
只怕我赶诗神不去。

诗神含笑说：

“我来决不累先生。  
谢大夫不许你劳神，  
他不能禁你偶然高兴。”

他又涎着脸劝我：

“新诗做做何妨？  
做得一首好诗成，  
抵得吃人参半磅！”

九,十,六 病中

## 梦 与 诗

都是平常经验，  
都是平常影象，  
偶然涌到梦中来，  
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

都是平常情感，  
都是平常言语，  
偶然碰着个诗人，  
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

醉过才知酒浓，  
爱过才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诗，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自跋）这是我的“诗的经验主义”（Poetic empiricism）。简单一句话：做梦尚且要经验做底子，何况做诗？现在人的大毛病就在爱做没有经验做底子的诗。北京一位新诗人说“棒子面一根一根的往嘴里送”；上海一位诗学大家说“昨日蚕一眠，今日蚕二眠，明日蚕三眠，蚕眠人不眠！”吃面养蚕何尝不是世间最容易的事？但没有这种经验的人，连吃面养蚕都不配说。——何况做诗？

## 礼！

他死了父亲不肯磕头，  
你们大骂他。  
他不能行你们的礼，  
你们就要打他。

你们都能呢呢咧咧的哭，  
他实在忍不住要笑了。  
你们都有现成的眼泪，  
他可没有，——他只好跑了。

你们串的是什么丑戏，  
也配抬出“礼”字的大帽子！  
你们也不想想，  
究竟死的是谁的老子？

九，十一，二五

## 十一月二十四夜

老槐树的影子  
在月光的地上微晃；  
枣树上还有几个干叶，  
时时做出一种没气力的声响。

西山的秋色几回招我，  
不幸我被我的病拖住了。  
现在他们说我快要好了，  
那幽艳的秋天早已过去了。

九,十一,二五



## 我们的双生日(赠冬秀)

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即阴历十一月初八日,是我的阳历生日,又是冬秀的阴历生日。

他干涉我病里看书,  
常说:“你又不要命了!”  
我又恼他干涉我,  
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  
我们常常这样吵嘴,——  
每回吵过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们的双生日,  
我们订约,今天不许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诗。  
他喊道:“哼,又做什么诗了!”  
要不是我抢得快,  
这首诗早被他撕了。

---

(注)国音,诗音尸,撕音ㄣ,故可互韵。

## 醉 与 爱

沈玄庐说我的诗“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的两个“过”字，依他的经验，应该改作“里”字。我戏做这首诗答他。

你醉里何尝知酒力？  
你只和衣倒下就睡了。  
你醒来自己笑道，  
“昨晚当真喝醉了！”  
爱里也只是爱，——  
和酒醉很相像的。  
直到你后来追想，  
“哦！爱情原来是这么样的！”

十，一，二七

## 平民学校校歌

（为北京高师平民学校作的。）

靠着两只手，  
拼得一身血汗，  
大家努力做个人，——  
不做工的不配吃饭！

做工即是学，  
求学即是做工：  
大家努力做先锋，  
同做有意识的劳动！

十四，十二

此歌有两种谱，一种是赵元任先生做的，一种是萧友梅先生做的。今将赵先生的谱附在后面。



## 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附萧友梅先生作的谱)

辛亥革命时 杨禹昌 张先培 黄之萌用炸弹炸袁世凯 不成而死 彭家珍炸良弼 成功而死。后来中华民国成立了 民国政府把他们合葬在三贝子公园里 名为“四烈士冢”。冢旁有一座四面的碑台 预备给四烈士每人刻碑的。但只有一面刻着杨烈士的碑 其余三面都无一个字。

十年五月一夜 我在天津 住在青年会里 梦中游四烈士冢 醒时作此歌。

他们是谁？  
三个失败的英雄，  
一个成功的好汉！  
他们的武器：  
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  
干！干！干！

他们干了些什么？  
一弹使奸雄破胆！  
一弹把帝制推翻！  
他们的武器：  
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  
干！干！干！

他们不能咬文嚼字，

他们不肯痛哭流涕，  
他们更不屑长吁短叹！  
他们的武器：  
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  
干！干！干！

他们用不着纪功碑，  
他们用不着墓志铭：  
死文字赞不了不死汉！  
他们的纪功碑：  
炸弹！炸弹！  
他们的墓志铭：  
干！干！干！



## 死 者

为安庆此次被军人刺伤身死的姜高琦作。

他身上受了七处刀伤，  
他微微地一笑，  
什么都完了！  
他那曾经沸过的少年血  
再也不会起波澜了！

我们脱下帽子，  
恭敬这第一个死的。——  
但我们不要忘记：  
请愿而死，究竟是可耻的！

我们后死的人，  
尽可以革命而死！  
尽可以力战而死！  
但我们希望将来  
永没有第二人请愿而死！

我们低下头来，  
哀悼这第一个死的。——  
但我们不要忘记  
请愿而死，究竟是可耻的！



## 双十节的鬼歌

十年了，  
他们又来纪念了！  
他们借我们，  
    出一张红报，  
    做几篇文章；  
    放一天例假，  
    发表一批勋章：  
这就是我们的纪念了！

要脸吗？  
这难道是革命的纪念吗？  
我们那时候，  
    威权也不怕，  
    生命也不顾，  
    监狱作家乡，  
    炸弹底下去：  
肯受这种无耻的纪念吗？

别讨厌了！  
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  
大家合起来，  
    赶掉这群狼，

推翻这乌政府；  
起一个新革命，  
造一个好政府：  
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十,十,四

## 希 望

我从山中来，  
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  
希望开花好。

一日望三回，  
望到花时过；  
急坏看花人，  
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  
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  
祝汝满盆花！

## 晨 星 篇(送叔永、莎菲到南京)

我们去年那夜，  
豁蒙楼上同坐；  
月在钟山顶上，  
照见我们三个。  
我们吹了烛光，  
放进月光满地；  
我们说话不多，  
只觉得许多诗意。

我们做了一首诗，  
——一首没有字的诗，——  
先写着黑暗的夜，  
后写着晨光来迟；  
在那欲去未去的夜色里，  
我们写着几颗小晨星，  
虽没有多大的光明，  
也使那早行的人高兴。

钟山上的月色  
和我们别了一年多了；  
他这回照见你们，  
定要笑我们这一年匆匆过了。

他念着我们的旧诗，  
问道：“你们的晨星呢？  
四百个长夜过去了，  
你们造的光明呢？”

我的朋友们，  
我们要暂时分别了；  
“珍重珍重”的话，  
我也不再说了。——  
在这欲去未去的夜色里，  
努力造几颗小晨星；  
虽没有多大的光明，  
也使那早行的人高兴！

十 十二 八

## 附录：法国集

## 自序

胡适既已自誓将致力于其所谓“活文学”者，乃删定其六年以来所为文言之诗词，写而存之，遂成此集。名之曰去国，断自庚戌也。昔者谭嗣同自名其诗文集曰“三十以前旧学第几种”。今余此集，亦可谓之六年以来所作“死文学”之一种耳。

集中诗词，一以年月编纂，欲稍存文字进退及思想变迁之迹焉尔。

民国五年七月

## 耶稣诞节歌

冬青树上明纤炬 ,冬青树下灌儿女 ,  
高歌颂神歌且舞。朝来阿母含笑语 :  
“ 儿辈驯好神佑汝。灶前悬袜青丝缕。  
灶突神下今夜午 ,朱衣高冠须眉古。  
神之来下不可睹 ,早睡慎毋干神怒。”  
明朝袜中实饧粢 ,有蜡作鼠纸作虎 ,  
夜来一一神所予。明日举家作大酺 ,  
杀鸡大于一岁<sup>穀</sup>。堆盘肴果难悉数。  
食终腹鼓不可俯。欢乐勿忘神之佑 ,  
上帝之子天下主。

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 大雪放歌

任叔永作岁莫杂咏诗，余谓叔永“君每成四诗，当以一诗奉和”。后叔永果以四诗来，皆大佳。其状冬日景物，甚尽而工，非下走所可企及。徒以有宿约不可追悔，因作此歌，呈叔永。

往岁初冬雪载涂，今年圣诞始大雪。  
天工有意弄奇诡，积久迸发势益烈。  
夜深飞屑始叩窗，侵晨积絮可及膝。  
出门四顾喜欲舞，琼瑶十里供大阅。  
小市疏林迷远近，山与天接不可别。  
眼前诸松耐寒岁，虬枝雪压垂欲折。  
窥人松鼠寒可怜，觅食冻雀迹亦绝。  
毳衣老农朝入市，令令瘦马驾长橇。  
道逢相识遥告语：“明年麦子未应劣”。  
路旁欢呼小儿女，冰浆铁屐手提挈。  
昨夜零下二十度，湖面冻合坚可滑。  
客子踏雪来复去，朔风啮肤手皴裂。  
归来烹茶还赋诗，短歌大笑忘日昃。  
开窗相看两不厌，清寒已足消内热。  
百忧一时且弃置，吾辈不可负此日。

二年十二月

## 久雪后大风寒甚作歌

梦中石屋壁欲摇，梦回窗外风怒号，  
澎湃若拥万顷涛。  
侵晨出门冻欲僵，冰风挟雪卷地狂，  
啮肌削面不可当。  
与风寸步相撑支，呼吸梗绝气力微，  
漫漫雪雾行径迷。  
玄冰遮道厚寸许，每虞失足伤折股，  
旋看落帽凌空舞。  
落帽狼狈袒犹可，未能捷足何嫌跛，  
抱头勿令两耳堕。  
入门得暖寒气苏，隔窗看雪如画图，  
背炉安坐还读书。  
明朝日出寒云开，风雪于我何有哉！  
待看雪尽春归来！

三年正月

## 哀希腊歌“ The Isles of Greece ”

### 序

英国诗人裴伦所著。裴伦 George Gordon Byron 生于西历 1788 年 ,死于 1824 年 ,死时才三十六岁 ,而著作等身 ,诗名盖世 ,亦近代文学史上一怪杰也。其平生行事详诸家专传 ,不复述。

此歌凡十六章 ,见裴伦所著长剧《唐浑》Don Juan 中。托为希腊诗人吊古伤今之辞 ,以激励希人爱国之心。其词至慷慨哀怨。《唐浑》一剧 ,读者今已甚寡。特此诗传诵天下。当希腊独立之师之兴也 ,裴伦耻其仅以文字鼓舞希人 ,遂毁家助饷。渡海投独立军自效。未及与战而死。巴尔干半岛之人 ,至今追思之不衰。今希腊已久脱突厥之羁绊。近年以来 ,尤能自振拔 ,为近东大国。虽其文明武功或犹未逮当日斯巴达、雅典之盛 ,然裴伦梦想中独立自主之希腊 ,则已久成事实。惜当年慷慨从军之诗人 ,不及生见之耳。

此诗之入汉文 ,始于梁任公之《新中国未来记》小说。惟任公仅译一、三两章。其后马君武译其全文 ,刊于《新文学》中。后苏曼殊复以五言古诗译之。民国二年 ,吾友张耘来美洲留学 ,携有马苏两家译本。余因得尽读之。颇嫌君武失之讹 ,而曼殊失之晦。讹则失真 ,晦则不达 ,均非善译者也。当时余许张君为重译此诗。久而未能践诺。三年二月一夜 ,以四小时之力 ,译之。既成复改削数月 ,始成此本。更为之注释 ,以便读者。盖诗中屡用史事 ,非注 ,不易领会也。

裴伦在英国文学上 ,仅可称第二流人物。然其在异国之诗名 ,有时竟在萧士比、弥儿敦之上。此不独文以人传也。盖裴伦为诗 ,富于情性气魄 ,而铸词炼句 ,颇失之粗豪。其在原文 ,疵瑕易见。而一经翻译 ,则其词句小疵 ,往往为其深情奇气所掩 ,读者仅见其所长 ,而不觉其所短矣。裴伦诗名之及于世界 ,此亦其一因也。

五年五月十一夜

## —

嗟汝希腊之群岛兮，  
实文教武术之所肇始。  
诗媛沙浮尝咏歌于斯兮，  
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今惟长夏之骄阳兮，  
纷灿烂其如初。  
我徘徊以忧伤兮，  
哀旧烈之无余！

## 二

悠悠兮，我何所思？  
荷马兮阿难。  
慷慨兮歌英雄，  
缠绵兮叙幽欢。  
享盛名于万代兮，  
独岑寂于斯土；  
大声起乎仙岛之西兮，  
何此邦之无语。

## 三

马拉顿后兮山高，  
马拉顿前兮海号。  
哀时词客独来游兮，

犹梦希腊终自主也；  
指波斯京观以为正兮，  
吾安能奴僂以终古也！

#### 四

彼高崖何巉岩兮，  
俯视沙拉米之滨；  
有名王尝踞坐其巅兮，  
临大海而点兵。  
千橈兮照海，  
列舰兮百里。  
朝点兵兮，何纷纷兮，  
日之入兮，无复存兮！

#### 五

往烈兮难追；  
故国兮，汝魂何之？  
侠子之歌，久销歇兮，  
英雄之血，难再热兮，  
古诗人兮，高且洁兮；  
琴荒瑟老，臣精竭兮。

#### 六

虽举族今奴虏兮，  
岂无遗风之犹在？

吾慨慷以悲歌兮，  
耿忧国之魂磊。  
吾惟余赧颜为希人羞兮，  
吾惟有泪为希腊洒。

## 七

徙愧赧曾何益兮，  
嗟雪涕之计拙；  
独不念我先人兮，  
为自由而流血？  
吾欲诉天阍兮，  
还我斯巴达之三百英魂兮！  
尚令百一存兮，  
以再造我瘦马披离之关兮！

## 八

沉沉希腊 犹无声兮；  
惟闻鬼语 作潮鸣兮。  
鬼曰：“但令生者一人起兮，  
吾曹虽死 终阴相尔兮！”  
呜咽兮鬼歌，  
生者之暗兮奈鬼何！

## 九

吾哓哓兮终徒然！

已矣兮何言！  
且为君兮弹别曲，  
注美酒兮盈尊！  
姑坐视突厥之跋扈兮，  
听其宰割吾胞与兮，  
君不闻门外之箫鼓兮，  
且赴此贝凯之舞兮！

## 十

汝犹能霹雳之舞兮，  
霹雳之阵今何许兮？  
舞之靡靡犹不可忘兮，  
奈何独忘阵之堂堂兮？  
独不念先人佉摩之书兮，  
宁以遗汝庸奴兮？

## 十一

怀古兮徒烦冤，  
注美酒兮盈尊！  
一醉兮百忧泯！  
阿难醉兮歌有神。  
阿难盖代诗人兮，  
信尝事暴君兮；  
虽暴君兮，  
犹吾同种之人兮。

## 十二

吾所思兮，  
米尔低兮，  
武且休兮，  
保我自由兮。  
吾抚昔而涕淋浪兮，  
遗风谁其嗣昌？  
诚能再造我家邦兮，  
虽暴主其何伤？

## 十三

注美酒兮盈杯，  
悠悠兮吾怀！  
汤汤兮白阶之岸，  
崔巍兮修里之崖，  
吾陀离之民族兮，  
实肇生于其间；  
或犹有自由之种兮，  
历百劫而未残。

## 十四

法兰之人，乌可托兮，  
其王贪狡，不可度兮。  
所可托兮，希腊之刀；



所可任兮，希腊之豪。  
突厥慄兮，  
拉丁狡兮，  
虽吾盾之坚兮，  
吾何以自全兮？

## 十五

注美酒兮盈杯！  
美人舞兮低徊！  
眼波兮盈盈，  
一顾兮倾城；  
对彼美兮，  
泪下不能已兮；  
子兮子兮，  
胡为生儿为奴婢兮！

## 十六

置我乎须宁之岩兮，  
狎波涛而为伍；  
且徒吟发悲啸兮，  
惟潮声与对话；  
如鸿鹄之逍遥兮，  
将于是焉老死：  
奴隶之国非吾土兮，——  
碎此杯以自矢！

# The Isles of Greece

## I

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  
Where burning Sappho<sup>①</sup> loved and sung ,  
Where grew the arts of war and peace ,  
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sup>②</sup> sprung !  
Eternal summer gilds them yet ,  
But all except the sun is set .

## II

The Scian and the Teian<sup>③</sup> muse ,  
The hero 's harp ,the lover 's lute ,<sup>④</sup>  
Have found the fame your shores refuse ,  
Their place of birth alone is mute  
To sounds which echo further west<sup>⑤</sup>  
Than your sires '“ Islands of the Blest . ”

---

① 沙浮古代诗人。生西历前六百年。

② Delos 地名。Phoebus 日神也。相传日神月神皆生于此。此与日神并举 ,当指月神也。

③ 荷马 Homer 生于 Scios 故曰 scian。阿难 Anacreon 生于 Teos 故曰 Teian。

④ 荷马之诗歌英雄 ,阿难之诗叙儿女 ,实开二大诗派云。

⑤ 神话 ,西海尽头 ,有仙岛 ,神仙居之。此盖用以指西欧诸自由国 ,或专指英伦耳。

## III

The mountains look on Marathon—  
And Marathon looks on the sea ;  
And musing there an hour alone ,  
I dream 'd that Greece might still be free ;  
For standing on the Persians grave ,  
I could not deem myself a slave .<sup>①</sup>

## IV

A King sate on the rocky brow  
Which looks o 'er sea - born Salamis ;  
And ships ,by thousands ,lay below ,  
And men in nations ;—all were his !  
He counted them at break of day—  
And when the sun set ,where were they ?<sup>②</sup>

## V

And where were they ? and where art thou ,  
My country ? on thy voiceless shore

---

① 西历前四百九十年 ,波斯人西侵 ,雅典人大败之于马拉顿。

② 马拉顿之败 ,波人耻之。后十年——480 年——新王 Xerxes 大举征希腊 ,大舰千二百艘 ,小舟三千艘 ,军威之盛 ,为古史所未有。雅典人御之 ,战于沙拉米 ,波师大败 ,失巨舰无算 ,余舰皆遁。明年 ,复为斯巴达援师所败。

The heroic lay is tuneless now—  
The heroic bosom beats no more !  
And must thy lyre so long divine ,  
Degenerate into hands like mine ?

## VI

'Tis something in the dearth of fame ,  
Though link 'd among a fetter 'd race ,  
To feel at least a patriot 's shame ,  
Even as I sing , suffuse my face ;  
For what is left the poet here ?  
For Greeks a blush - for Greece a tear .

## VII

Must we but weep o 'er days more blest ?  
Must we but blush ?—Our fathers bled .  
Earth ! render back from out thy breast  
A remnant of our Spartan dead !  
Of the three hundred grant but three ,  
To make a new Thermopylae !<sup>①</sup>

---

① 瘦马披离 , 关名。西历前四百八十年希腊列国协商以此为列国枢纽。及波斯军来侵 , 斯巴达勇士三百人守此。关破 , 三百人皆死之。

## VIII

What ,silent still and silent all ?

Ah ! no ; —the voices of the dead  
 Sound like a distant torrent 's fall ,  
 And answer " Let one living head ,  
 But one arise , —we come ,we come !"  
 Tis but the living who are dumb .

## IX

In vain—in vain 'strike other chords ;  
 Fill high the cup with Samian wine !  
 Leave battles to the Turkish hordes !  
 And shed the blood of Scio 's vine .<sup>①</sup>  
 Hark ! rising to the ignoble call—  
 How answers each bold Bacchanal !<sup>②</sup>

## X

You have the Pyrrhic dances<sup>③</sup> yet ;  
 Where is the Pyrrhic phalanx gone ?  
 Of two such lessons ,why forget

① 原文第三四句疑指突厥人屠杀鞑靼城事。此城即诗人荷马生长之地也。

② 贝凯之舞者，希腊宗教仪节之一种，巫覡舞祷，男女聚乐，以娱神焉。

③ 霹雳 Pyrrhus 为 Epirus 之王，尝屡立战功，此舞即其所作战阵之乐。

The nobler and the manlier one ?  
You have letters Cadmus<sup>①</sup> gave—  
Think ye he meant them for a slave ?

## XI

Fill high the bowl with Samian wine !  
We will not think of themes like these !  
It made Anacreon 's song divine ;  
He served—but served Polycrates—<sup>②</sup>  
A tyrant ;but our masters then  
Were still at least ,our countrymen .

## XII

The tyrant of the Chersonese  
Was freedom 's best and bravest friend ;  
That tyrant was Miltiades !<sup>③</sup>  
Oh ! that present hour would lend  
Another despot of the kind !  
Such chains as his were sure to bind .<sup>④</sup>

---

① 佉摩者 ,神话相传为腓尼西之王 ,游希腊之梯伯部 ,与龙斗 ,屠龙而拔其齿 ,种之皆成勇士 ,遂为其地之始祖。依摩自腓尼西输入字母 ,遂造希腊文。

② 阿难见任于希王 Polycrates ,古之暴主也。

③ 马拉顿之役 ,米之功最大。此章怀古而叹今之无人也。

④ 按此章及上章皆愤极之词。其时民族主义方大炽 ,故诗人于种族一方面尤再三言之。民权之说 ,几为所掩。读者不可骤谓裴伦初不言民权也。

## XIII

Fill high the bowl with Samian wine !  
On Suli 's rock and Parga 's shore ,  
Exists the remnant of a line  
Such as the Doric<sup>①</sup> mothers bore ;  
And there ,perhaps ,some seed is sown ,  
The Heracleidan blood might own .

## XIV

Trust not for freedom to the Franks ,  
They have a king who buys and sells ,  
In native swords and native ranks ,  
The only hope of courage dwells :  
But Turkish force and Latin fraud ,  
Would break your shield however broad .<sup>②</sup>

## XV

Fill high the bowl with Samian wine !  
Our virgins dance beneath the shade—

---

① 希人分两大族，一为伊俄宁族（Ionians），一为陀离族（Dorians）。陀离族稍后起，起于北方，故有白阶修里云。修里山在西北部，希人独立之役，修里之人最有功云。

② 希腊之谋独立也，始于十九世纪初叶。其时“神圣同盟”之约墨犹未干，欧洲君主相顾色变，以为民权之焰复张矣，故深忌之，或且阴沮尼之，法尤甚焉。此诗所以戒希腊人士也。

I see their glorious black eyes shine ;  
But gazing on each glowing maid ,  
My own the burning tear - drop laves ,  
To think such breasts must suckle slaves .

## XVI

Place me on Sunium 's marbled steep ,  
Where nothing save the waves and I ,  
May hear our mutual murmurs sweep ;  
There , swan - like , let me sing and die :  
A land of slaves shall ne 'er be mine—  
Dash down your cup of Samian wine !



## 自 杀 篇

任叔永有弟季彭，居杭州。壬癸之际，国事糜烂，季彭忧愤不已，遂发狂，一夜潜出，投葛洪井死。叔永时在美洲，追思逝者，乃掇季彭生时所寄书，成一集，而系以诗。有“何堪更发旧书读，肠断脊令风雨声”之句。季彭最后寄诸兄诗，有“原上脊令风雨声”之语，故叔永诗及之。叔永索余题辞集上，遂成此篇，凡长短五章。

三年七月七日

叔永至性人，能作至性语。  
脊令风雨声，使我心愁苦。

我不识贤季，焉能和君诗？  
颇有伤心语，试为君陈之。

叔世多哀音，危国少生望。  
此为恒人言，非吾辈所尚。  
奈何贤哲人，平昔志高抗，  
一朝受挫折，神气遽沮丧？  
下士自放弃，朱楼醉春酿。  
上士羞独醒，一死谢诸妄。  
三閤逮贤季，苦志都可谅。  
其愚亦莫及，感此意惨怆。  
我闻古人言，“艰难惟一死”。

我独不谓然 此欺人语耳。  
盘根与错节 所以见奇士。  
处世如临阵 无勇非孝子。  
虽三北何伤？一战待雪耻。  
杀身岂不易？所志不止此。  
生材必有用 何忍付虫蚁？  
枯杨会生稊 河清或可俟。  
但令一息存 此志未容已。

春秋诛贤者 我以此作歌。  
茹鲠久欲吐 未敢避谴诃。

## 老 树 行

道旁老树吾所思，  
躯干十抱龙髯枝，  
蔼然俯视长林卑。

冬风挟雪卷地起，  
撼树兀兀不可止。  
行人疾走敢仰视？

春回百禽还来归，  
枝头好鸟天籁奇，  
谓卿高唱我和之。

狂风好鸟年年事：——  
既鸟语所不能媚，  
亦不因风易高致。

### 跋《老树行》

这首诗是民国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作的。那时正当中日交涉的时期，我的“非攻主义”很受大家的攻击，故我作了这首诗，略带解嘲之意。这首诗后来又惹起了许多朋友的嘲笑。杏佛和叔永《春日》诗灰字韵一联云：“既柳眼所不能媚，岂大作能燃死灰？”叔永有《芙蓉》诗：“既非看花人能媚，亦不因无人不开。”他们都戏学“胡适之体”，用作笑柄。其实这首诗在《去国集》里，要算

一首好诗 ,不知我当初何以把他忘了。现在我把他补进去 ,并且恭恭敬敬的对他赔一个不是。

九 ,十 ,十五

## 满庭芳

枫翼敲帘 ,榆钱铺地 ,柳棉飞上春衣。落花时节 ,随地乱莺啼。  
枝上红襟软语 ,商量定 ,掠地双飞。何须待 ,销魂杜宇 ,劝我不如  
归 ?

归期今倦数。十年作客 ,已惯天涯。况壑深多瀑 ,湖丽如斯。  
多谢殷勤我友 ,能容我傲骨狂思。频相见 ,微风晚日 ,指点过湖堤。

四年六月十二日

---

(注)红襟者 ,鸟名。英文 Robin ,俗名 Redbreast。

枫翼者 ,枫树子皆有薄翅包之 ,其形似蜻蜓之翅。凡此类之种子 ,如榆之钱 ,枫之翼 ,皆以便随风远颺也。

## 临江仙

隔树溪声细碎。  
迎人鸟唱纷哗。  
共穿幽径趁溪斜。  
我和君拾萼，  
君替我簪花。

更向水滨同坐，  
骄阳有树相遮。  
语深浑不管昏鸦。  
此时君与我，  
何处更容他？

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将去绮色佳 ,叔永以诗赠别。  
作此奉和 ,即以留别。

横滨港外舟待发 ,徜徉我方坐斗室 ,  
柠檬杯空烟卷残 ,忽然人面过眼瞥。  
疑是同学巴县任 ,细看果然慰饥渴。  
扣舷短语难久留 ,惟有相思耿胸臆。  
明年义师起中原 ,遂为神州扫胡羯。  
遥闻同学诸少年 ,乘时建树皆宏达。  
中有我友巴县任 ,翩翩书记大手笔。  
策勋不乐作议员 ,愿得西乞医国术。  
远来就我欢可知。三年卒卒重当别。  
几人八年再同学 ? 况我与君过从密 ,  
往往论文忘晨昃 ,时复议政同哽咽。  
相知益深别更难 ,赠我新诗语真切。  
君期我作玛志尼 ,我祝君为倭斯祿。  
国事今成遍体疮 ,治头治脚俱所急。  
勉之勉之我友任 ! 归来与君同僇力。

四年八月二十九夜

(注) 玛志尼 (Mazzini) ,意大利文学家 ,世所称“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也。

倭斯祿 (Wilhelm Ostwald) ,德国科学大家 ,今犹生存。

## 沁园春·别杨杏佛

将之纽约 杨杏佛以词送行 ,有“ 三稔不相见 ,一笑遇他乡。暗惊狂奴非故 ,收束入名场 ”之句。实则杏佛当日亦狂奴耳。其词又有“ 欲共斯民温饱 ”之语。余既喜吾与杏佛今皆能放弃故我 ,重修学立身 ,又壮其志愿之宏 ,故造此词奉答 ,即以留别。

朔国秋风 ,汝远东来 ,过存老胡。正相看一笑 ,使君与我 ,春申江上 ,两个狂奴。客里相逢 ,殷勤问字 ,不似当年旧酒徒。还相问 :  
“ 岂胸中块垒 ,今尽消乎 ?”

君言 : 是何言欤 ! 祇壮志新来与昔殊。愿乘风役电 ,戡天缩地 ,颇思瓦特 ,不羡公输。户有余糈 ,人无菜色 ,此业何尝属腐儒 ? 吾狂甚 ,欲斯民温饱 ,此意何如 ?”

四年九月二日

---

( 注 )瓦特 James Watt ,即发明汽机者。



## 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

### 一

吾闻子墨子有言：“为义譬如筑墙然。  
能实壤者且实壤，能筑者筑，掀者掀。”<sup>①</sup>  
吾曹谋国亦复尔，待举之事何纷纷。  
所赖人各尽所职，未可责备于一人。  
同学少年识时务，学以致用为本根。  
争言“治病须对症，今之大患弱与贫。  
但祝天生几牛敦，还乞千百客儿文，  
辅以无数爱迭孙，便教国库富且殷，  
更无谁某归无裨。乃练熊黑百万军。  
谁其帅之拿破仑。恢我土宇固我藩，  
百年奇辱一朝翻。”

### 二

凡此群策岂不伟？有人所志不在此。  
即如吾友宣城梅，自言“但愿作文士。  
举世何妨学倍根，我独远慕萧士比。”

① 《耕柱篇》语。“掀”。本作“欣”，依毕沅说改。

梅君少年好文史 ,近更摭拾及欧美。  
 新来为文颇谐诡 ,能令公怒令公喜。  
 昨作檄讨夫已氏 ,傥令见之魄应褫。  
 又能虚心不自是 ,一稿十易犹未已。  
 梅君梅君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 ,  
 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 ,  
 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 ,  
 且复号召二三子 ,鞭笞驱除一车鬼 ,  
 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 ,  
 缩地戡天差可儼。梅君梅君毋自鄙。

### 三

作歌今送梅君行 ,狂言人道臣当烹。  
 我自不吐定不快 ,人言未足为重轻。  
 居东何时游康可 ,为我一吊爱谋生 ,  
 更吊霍桑与索虏 ,此三子者皆峥嵘。  
 应有“烟土披里纯” ,为君奚囊增琼英。

四年九月十七日

(注)此诗凡用外国字十一:牛敦(Newton)英国科学家。客儿文(Kelvin)英国近代科学大家。爱迭孙(Edison)美国发明家。拿破仑(Napoleon)。培根(Bacon)英国哲学家,主戡天之说,又创归纳名学,为科学先导。萧士比(Shakespeare)英国文学巨子。旧译莎士比亚。康可(Concord)地名,去哈佛不远,十九世纪中叶此邦文人所聚也。爱谋生(Emerson)霍桑(Hawthorne)索虏(Thorcan)以上三人,美国文人,亦哲学家,墓皆在康可。“烟土披里纯”Inspiration直译有“神来”之意。梁任公以音译之,又为文论之,见《饮冰室自由书》。

## 相 思

自我与子别 ,于今十日耳。  
奈何十日间 ,两夜梦及子 ?  
前夜梦书来 ,谓无再见时。  
老母日就衰 ,未可远别离。  
昨梦君归来 ,欢喜临江坐。  
语我故乡事 ,故人颇思我。  
吾乃无情人 ,未知爱何似。  
古人说“相思” ,无乃颇类此 ?

# 秋 声

## 序

老子曰：“吾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此三宝者，吾于秋日疏林中尽见之。落叶，慈也。损小己以全宗干，可谓慈矣。松柏需水供至微，故能生水土浇薄之所，秋冬水绝，亦不虞匮乏。人但知其后雕，而莫知后雕之由于能俭也。松柏不与众木争肥壤，而其处天行独最适。则亦所谓“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者也。遂赋之。

出门天地阔，悠然喜秋至。  
疏林发清响，众叶作雨坠。  
山蹊少人迹，积叶不见地。  
枫榆但余枝，槎枒具高致。  
大橡百年老，败叶剩三四。  
诸松傲秋霜，未始有衰态。  
举世随风靡，何汝独苍翠？  
虬枝忽自语，语语生妙籁：  
“天寒地脉枯，万木绝饮饲。  
布根乃一亩，所得大微细。  
本干保已难，枝叶在当弃。  
脱叶以存本，伤哉此高谊。  
吾侪松与柏，颇以俭自励。  
取诸天者廉，天亦不吾废。  
故能老岩石，亦颇耐寒岁，

全躯复全叶 ,不为秋憔悴。”  
我闻诸松言 ,低头起幽思 ,  
举头谢诸松 :与尔勉斯志 !”

五年一月续成去年旧稿

## 秋 柳

但见萧飏万木摧，  
尚余垂柳拂人来。  
西风莫笑柔条弱，  
也向西风舞一回。

此七年前(己酉)旧作也。原序曰：

秋日适野，见万木皆有衰意，而柳以弱质，际兹高秋，独能迎风而舞，意态自如。岂老氏所谓能以弱存者耶。感而赋之。

年来颇历世故，亦稍稍读书，益知老氏柔弱胜刚强之说，证以天行人事，实具妙理。近人争言“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彼所谓适，所谓优，未必即在强暴武力。盖物类处境不齐，但有适不适，不在强不强也。两年以来，兵祸之烈，亘古未有。试问以如许武力，其所成就，究竟何在？又如比利时以弹丸之地，拒无敌之德意志，岂徒无济于事，又大苦彼无罪之民。虽螳臂当车，浅人或慕其能怒，而弱卵击石，仁者必谓为至愚矣。此岂独大违老子齿亡舌存之喻，抑亦孔子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与欤。以是之故，两年以来余往往念及此诗，有时亦为人诵之。以为庚戌以前所作诗词，一一都宜删弃，独此二十八字，或不无可存之价值。遂为改易数字，附写于此，虽谓为去国后所作，可也。

五年七月

## 沁园春·誓诗

更不伤春 ,更不悲秋 ,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 ,花飞也好 ,月圆固好 ,日落何悲 ?我闻之曰 ;“ 从天而颂 ,孰与制天而用之 ?”更安用为苍天歌哭 ,作彼奴为 !

文章革命何疑 !且准备褰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 ,下开百世 ,收他臭腐 ,还我神奇。为大中华 ,造新文学 ,此业吾曹欲让谁 ?诗材料 ,有簇新世界 ,供我驱驰。

五年四月十二日

## 《尝试集》序

钱玄同

1917年10月,适之拿这本《尝试集》第一集给我看。其中所录,都是一年以来适之所作的白话诗。

适之是中国现代第一个提倡白话文学——新文学——的人。我以前看见适之作的一篇“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作诗文不避俗语俗字,现在又看见这本《尝试集》,居然就实行用白话来作诗。我对于适之这样“知”了就“行”的举动,是非常佩服的。

我现在想:中国古人造字的时候,语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因为文字本来是语言的记号,嘴里说这个声音,手下写的就是表这个声音的记号。断没有手下写的记号和嘴里说的声音不相合的。拿“六书”里的“转注”来一看,很可以证明这个道理。像那表“年高”的意义的话,这边叫作 lau,便造个“老”字,那边叫作 khau,便又造个“考”字。同是一个意义,声音小小不同,便造了两个字,可见语言和文字必定一致。因为那边既叫作 khau,要是仍写“老”字,便显不出他的音读和 lau 不同,所以必须别造“考”字。照这样看来,岂非嘴里说的声音和手下写的记号,不能不相合吗?所以我说造字的时候,语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的。

再看《说文》里的“形声”字;正篆和“重文”所从的“声”,尽不在一个韵部里的;汉晋以后所用的字,尽有改变古字的“声”的;又有《说文》里虽有“本字”,而后人因为音读变古,不得不假借别的同音字来替代的,这都是今音与古音不同而字形跟了改变的证据。

至于古语和今语的变迁,更有可以证明的。例如“父”、“母”两



字,古音本读 pu ,mai ,后来音变为 fu ,mu ,把古音的 pu ,mai 完全消灭了,所以未曾别造新字,但是读书虽读 fu ,mu ,讲话却又变为 pa ,ma ,于是在“父”、“母”两字以外,又别造“爸”、“妈”两字来表 pa ,ma 的音,此外如用在句末表商度的“夫”字,古音读 bu ,音变为 fu ,讲话时又变为 ba ,于是就借用“罢”字,用在句末表疑问的“无”字,古音读 mu 音变为 vu ,再变为 u ,讲话时又变为 ma ,就别造“吗”字:——这都可以证明字形一定跟着字音转变的。

照这样看来,汉字的字形,既然跟着字音转变,那便该永远是“言文一致”的了。为什么二千年来语言和文字又相去到这样的远呢?

我想这是有两个缘故。

第一,给那些民贼弄坏的。

那些民贼,最喜欢摆架子,无论什么事情,总要和平民两样,才可以使他那野蛮的体制尊崇起来。像那吃的,穿的,住的,妻妾的等级,仆役的数目,都要定得不近人情,并且决不许他人效法。对于文字,也用这个办法。所以嬴政看上那梟犯的“皇”字和皇帝的“皇”字(“皇”字的古写)上半都从“自”字,便硬把“皇”字改用“罪”字。“朕”字本来和“我”字一样,在周朝,无论什么人自己都可以称“朕”,像那屈平的离骚第二句“朕皇考曰伯庸”。就是一个证据,到了嬴政,又把这“朕”字独占了去,不许他人自称。此外像“宫”字、“玺”字、“钦”字、“御”字之类都不许他人学他那样用。又因为中国国民很有“尊古”的脾气,民贼又利用这一点,作起那什么“制”“诏”“上谕”来,一定要写上几个《尚书》里的字眼,像什么“诞膺天命”“寅绍丕基”之类,好叫那富于奴性的人可以震惊赞叹。于是那些小民贼也从而效尤,定出许多野蛮的款式来,凡是作到文章,尊贵对于卑贱,必须要装出许多妄自尊大看不起人的口吻,卑贱对于尊贵,又必须要装出许多弯腰屈膝胁肩谄笑的口吻。其实这些所谓“尊贵”,所谓“卑贱”的人,当面讲话,究竟彼此也没有什么大分别:

只有作到文章,便可以实行那“骄”“谄”两个字。要是没有那种“骄”“谄”的文章,这些民贼的架子便摆不起来了,所以他们是最反对那质朴的白话文章的。

这种没有道理的办法行得久了,习非成是,大家反以为文章不可不照这样作的,要是有人不照这样作,还要说他不对。这是言文分离的第一个缘故。

第二,给那些文妖弄坏的。

周秦以前的文章,大都是用白话作的。像那《盘庚》、《大诰》,后世读了,虽然觉得“佶屈聱牙”,异常古奥,然而这种文章,实在是当时的白话告示。又像那《尧典》里用“都”“俞”“吁”“咈”等字,和现在的白话文章里用“啊”“呀”“嘎”“哦”“唉”等字有什么分别?《公羊》用齐言,《楚辞》用楚语,和现在的小说里搀入苏州,上海,广东,北京等处的方言有什么分别?还有一层,所用的白话,要是古今有异,那就一定用今语,决不硬嵌古字,强摹古调。像《孟子》里说的“洚水者洪水也”“泄泄犹沓沓也”,这是因为古今语言不同,古人叫“洚水”和“泄泄”,孟轲的时候叫“洪水”和“沓沓”,所以孟轲自己作文章,必用“洪水”和“沓沓”,到了引用古书,虽未便直改原文,可是必须用当时的语言去说明古语。再看李耳,孔皇,墨翟,庄周,孟轲,荀况,韩非这些人的著作,文笔无一相同,都是各人作自己的文章,绝不摹拟别人。所以周秦以前的文章,很有价值。到了西汉,言文已渐分离,然而司马迁作《史记》,采用《尚书》,一定要改去原来的古语,作汉朝人通用的文章。像“庶绩咸熙”改为“众功皆兴”;“鬻庸可乎”改为“顽凶勿用”之类。可知其时言文虽然分离,但是作到文章,仍旧不能和当时的语言相差太远。要是过于古奥的文句,还是不适用的。东汉的王充作《论衡》,其“自纪”篇中有曰“论衡者,论之平也。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又曰“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又曰“经传之文,贤圣文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当言事

时,非务难知,使指闭隐也。”这是表明言文应该一致,什么时代的人便该用什么时代的话。

不料西汉末年,出了一个扬雄,做了文妖的始祖。这个文妖的文章,专门摹拟古人。一部《法言》,看了真叫人恶心。他的辞赋,又是异常雕琢,东汉一代颇受他的影响。到了建安七子连写信札都要装模作样,安上许多浮词。六朝的骈文,满纸堆砌词藻,毫无真实的情感;甚至用了典故来代实事,删割他人的名号去就他的文章对偶。打开《文选》一看,这种拙劣恶滥的文章,触目皆是。直到现在,还有一种妄人说:“文章应该照这样作”“《文选》文章为千古文章之正宗”。这是第一种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

唐朝的韩愈、柳宗元,矫正文选派之弊害,所作的文章,略能近于语言之自然。要是继起的人能够守住韩柳矫弊的意思,渐渐的回到白话路上来,岂不甚好。无如宋朝的欧阳修、苏洵这些人,名为学韩学柳,却不会学韩柳的矫弊,但会学韩柳的句调间架,无论作什么文章,都有一定的腔调。这种可笑的文章,和那《文选》派相比,真如二五和一十,半斤和八两的比例。明清以来,归有光、方苞、姚鼐、曾国藩这些人拼命作韩、柳、欧、苏那些人的奴隶,立了什么“桐城派”的名目,还有什么“义法”的话,闹得乌烟瘴气。全不想想,作文章是为的什么;也不看看,秦汉以前的文章是个什么样子。分明是自己作的,偏要叫作“古文”,但看这个名称,便可知其人一窍不通,毫无常识。那曾国藩说得更妙,他道:“古文无施不宜,但不宜说理耳”。

这真是自画供招,表明这种什么“古文”是毫无价值的文章了。这是第二种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

这两种文妖,是最反对那老实的白话文章的。因为作了白话文章,则第一种文妖便不能搬运他那些垃圾的典故,肉麻的词藻;第二种文妖便不能卖弄他那些可笑的义法,无谓的格律。并且若用白话作文章,那会作文章的人必定渐渐的多起来,这些文妖就失

去了他那会作文章的名贵身分,这是他最不愿意的。

二千年来的文学被民贼和文妖弄坏,固然是很可惜的事。但是民贼和文妖的能力,究竟有限,终不能灭尽白话文学的种子。所以在这二千年中,白话的文学也常常发现:——

论议和记载的文章,像司马迁的《史记》,王充的《论衡》,其中的文章,纵不能断定他纯粹是当时的白话,但必可断定他是近于白话的。此外如王羲之、苏轼、朱熹、王守仁、李贽、郑燮诸人的信札,颇有许多纯粹用白话写的(明朝爱用白话写信的人,很多很多),至于宋明两朝学者的“语录”,纯粹是用白话记的,那更不消说了。

白话诗是更多了。我们简直可以断言:中国的白话诗自从《诗经》起,直到元明的戏曲,是没有间断过的。汉魏六朝的乐府歌谣,都是自由使用他们当时的语言作成的;看他抒情的真挚和造句的自然,实在可以和《诗经》中的《风》诗比美。其他如陶潜的五言诗,李白、杜甫诸人的古体诗,白居易的新乐府,李煜、柳永、辛弃疾、苏轼诸人的词的一部分,邵雍、张九成这些理学先生的诗,关汉卿到李渔诸人的曲,……都是白话诗。

从元朝以后,小说渐渐发达。最有价值的,如施耐庵的《水浒传》,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都是用极自然的白话作的,那是不消说了。其他如吴承恩的《西游记》,李汝珍的《镜花缘》,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类,也不失为旧小说中第二流的佳作;他们也是纯粹用白话作的。

我拿上列的白话杂文,白话诗,白话小说去同那些文妖的著作相比,觉得文妖很是可怜。原来他们表面上虽然好像横行一世,其实他们是毫无支配社会的能力的。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思想没有情感的缘故。你看!司马迁能作《史记》,他们只能作“某公神道碑”“某君墓志铭”;王充能作《论衡》,宋明学者的弟子能记语录,他们只能作“管仲论”“李斯论”;王羲之诸人能写达意的白话信,他们只

能作毫无意思的赠序 ;二千年中许多真文学家能作活泼泼的诗 ,他们只能作无病呻吟的诗 ;施耐庵诸人能作善写人情的小说 ,他们只能作《圣哲画像记》一类的东西。他们这些著作 ,只有科举时代当他八股和试帖诗的参考书读读 ,除此以外 ,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到了现代 ,略知文事的人 ,都不屑去研究他们 ,他们几乎有“ 烟消雾灭 ”的趋势 ;所以我说他们可怜 ,——但是可怜而不足惜的。

有人对我说 :你说白话文学是从前早已有过的 ,那么 ,你们现在提倡白话的文学 ,只是复古 ,并非创新了 ;何以又称为‘ 新文学 ’呢 ?我说 :他这话实在是不对的。我上面所说从前有白话文学 ,不过叙述过去的历史 ,表明以前本有白话文学罢了 ;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新文学就是这从前的白话文学 ,更不是说我们现在就应该学这从前的白话文学。我们都知道 :某时代有某时代的文学。文学里的思想 ,情感 ,乃至材料 ,文字 ,句调 ,都是为时代所支配。粗浅说来 ,如杜甫、白居易叹息天宝以来从军之苦 ,曹雪芹感慨于清初贵族的腐败家庭 ,吴敬梓专事形容康乾间书呆子的议论行为 :——这都是就当时的社会描写的。我们只承认这些书的自身有他们的“ 历史的价值 ” ,决不主张我们今日该去摹拟他们。要是现在的人作诗 ,表面学乐府或学元曲 ,内容也是“ 明妃出塞 ”或“ 待月西厢 ”之类 ;作小说 ,表面学章回体 ,内容也是“ 打虎 ”或“ 杀嫂 ”之类 ,那就和文妖说的什么“ 学韩 ” “ 学杜 ”同一可笑了。

所以我们现在作白话的文学 ,应该自由使用现代的白话 ,——要是再用“ 遮莫 ” “ 颠不刺的 ” “ 兀不的……也么哥 ”之类 ,就和用《诗经》里的“ 载 ”字、“ 言 ”字、“ 式 ”字一样的不对 ,——自由发表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这才是现代的白话文学 ,——才是我们所要提倡的“ 新文学 ”。

适之这本《尝试集》第一集里的白话诗 ,就是用现代的白话达适之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不用古语 ,不抄袭前人诗里说过的话。我以为的确当得起“ 新文学 ”这个名词。

不过我对于适之的诗,也有小小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其中有几首还是用“词”的句调,有几首诗因为被“五言”的字数所拘,似乎不能和语言恰合;至于所用的文字,有几处似乎还嫌太文。所以我于1917年7月2日曾经写信给适之说:——

玄同对于先生之白话诗窃以为未能脱尽文言窠臼。如《月》第一首后二句,是文非话;《月》第三首及《江上》一首,完全是文言;……又先生近作之白话词(《采桑子》),鄙意亦嫌太文。且有韵之文,本有可歌与不可歌二种。寻常所作,自以不可歌者为多。既不可歌,则长短任意,仿古,新创,无所不可。至于可歌之韵文,则所填之字,必须恰合音律,方为合格。词之为物,在宋世本是可歌者,故各有调名。后世音律失传,于是文士按前人所作之字数,平仄,一一照填,而云“调寄某某”。此等填词,实与作不可歌之韵文无异。起古之知音者于九原而示之,恐必有不合音节之字之句,就询填词之本人以此调音节若何,亦必茫然无以为对。玄同之意,以为与其写了“调寄某某”而不知其调,则何如直作不可歌之韵文乎?(按,那时我还未曾和适之见面,所举各诗,都是登在《新青年》里面的。)

10月31日,我又写信给适之说:——

现在我们着手改革的初期,应该尽量用白话去作,才是倘若稍怀顾忌,对于“文”的一部分不能完全舍去,那么,便不免存留旧污,于进行方面,很有阻碍。

11月20日接到适之的复信说:——

先生论吾所作白话诗,以为“未能脱尽文言窠臼”。此等谗言,最不易得。吾于去年(五年)夏秋初作白话诗之时,实力屏文言,不杂一字。如《朋友》《他》《尝试篇》之类皆是。其后忽变易宗旨,以为文言中有许多字尽可输

入白话诗中。故今年所作诗词,往往不避文言。……但是先生 10 月 31 日来书所言,也极有道理。……所以我在北京所作的白话诗,都不用文言了。

……古来作词者,仅有几个人能深知音律。其余的词人,都不能歌。其实词不必可歌。由诗变而为词,乃是中国韵文史上一大革命。五言七言之诗,不合语言之自然,故变而为词。词,旧名“长短句”,其长处正在长短互用,稍近语言之自然耳。即如稼轩词:“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此决非五言七言之诗所能及也。故词与诗之别,并不在一可歌而一不可歌,乃在一近语言之自然而一不近语言之自然也。作词而不能歌之,不足为病。正如唐人绝句大半可歌,然今人不能歌亦不妨作绝句也。

词之重要,在于其为中国韵文添无数近于语言之自然之诗体。此为治文学史者所最不可忽之点。不会填词者,必以为词之字字句句皆有定律,其束缚自由必甚。其实大不然。词之好处,在于调多体多,可以自由选择。工调者,相题而择调,并无不自由也。人或问:“即欲自由,又何必择调?”吾答之曰,凡可传之词调,皆经名家制定,其音节之谐妙,字句之长短,皆有特长之处。吾辈就已成之美调,略施裁剪,便可得绝妙之音节,又何乐而不为乎?

……

然词亦有二短:一、字句终嫌太拘束;二、只可用以达一层或二层意思,至多不过能达三层意思。曲之作,所以救此两弊也。有衬字,则字句不嫌太拘;可成套数则可以作长篇。故词之变为曲,犹诗之变为词,皆所以求近于语言之自然也。最自然者,终莫如长短无定之韵文。元人之小词,即是此类。今日作“诗”(广义言之),似宜注重此

种长短无定之体。然亦不必排斥固有之诗,词,曲诸体。要各随所好,各相题而择体,可矣。

我再复适之说:——

论填词一节,先生最后之结论,也是归到“长短无定之韵文”,是吾二人对于此事,持论全同,可以不必再辩。惟我之不赞成填词,正与先生之主张废律诗同意,无非因其束缚自由耳。先生谓“工词者,相题而择调,并无不自由”。然则工律诗者所作律诗,又何尝不自然?不过未“工”之时,作律诗勉强对对子,填词硬扣字数,硬填平仄,实在觉得劳苦而无谓耳。总而言之,今后当以“白话诗”为正体(此“白话”,是广义的,凡近于语言之自然者皆是。此“诗”,亦是广义的,凡韵文皆是),其他古体之诗,词,曲,偶一为之,固无不可,然不可以为韵文正宗也。

关于这个问题,适之和我的意见,实在没有什么不同。近来适之作的《人力车夫》《一念》和《老鸦》等诗,都用“长短无定”,极自然的句调了。

我自己是不会作诗的人,本不配给《尝试集》作序。所以写了这许多的拉杂话,对于适之作白话诗,没有丝毫可以贡献。不过我也算一个主张白话文学的人,现在看见这本《尝试集》,欢喜赞叹,莫可名状,不免把这点浅陋的意见写将出来,用“抛砖引玉”的办法,希望适之再把高深的话教我。

1918年1月10日 钱玄同 序

(录自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3月初版《尝试集》)



## 《尝试集》自序

我这三年以来做的白话诗若干首，分做两集，总名为《尝试集》。民国六年九月我到北京以前的诗为第一集，以后的诗为第二集。民国五年七月以前，我在美国做的文言诗词删剩若干首，合为《去国集》，印在后面作一个附录。

我的朋友钱玄同曾替《尝试集》做了一篇长序，把应该用白话做文章的道理说得很痛快透切。我现在自己作序，只说我为什么要用白话来做诗。这一段故事，可以算是《尝试集》产生的历史，可以算是我个人主张文学革命的小史。

我做白话文字，起于民国纪元前六年（丙午），那时我替上海《竞业旬报》做了半部章回小说和一些论文，都是用白话做的，到了第二年（丁未），我因脚气病，出学堂养病。病中无事，我天天读古诗，从苏武、李陵直到元好问，单读古体诗，不读律诗。那一年我也做了几篇诗，内中有一篇五百六十字的《游万国赛珍会》和一篇近三百字的《弃父行》，以后我常常做诗，到我往美国时，已做了两百多首诗了。我先前不做律诗，因为我少时不曾学对对子，心里总觉得律诗难做。后来偶然做了一些律诗，觉得律诗原来是最容易做的玩意儿，用来做应酬朋友的诗，再方便也没有了。我初做诗，人都说我像白居易一派。后来我因为要学时髦，也做一番研究杜甫的工夫。但是我读杜诗，只读《石壕吏》《自京赴奉先咏怀》一类的诗，律诗中五律我极爱读，七律中最讨厌《秋兴》一类的诗，常说这些诗文法不能，只有一点空架子。

自民国前六、七年到民国前二年(庚戌),可算是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已有不满意于当时旧文学的趋向了。我近来在一本旧笔记里(名《自胜生随笔》,是丁未年记的)翻出这几条论诗的话:

作诗必使老姬听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读而不能解,亦何故耶?(录《麓堂诗话》)

东坡云:“诗须有为而作”。元遗山云:“纵横正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录《南濠诗话》)

这两条都有密圈,也可见我十六岁时论诗的旨趣了。

民国前二年,我往美国留学。初去的两年,作诗不过两三首,民国成立后,任叔永(鸿隽)、杨杏佛(铨)同来绮色佳(Ithaca),有了做诗的伴当了。集中《文学篇》所说:

明年任与杨,远道来就我。山城风雪夜,枯坐殊未可。烹茶更赋诗,有倡还须和。诗炉久灰冷,从此生新火。

都是实在情形。在绮色佳五年,我虽不专治文学,但也颇读了一些西方文学书籍,无形之中,总受了不少的影响,所以我那几年的诗,胆子已大得多。《去国集》里的《耶稣诞节歌》和《久雪后大风作歌》都带有试验意味。后来做《自杀篇》,完全用分段作法,试验的态度更显明了。《藏晖室札记》第三册有跋《自杀篇》一段,说:

……吾国作诗每不重言外之意,故说理之作极少。

求一扑蒲(Pope)已不可多得,何况华茨活(Wordsworth)贵推(Goethe)与白朗吟(Browning)矣。此篇以吾所持乐观主义入诗。全篇为说理之作,虽不能佳,然途径具在。他日多作之,或有进境耳。(民国三年七月七日)

又跋云:

吾近来作诗,颇能不依人蹊径,亦不专学一家。命意固无从摹仿,即字句形式亦不为古人成法所拘,盖颇能独立矣。(七月八日)

民国四年八月，我作一文论《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文中列举方法几条，还不曾主张用白话代文言。但那时我已明言“文言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又说：“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白话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腊拉丁，非日用之语言，已陈死矣。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如犬字是已死之字，狗字是活字，乘马是死语，骑马是活语，故曰半死文字也”。（《札记》第九册）

四年九月十七夜，我因为自己要到纽约进哥伦比亚大学，梅觐庄（光迪）要到康桥进哈佛大学，故作一首长诗送觐庄。诗中有一段说：

梅君梅君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箠，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

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戡天差可拟。梅君梅君毋自鄙！

原诗共四百二十字，全篇用了十一个外国字的译音。不料这十一个外国字就惹出了几年的笔战！任叔永把这些外国字连缀起来，做了一首游戏诗送我：

牛敦，爱迭孙，培根，客尔文，索虏与霍桑，“烟土披里纯”：

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我接到这诗，在火车上依韵和了一首，寄给叔永诸人：

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

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愿共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梅觐庄误会我“作诗如作文”的意思，写信来辩论。他说：

……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自有诗  
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足下为诗界革命  
家，改良诗之文字则可；若仅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  
命，谓之改良，则不可也。……以其太易易也。

这封信逼我把诗界革命的方法表示出来。我的答书不曾留稿。今  
抄答叔永书一段如下：

适以为今日欲救旧文学之弊，先从涤除“文胜”之弊  
入手。今人之诗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耳。其中实无  
物可言。其病根在于重形式而去精神，在于以文胜质。  
诗界革命当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求  
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故意避之。三者皆  
以质救文之弊也。……觐庄所论“诗之文字”与“文之文  
字”之别，亦不尽当。即如白香山诗：“城云臣按六典书，  
任土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奴！”李  
义山诗：“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此诸  
例所用文字，是“诗之文字”乎？抑“文之文字”乎？又如  
适赠足下诗：“国事今成遍体疮，治头治脚俱所急。”此中  
字字皆觐庄所谓“文之文字”。……可知“诗之文字”原不  
异“文之文字”，正如诗之文法原不异文之文法也。（五年  
二月二日）

“诗之文字”一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有许多人只认  
风花雪月，蛾眉，朱颜，银汉，玉容，等字是“诗之文字”，做成的诗读  
起来字字是诗！仔细分析起来，一点意思也没有。所以我主张用  
朴实无华的白描工夫，如白居易的《道州民》，如黄庭坚的《题莲华  
寺》，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咏怀》。这类的诗，诗味在骨子里，在质  
不在文！没有骨子的滥调诗人决不能做这类的诗。所以我的第一  
条件便是“言之有物”。因为注重之点在言中的“物”，故不问所用

的文字是诗的文字还是文的文字。瞿庄认做“仅移文之文字于诗”，所以错了。

这一次的争论是民国四年到五年春间的事。那时影响我个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说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这个观念是我的文学革命论的基本理论。《札记》第十册有五年四月五日夜所记一段如下：

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赋变而为无韵之骈文，古诗变而为律诗，三大革命也。诗之变而为词，四大革命也。词之变而为曲，为剧本，五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文亦遭几许革命矣。自孔子至于秦、汉，中国文体始臻完备。六朝之文……亦有可观者。然其时骈俪之体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见长，文法遂衰。韩退之所以称“文起八代之衰”者，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此一革命也。……宋人谈哲理者，深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语录体兴焉。语录体者，禅门所尝用，以俚语说理纪言。……此亦一大革命也。至元人之小说，此体始臻极盛。……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极盛。其时之词也，曲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现。倘此革命潮流（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进化可也），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遭前后七子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已成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可无疑也。但丁之创意大利文学，却叟辈之创英文学，路得之创德文学，未足独有千古矣。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席，而“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

……文学革命何可更缓耶！何可更缓耶！

过了几天。我填了一首“沁园春”词，题目就叫做《誓诗》，其实是一篇文学革命宣言书：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

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擎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四月十三日）

这首词上半所攻击的是中国文学“无病而呻”的恶习惯。我是主张乐观，主张进取的人，故极力攻击这种卑弱的根性。下半首是《去国集》的尾声，是《尝试集》的先声。

以下要说发生《尝试集》的近因了。

五年七月十二日，任叔永寄我一首《泛湖即事》诗。这首诗里有“言棹轻楫，以涤烦疴”和“猜谜赌胜，载笑载言”等句，我回他的信说：

……诗中“言棹轻楫”之言字及“载笑载言”之载字，皆系死字。又如“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两句，上句为二十世纪之活字，下句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称也。（七月十六日）

不料这几句话触怒了一位旁观的朋友。那时梅觐庄在绮色佳过夏，见了我给叔永的信，他写信来痛驳我道：

足下所自矜为文学革命真谛者，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于叔永诗中，稍古之字，皆所不取，以为非“二十世纪之活字”。……夫文字革新须洗去旧日腔套，务去陈言，固矣。然此非尽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语白话代之之谓也。……足下以俗语白话为向来文学上不用之

字 骤以入文 ,似觉新奇而美 ,实则无永久价值。因其向未经美术家锻炼 ,徒诿诸愚夫愚妇无美术观念者之口 ,历世相传 ,愈趋愈下 ,鄙俚乃不可言。足下得之 ,乃矜矜自喜 ,炫为创获 ,异矣。如足下之言 ,则人间材智 ,选择 ,教育 ,诸事皆无足算 ,而村农伧父皆足为诗人美术家矣。

甚至非洲黑蛮 ,南洋土人 ,其言文无分者 ,最有诗人美术家之资格矣。

至于无所谓“活文学” ,亦与足下前此言之。……文字者 ,世界上最守旧之物也。……足下乃视改革文字如是之易乎？

觀庄这封信不但完全误解我的主张 ,并且说了一些没有道理的话 ,故我做了一首一千多字的白话游戏诗答他。这首诗虽是游戏诗 ,也有几段庄重的议论。如第二段说：

文字没有雅俗 ,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 ,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 ,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 ,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 ,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 ,何必纷纷胡闹？

至于古人叫字 ,今人叫号 ;古人悬梁 ,今人上吊；

古名虽未必不佳 ,今名又何尝不妙？

至于古人乘舆 ,今人坐轿 ;古人加冠束帻 ,今人但知戴帽；

若必叫帽作巾 ,叫轿作舆 ,岂非张冠李戴 ,认虎作豹？

又如第五段说：

今我苦口晓舌 ,算来却是为何？

正要求今日的文学大家 ,

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 ,拿来锻炼 ,拿来琢磨 ,拿来作

文演说 ,作曲作歌 :——

出几个白话的器俄 和几个白话的东坡 ,

那不是“ 活文学 ”是什么 ?

那不是“ 活文学 ”是什么 ?

这一段全是后来用白话作实地试验的意思。

这首白话游戏诗是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做的 ,一半是朋友游戏 ,一半是有意试做白话诗。不料梅、任两位都大不以为然。颢庄来信大骂我 ,他说 :

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 ,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 ! 盖今之西洋诗界 ,若足下之张革命旗者 ,亦数不鲜。最著者有所谓 Futurism ,Imagism ,Free Verse ,及各种 Decadent movements in Literature and in Arts。大约皆足下俗话诗之流亚 ,皆喜以“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自豪 ,皆喜诡立名字 ,号召徒众 ,以眩世人之耳目 ,而已则从中得名士头衔以去焉。

信尾又有两段添入的话 :

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 ,诗文则不可。今之欧美狂澜横流 ,所谓“ 新潮流 ”“ 新潮流 ”者 ,耳已闻之熟矣。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七月二十四日)

这封信颇使我不心服 ,因为我主张的文学革命 ,只是就中国今日文学的现状立论 ,和欧美的文学新潮流并没有关系 ;有时借镜于西洋文学史也不过举出三四百年前欧洲各国产生“ 国语的文学 ”的历史 ,因为中国今日国语文学的需要很像欧洲当日的情形 ,我们研究他们成绩 ,也许使我们减少一点守旧性 ,增添一点勇气。颢庄硬派我一个“ 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 ”的罪名 ,我如何能心服呢 ?

叔永来信说 :



足下此次试验之结果,乃完全失败是也。……要之,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如凡白话皆可为诗,则吾国之京调、高腔,何一非诗?乌乎适之!吾人今日言文学革命,乃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非特文言白话之争而已。吾尝默省吾国今日文学界,即以诗论,其老者,如郑苏盦、陈伯严辈,其人头脑已死,只可让其与古人同朽腐。其幼者,如南社一流人,淫滥委琐,亦去文学千里而遥。旷观国内,如吾侪欲以文学自命者,舍自倡一种高美芳洁之文学,更无吾侪侧身之地。以足下高才有为,何为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植美卉于荆棘之中哉?……唯以此(白话)作诗,则仆期期以为不可。……今且假令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者皆高腔京调,而陶谢李杜之流,将永不复见于神州,则足下之功又何若哉?(七月二十四夜)

甄庄说:“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叔永说:“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这是我最不承认的。我答叔永信中说:

……白话入诗,古人用之者多矣。(此下举放翁诗及山谷稼轩词为例,)……总之,白话之能不能作诗,此一问题全待吾辈解决。解决之法,不在乞怜古人,谓古之所无,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辈实地试验。一次“完全失败”,何妨再来?若一次失败,便“期期以为不可”,此岂科学的精神所许乎?

这一段乃是我的“文学的实验主义”。我三年来所做的文学事业只不过是实行这个主义。

答叔永书很长,我且再抄一段:

……今且用足下之字句以述吾梦想中之文学革命曰:

一、文学革命的手段：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敢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皆能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

二、文学革命的目的：要令白话京调高腔之中产出几许陶谢李杜。

三、今日决用不着“陶谢李杜的”陶谢李杜。若陶谢李杜生于今日仍作陶谢李杜当日之诗，则决不能更有当日的价值与影响。何也？时代不同也。

四、吾辈生于今日，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的五经、两汉、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的《水浒》、《西游》文字。与其作似陶似谢似李似杜的诗，不如作不似陶谢不似李杜的白话诗。与其作一个学这个学那个的郑苏盦、陈伯严，不如作一个实地试验“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胡适之。

……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七月二十六日）

这是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诗词。过了几天，我再答叔永道：

……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学之器也。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作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今尚需人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耳。……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吾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侥幸而有成，则辟除荆

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狂言人道臣当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为重轻。”足下定笑我狂耳。(八月四日)

这时我已开始作白话诗。诗还不曾做得几首,诗集的名字已定下了,那时我想起陆游有一句诗:“尝试成功自古无!”我觉得这个意思恰和我的实验主义反对,故用“尝试”两字作我的白话诗集的名字,要看“尝试”究竟是否可以成功。那时我已打定主意,努力做白话诗的试验,心里只有一点痛苦,就是同志太少了;“须单身匹马而往”,我平时所最敬爱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同去探险。但是我若没有这一班朋友和我打笔墨官司,我也决不会有这样的尝试决心。庄子说得好:“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我至今回想当时和那班朋友,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的乐趣,觉得那真是人生最不容易有的幸福。我对于文学革命的一切见解,所以能结晶成一种有系统的主张,全都是同这一班朋友切磋讨论的结果。五年八月十九日我写信答朱经农(经)中有一段说:

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

- 一、不用典,
- 二、不用陈套语,
- 三、不讲对仗,
- 四、不避俗字俗语,
- 五、须讲求文法。以上为形式的一方面。
- 六、不作无病之呻吟,
- 七、不摹仿古人,须语语有个我在,
- 八、须言之有物。以上为精神(内容)的一方面。

这八条,后来成为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六年一月一日出版),即此一端,便可见朋友讨论的益处了。

我的《尝试集》起于民国五年七月,到民国六年九月我到北京时,已成一小册子了,这一年之中,白话诗的试验室里只有我一个

人。因为没有积极的帮助,故这一年的诗,无论怎样大胆,终不能跳出旧诗的范围。

我初回国时,我的朋友钱玄同说我的诗词“未能脱尽文言窠臼”,又说“嫌太文了!”美洲的朋友嫌“太俗”的诗,北京的朋友嫌“太文”了!这话我初听了很觉得奇怪。后来平心一想,这话真是不错。我在美洲做的《尝试集》,实在不过是能勉强实行了《文学改良刍议》里面的八个条件,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这些诗的大缺点就是仍旧用五言七言的句法。句法太整齐了,就不合语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长补短的毛病,不能不时时牺牲白话的字和白话的文法,来牵就五七言的句法。音节一层,也受很大的影响:第一,整齐划一的音节没有变化,实在无味;第二,没有自然的音节,不能跟着诗料随时变化。因此,我到北京以后所做的诗,认定一个主义:若要做真正的白话诗,若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这种主张,可叫做“诗体的大解放”。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的文学可能性。《尝试集》第二编中的诗虽不能处处做到这个理想的目的,但大致都想朝着这个目的做去。这是第二集和第一集的不同之处。

以上说《尝试集》发生的历史。现在且说我为什么赶紧印行这本白话诗集。我的第一个理由是因为这一年以来白话散文虽然传播得很快很远,但是大多数的人对于白话诗仍旧很怀疑,还有许多人不但怀疑,简直持反对的态度。因此,我觉得这个时候有一两种白话韵文的集子出来,也许可以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也许可以供赞成和反对的人作一种参考的材料。第二,我实地试验白话诗已经三年了,我很想把这三年试验的结果供献给国内的文人,作为我的试验报告。我很盼望有人把我试验的结果,仔细研究一番,加上平心静气的批评,使我也可以知道这种试验究竟有没有成绩,用的试

验方法 ,究竟有没有错误。第三 ,无论试验的成绩如何 ,我觉得我的《尝试集》至少有一件事可以供献给大家的。这一件可供献的事就是这本诗所代表的“实验的精神”。我们这一班人的文学革命论所以同别人不同 ,全在这一点试验的态度。

近来稍稍明白事理的人 ,都觉得中国文学有改革的必要。即如我的朋友任叔永他也说 :“乌乎 ! 适之 ! 吾人今日言文学革命 , 乃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外 , 非特文言白话之争而已。”甚至于南社的柳亚子也要高谈文学革命。但是他们的文学革命论只提出一种空荡荡的目的 ,不能有一种具体进行的计划。他们都说文学革命决不是形式上的革命 ,决不是文言白话的问题。等到人问他们所主张的革命“大道”是什么 ,他们可回答不出了。这种没有具体计划的革命 ,——无论是政治的是文学的——决不能发生什么效果。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 ,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我们认定“死文字定不能产生活文学” ,故我们主张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 ,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 ,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度 :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 ,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我们认定白话实在有文学的可能 ,实在是新文学的唯一利器。但是国内大多数人都都不肯承认这话 ,——他们最不肯承认的 ,就是白话可作韵文的唯一利器。我们对于这种怀疑 ,这种反对 ,没有别的法子可以对付 ,只有一个法子 ,就是科学家的试验方法。科学家遇着一个未经实地证明的理论 ,只可认他做一个假设 ,须等到实地试验之后 ,方才用试验的结果来批评那个假设的价值。我们主张白话可以做诗 ,因为未经大家承认 ,只可说是一个假设的理论。我们这三年来 ,只是想把这个假设用来做种种实地试验 ,——做五言诗 ,做七言诗 ,做严格的词 ,做极不整齐的长短句 ,做有韵诗 ,做无韵诗 ,做种种音节上的试验 ,——要看白话是不是可以做好诗 ,要

看白话诗是不是比文言诗要更好一点。这是我们这班白话诗人的“实验的精神”。

我这本集子里的诗,不问诗的价值如何,总都可以代表这点实验的精神。这两年来,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诸位,美国有陈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话诗。白话诗的试验室里的试验家渐渐多起来了。但是大多数的文人仍旧不敢轻易“尝试”。他们永不来尝试尝试,如何能判断白话诗的问题呢?耶稣说得好:“收获是很好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所以我大胆把这本《尝试集》印出来,要想把这本集子所代表的“实验的精神”贡献给全国的文人,请他们大家都来尝试尝试。

我且引我的《尝试篇》作这篇长序的结论:

“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请看药圣尝百草,尝了一味又一味。又如名医试丹药,何嫌六百零六次?莫想小试便成功,那有这样容易事!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即使如此已无愧,即此失败便足记。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枉费。

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大家都来尝试!

八年八月一日 胡适

(录自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0 年 3 月初版《尝试集》)

## 《尝试集》再版自序

这一点小小的“尝试”，居然能有再版的荣幸，我不能不感谢读这书的人的大度和热心。

近来我颇自己思想，究竟这本小册子有没有再版的需要？现在我决意再版了，我的理由是：

第一，这本书含有点历史的兴趣，我做白话诗，比较的可算最早，但是我的诗变化最迟缓。从第一编的《尝试篇》、《赠朱经农》、《中秋》，……等诗变到第二编的《威权》、《应该》、《关不住了》、《乐观》、《上山》，等诗；从那些很接近旧诗的诗变到很自由的新诗，——这一个过渡时期在我的诗里最容易看得出。第一编的诗，除了《蝴蝶》和《他》两首之外，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做到后来的《朋友篇》，简直又可以进《去国集》了！第二编的诗，虽然打破了五言七言的整齐句法，虽然改成长短不整齐的句子，但是初做的几首，如《一念》、《鸽子》、《新婚杂诗》、《四月二十五夜》，都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在这个时期里，《老鸦》与《老洛伯》要算是例外的了。就是七年十二月的《奔丧到家》诗的前半首，还只是半阙添字的《沁园春》词。故这个时期，——六年秋天到七年年底——还只是一个自由变化的词调时期。自此以后，我的诗方才渐渐做到“新诗”的地位。《关不住了》一首是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应该》一首，用一个人的“独语”（Monologue）写三个人的境地，是一种创体，古诗中只有《上山采蘼芜》略像这个体裁。以前的《你莫忘记》也是一个人的“独语”，但没有《应该》那样曲折的心理情境。自此以后，《威权》、《乐观》、《上山》、《周岁》、《一颗遭劫的星》，

都极自由 ,极自然 ,可算得我自己的“新诗”进化的最高一步。如初版最末一首的第一段 :

热极了 !

更没有一点风 !

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 ,

动也不动一动 !

这才是我久想做到的“白话诗”。我现在回头看我两年前做的诗 ,如 :

到如今 ,待双双登堂拜母 ,

只剩得荒草孤坟 ,斜阳凄楚 !

最伤心 ,不堪重听 ,灯前人诉 ,阿母临终语 !

真如同隔世了 !

不料居然有一种守旧的批评家一面夸奖《尝试集》第一编的诗 ,一面嘲笑第二编的诗 ;说《中秋》、《江上》、《寒江》 ,……等诗是诗 ,第二编最后的一些诗不是诗 ;又说 “胡适之上了钱玄同的当 ,全国少年又上了胡适之的当 !”我看了这种议论 ,自然想起一个很相类的故事。当梁任公先生的《新民丛报》最风行的时候 ,国中守旧的古文家谁肯承认这种文字是“文章” ?后来白话文学的主张发生了 ,那班守旧党忽然异口同声的说道 :“文字改革到了梁任公的文章就很好了 ,尽够了。何必去学白话文呢 ?白话文如何算得文学呢 ?”好在我的朋友康白情和别位新诗人的诗体变的比我更快 ,他们的无韵“自由诗”已很能成立。大概不久就有人要说 :“诗的改革到了胡适之的《乐观》、《上山》、《一颗遭劫的星》 ,也尽够了。何必又去学康白情的《江南》和周启明的《小河》呢 ?”……只怕那时我自己又已上康白情的当了 !

以上说的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 ,我这几十首诗代表二、三十种音节上的试验 ,也许可以供新诗人的参考。第一编的诗全是旧诗的音节 ,自不须讨论。这



二编里,我最初爱用词曲的音节,例如《鸽子》一首,竟完全是词。《新婚杂诗》的(二)(五)也是如此。直到去年四月,我做《送叔永回四川》诗的第二段:

记得江楼同远眺,云影渡江来,惊起江头鸥鸟?

记得江边石上,同坐看潮回,浪声遮断人笑?

记得那回同访友,日冷风横,林里陪他听松啸!

这三句都是从三种词调里出来的。这种音节,未尝没有好处,如上文引的三句,懂音节的自然觉得有一种悲音含在写景里面。我有时又想用双声叠韵的法子来帮助音节的谐婉。例如: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这一句里有九个双声。又如:

看他们三三两两,

回环来往,夷犹如意!

三 环,叠韵(今韵);两 往,叠韵;夷 意,叠韵;回 环,双声;犹 意,双声;如字读我们徽州音,也与夷 犹 意,为双声。又如:

我望遍天边,寻不见一点半点光明;

回转头来,

只有你在那杨柳高头,依旧亮晶晶地!

遍 天 边,见 点 半 点,七字叠韵;头 有 柳 头 旧,五字叠韵;遍 边 半,双声;你 那,双声;有 杨 依,双声。又如:

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

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

这诗近来引起了许多讨论,我且借这个机会说明几句。这诗原稿本是:

也想不相思,免得相思苦。

几度细思量,情愿相思苦!(原稿曾载《每周评论》二

十九号)

原稿用的“免得”确比改稿“可免”好。朱执信先生论此诗,说“免”

字太响又太重要了，前面不当加一个同样响亮的“可”字。这话极是，我当初也这样想，第二句第一个“免”字与第四句第二个“愿”字为韵，本来也可以的，古诗“文王曰咨，咨汝殷商”，便是一例。但我后来又怕读的人不懂得这种用韵法，故勉强把“免”字移为第二个字，不料还有人说这首诗没有韵！我现在索性在此处更正，改用“免得”罢。至于第三句由“度”字，何以后来我自己改为“次”呢？我因为几，细，思，三字都是“齐齿”音，故加一个“齐齿”的次字，使四个字都成“齐齿”音；况且这四个字之中，下三字的声母又都是“齿头”一类：故“几次细思量”一句，读起来使人不能不发生一种“咬紧牙齿忍痛”的感觉。这是一种音节上的大胆试验。姜白石的词有：

暝入西山，渐唤我一叶夷犹乘兴。

“一叶夷犹”四字使人不能不发生在平湖上荡船；“画桡不点明镜”的感觉，也是用这个法子。

这种双声叠韵的玩意儿，偶然顺手拈来，未尝不能增加音节上的美感。如康白情的“滴滴琴泉，听听他滴的是什么调子？”十四个字里有十二个双声，故音节非常谐美。但这种玩意儿，只可以偶然遇着，不可以强求：偶然遇着了，略改一两个字，——如康君这一句，原稿作“试听”，后改为“听听”，——是可以的。若去勉强做作，便不是做诗了。唐宋诗人做的双声诗和叠韵诗，都只是游戏，不是做诗。

所以我极赞成朱执信先生说的“诗的音节是不能独立的”。这话的意思是说：诗的音节是不能离开诗的意思而独立的。例如《生查子》词的正格是：

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

下半阙也是如此。但宋人词：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第一句与第五句都不合正格，但我们读这词，并不觉得他不合音节，这是因为他依着词意的自然音节的缘故。又如我的《生查子》词，第七、八两句是：

从来没见过他，梦也如何做？

第七句也不合正格，但读起来也不见得音节不好。这也是因为他是依着意思的自然音节的。

所以朱君的话可换过来说：“诗的音节必须顺着诗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再换一句说：“凡能充分表现诗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的，便是诗的最好音节。”古人叫做“天籁”的，译成白话，便是“自然音节”。我初做诗以来，经过了十几年“冥行索涂”的苦况，又因旧文学的习惯太深，故不容易打破旧诗词的圈套，最近这两三年，玩过了多少种的音节试验，方才渐渐有点近于自然的趋势。如《关不住了》的第三段：

一屋里都是太阳光，  
这时候爱情有点醉了，  
他说：“我是关不住的，  
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

又如：

雪消了，  
枯叶被春风吹跑了。

又如：

热极了！  
更没有一点风！  
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  
动也不动一动！

又如：

上面果然是平坦的路，  
有好看的野花，  
有遮阴的老树。

但是我可倦了，  
衣服都被汗湿遍了，  
两条腿都软了。

我在树下睡倒，  
闻着那扑鼻的草香，  
便昏昏沉沉的睡了一觉。

这种诗的音节，不是五七言旧诗的音节，也不是词的音节，也不是曲的音节，乃是“白话诗”的音节。

以上说的是第二个理由。

我因为这两个理由，所以敢把《尝试集》再版。

有人说：“你这篇再版自序又犯了你们徽州人说的‘戏台里喝彩’的毛病，你自己说你自己那几首诗好，那几首诗不好，未免太不谦虚了”。这话说的也有理。但我自己也有不得已的苦心。我本来想让看戏的人自己去评判。但这四个月以来，看戏的人喝的彩很有使我自己难为情的，我自己觉得唱工做工都不佳的地方，他们偏要大声喝彩，我自己觉得真正“卖力气”的地方，却只有三四个真正会听戏的人叫一两声好！我唱我的戏，本可以不管戏台下喝彩的是非。我只怕那些乱喝彩的看官把我的坏处认做我的好处，拿去咀嚼仿做，那我就真贻害无穷，真对不住列位看官的热心了！因此，我老着面孔，自己指出那几首诗是旧诗的变相，那几首诗是词曲的变相，那几首诗是纯粹的白话新诗，我刻诗的目的本来是要“请大家都来尝试”。但是我曾说过，尝试的结果“告人此路不通”。

行,可使脚力莫浪费”。这便是我不得不做这篇序的苦心。“戏台里喝彩”是很难为情的事,但是有时候,戏台里的人,实在有忍不住喝彩的心境,请列位看官不要见笑。

总结一句话,我自己承认《老鸦》、《老洛伯》、《你莫忘记》、《关不住了》、《希望》、《应该》、《一颗星儿》、《威权》、《乐观》、《上山》、《周岁》、《一颗遭劫的星》、《许怡荪》、《一笑》——这十四篇是“白话新诗”。其余的,也还有几首可读的诗,两三首可读的词,但不是真正白话的新诗。

这书初写定时,全靠我的朋友章洛声替我抄写定,付印后又全靠他细心校对几遍。这书初版没有一个错字,全是他的恩惠。我借这个机会很诚恳的谢谢他。

民国九年八月四日 胡适序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梅庵

这半年以来,我做的诗很少。现在选了六首,加在再版里。

适 九,八,十五

(录自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0 年 9 月再版《尝试集》)

# 尝试后集

## 题 辞

《尝试集》是民国九年(1920)三月出版的。十年再版后,我稍有增删。十一年(1922)三月《尝试集》四版,我又有增删,共存《尝试集》四十八首,附《去国集》十五首。

民国四十一年(1952)九月,我检点民国十一年以来残存的诗稿,留下这几十首,作为《尝试后集》的“初选”。

适 之

## 大 明 湖

哪里有大明湖！  
我只看见无数小湖田，  
无数芦堤，  
把一片好湖光  
划分的七零八落！

这里缺少一座百尺高楼，  
让游人把眼界放宽，  
超过这许多芦堤柳岸，  
打破这种种此疆彼界，  
依然还我一个大明湖。

十一 , 十 , 十五



## 回 向

“回向”是《华严经》里一个重要观念。民国十一年十月二十日，我从山东回北京，火车上读晋译《华严经》的《回向品》，作此解。

他从大风雨里过来，  
向最高峰上去了。  
山上只有和平，只有美，  
没有压迫人的风和雨了。

他回头望着山脚下，  
想着他风雨中的同伴，  
在那密云遮着的村子里，  
忍受那风雨中的沉暗。

他舍不得离开他们，  
他又讨厌那山下的风和雨。  
“也许还下雹哩，”  
他在山顶上自言自语。

瞧呵，他下山来了，  
向那密云遮处走。  
“管他下雨下雹！  
他们受得，我也能受。”

## 烟 霞 洞

我来正碰着黄梅雨，  
天天在楼上看山雾：  
刚才看白云遮没了玉皇山，  
我回头已不见了楼前的一排大树！

1923

## 秘魔崖月夜

依旧是月圆时，  
依旧是空山，静夜；  
我独自月下归来，——  
这凄凉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  
惊破了空山的寂静。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十二，十二，二十二

## 小 诗

刚忘了昨儿的梦，  
又分明看见梦里那一笑。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中的猫“慢慢地不见，从尾巴尖起，一点一点地没有，一直到头上的笑脸最后没有。那个笑脸留了好一会儿才没有”。（赵元任译本页九二）

十三，一，十五

原有前两行：

坐也坐不下，  
忘又忘不了。

## 江 城 子

翠微山上乱松鸣。  
月凄清，  
伴人行；  
正是黄昏，人影不分明。  
几度半山回首望，——  
天那角，  
一孤星。

时时高唱破昏冥，  
一声声，  
有谁听？  
我自高歌，我自遣哀情。  
记得那回明月夜，  
歌未歇，  
有人迎。

## 鹊桥仙·七夕

疏星几点，  
银河淡淡，  
新月遥遥相照。  
双星仍旧隔银河，  
难道是相逢嫌早？

不须蛛盒，  
不须瓜果，  
不用深深私祷。  
学他一岁一相逢，  
那便是天孙奇巧。

1924年8月，与丁在君同在北戴河

## 多 谢

多谢你能来，  
慰我山中寂寞，  
伴我看山看月，  
过神仙生活。

匆匆离别便经年，  
梦里总相忆。  
人道应该忘了，  
我如何忘得！

十三年

## 译白郎宁的《清晨的分别》

刚转个湾 ,忽然眼前就是海了 ,  
太阳光从山头上射出去 :  
他呢 ,前面一片黄金的大路 ,  
我呢 ,只剩一个空洞洞的世界了。

十四年三月( 1925 )

### Parting at Morning

By Robert Browning

Round the cape of a sudden came the sea ,  
And the sun look 'd over the mountain 's rim :  
And straight was a path of gold for him ,  
And the need of a world of men for me .



## 译白郎宁的《你总有爱我的一天》

你总有爱我的一天！  
我能等着你的爱慢慢地长大。  
你手里提的那把花，  
不也是四月下的种，六月才开的吗？

我如今种下满心窝的种子；  
至少总有一两粒生根发芽，  
开的花是你不要采的，——  
不是爱，也许是一点儿喜欢罢。

我坟上开的一朵紫罗兰，——  
爱的遗迹，——你总会瞧他一眼：  
你那一眼吗？抵得我千般苦恼了。  
死算什么？你总有爱我的一天。

十四年(1925)五月

## You 'll Love Me Yet

By Robert Browning

You 'll love me yet ;— And I can tarry  
Your love 's protracted growing :  
June rear 'd that bunch of flowers you carry ,  
From seeds of April 's sowing.

I plant a heartful now 'some seed  
At least is sure to strike ,  
And yield — what you 'll not pluck indeed .  
Not love , but , may be , like .  
You 'll look at least on love 's remains ,  
A grave 's one violet :  
Your look ?— that pays a thousand pains .  
What 's death ? You 'll love me yet !

## 一个人的话

“忍了好几天的眼泪，  
总没有哭的机会。  
今天好容易没有人了，  
我要哭他一个痛快。”

“满心头的不如意，  
都赶着泪珠儿跑了。  
我又可以舒服几天，  
又可以陪着人们笑了。”

十四年六月二日

## 瓶 花

满插瓶花罢出游。  
莫将攀折为花愁。  
不知烛照香熏看，  
何似风吹雨打休？

范成大《瓶花》二之一

不是怕风吹雨打，  
不是羡烛照香熏。  
只喜欢那折花的人，  
高兴和伊亲近。

花瓣儿纷纷谢了，  
劳伊亲手收存，  
寄与伊心上的人，  
当一篇没有字的书信。

十四年六月六日  
十七年改稿  
赵元任作曲谱

## 译葛德的 Harfenspieler

谁不曾含着眼泪咽他的饭，  
谁不曾中夜叹息，睡了又重起，  
泪汪汪地等候东方的复旦，——  
伟大的神明呵，他不会认识你。

民国十四年八月，徐志摩曾译此诗如下：

谁不曾和着悲哀吞他的饭，  
谁不曾在半夜惊心起坐，  
泪滋滋的，东方的光明等待，——  
他不会认识你，啊，伟大的天父。

我们几个朋友都笑他押的是硃石土音，——饭与待为韵，坐与父为韵，——劝他试改译一本。志摩要我试译，我的译稿大致如上。（“神明”原作“天神”，雷兴先生——Dr. F. Lessing——劝我改“神明”。）志摩看了我的译稿，他又改译一本如下：

谁不曾和着悲泪吞他的饭，  
谁不曾在凄凉的深夜，怆心的，  
独自偎着他的枕衾幽叹，——  
伟大的神明呵，他不认识你。

我在二十七年后，检得这些旧稿，都抄在这里，纪念这个最难忘记的朋友。

葛德此诗出版在 1795 年 , 初见于他的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的第十三章。十一年后( 1806 ) , 拿破仑破灭普鲁士王国 , 普鲁士王后露易沙( Louisa ) 出奔 , 在 Königsberg 的一个小旅馆里避难 , 她感慨当日身受的苦痛 , 脱下金刚钻石戒指 , 把这四行诗写在旅馆的玻璃窗上。

四十一年( 1952 ) 九月十日

## Goethe 's Harfenspieler

Wer nie sein Brot mit Thränen ass ,  
Wer nie die kummervollen Nächte  
Auf seinem Bette weinend sass ,  
Der kennt euch nicht , ihr himmlisch Mächte

## Carlyle 's Translation

Who never ate his bread in sorrow ,  
Who never spent the midnight hours  
Weeping and waiting for the morrow ,  
He knows you not , ye heavenly powers .

## 也是微云

也是微云，  
也是微云过后月光明。  
只不见去年的游伴，  
也没有当日的心情。

不愿勾起相思，  
不敢出门看月。  
偏偏月进窗来，  
害我相思一夜。

似是十四年稿，赵元任作曲谱。

## 生 疏

多谢寄来书，  
装着千分情意。  
只有一分不满，  
带些微客气。

十年万里的分离，  
生疏也难怪。  
只我开缄欢喜，  
故态依然在。

十六年



## 素    斐

梦中见你的面，  
一忽儿就惊觉了。  
觉来终不忍开眼，——  
明知梦境不会重到了。

“留这只鸡，等爸爸来，  
爸爸今天要上山来了。……”  
那天晚上我赶到时，  
你已死去两三回了。

病院里，那天晚上，  
我刚说出“大夫”两个字，  
你那一声怪叫，  
至今还在我耳朵边直刺。

今天梦里的病容，  
那晚上的一声怪叫，  
素斐，不要让我忘了，  
永永留作人间苦痛的记号。

十六年二月五日，在美洲，  
梦见亡女，醒来悲痛，作此诗。

## 旧梦

山下绿丛中，  
瞥见飞檐一角，  
惊起当年旧梦，  
泪向心头落。

隔山遥唱旧时歌，  
声苦没人懂。——  
我不是高歌，  
只是重温旧梦。

十六年(1927)七月四日

## 陶渊明和他的五柳

当年有个陶渊明，  
不爱性命只贪酒；  
骨硬不能深折腰，  
弃官归来空两手。  
瓮中无米琴无弦，  
老妻娇儿赤脚走。  
先生高吟自嘲讽，  
笑指门前五株柳；  
“看他风里尽低昂，  
这样腰肢我没有！”

十七年四月九夜在庐山归宗寺

## 拟中国科学社的社歌

我们不崇拜自然，  
他是个刁钻古怪。  
我们要捶他煮他，  
要使他听我们指派。

我们叫电气推车，  
我们叫以太送信，——  
把自然的秘密揭开，  
好叫他来服事我们人。

我们唱天行有常，  
我们唱致知穷理。  
不怕他真理无穷，  
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十八年一月作。赵元任作曲谱。

十九年北平社友会庆祝本社  
十五周年纪念会第一次试唱。

## 拟中国科学社的社歌

北平社友会本社十五年周年纪念庆祝会第一次试唱  
北平十九年廿五日

胡 适拟词

赵元任拟调

## 三年不见他(十八年一月重到北大)

三年不见他，  
就自信能把他忘了。  
今天又看见他，  
这久冷的心又发狂了。

我终夜不成眠，  
萦想着他的愁病衰老。  
刚闭上了一双倦眼，  
又只见他庄严曼妙。

我欢喜醒来，  
眼里还噙着两滴欢喜的泪，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总是这样叫人牵记！”

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我十五年六月离开北京，由西伯利亚到欧洲。十六年一月从英国到美国。十六年五月回国，在上海租屋暂住。到十八年一月，才回到北方小住。不久又回上海。直到十九年十二月初，才把全家搬回北平。

## 高梦旦先生六十岁生日

他爱想问题，  
从不嫌问题太小。<sup>①</sup>  
圣人立言救世，<sup>②</sup>  
话不多不少。

一生梦想大光明，  
六十不知老。  
这样新鲜世界，  
多活几年好。

1956年8月改第二句 适之  
十八年(1929)三月十六日原稿  
二十年后修改开头两行

---

① 他一生最爱想“小问题”的解决。例如温毓庆、颜任光在交通部时，他们实行的一些小改革，如电报局代翻电报，收译费一成，即是他老人家的建议。又如王云五先生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其中也有他不少的意见。

② 他的侄女君珈常称他为“圣人”。

## 中国公学运动会歌

健儿们 ,大家上前 !  
只一人第一 ,  
要个个争先。  
胜固然可喜 ,  
败也要欣然。  
健儿们 ! 大家上前 !

健儿们 ,大家齐来 !  
全体的光荣 ,  
要我们担戴。  
胜 ,要光荣的胜 ,  
败 ,也要光荣的败。  
健儿们 ,大家齐来 !

十九 四 二十八



## 祝马君武先生五十生日

树蕙滋兰意兴，  
种桃酿蜜先生。  
一点一滴努力，  
满仓满屋收成。  
识路何嫌马老？  
救国终待牛敦。  
活到八十九十，  
桃李尽出公门。

十九,七,十七

报载君武先生于二十九年八月一日病死在桂林。

君武先生曾做中国公学的“总教习”，我考进中国公学，是他出题看卷。入校后，我住的房，同他的房紧对门。我和同住的钟文恢诸人，常去看他。他待学生最好。不久他出国，有留别中国公学同学诗，中有“中国待牛敦”之句。

## 送唐瑛女士扇子

静里细思量，  
毕竟算伊出色，  
经过疏狂豪逸，  
到夷然平实。

许伊诗扇已三年，  
扇样莫嫌旧。  
扇是前年买的，  
诗，今天才有。

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 夜 坐

夜坐听潮声，  
天地一般昏黑。  
只有潮头打岸，  
涌起一层银白。

忽然海上放微光，  
好像月冲云破。  
一点——两点——三点——  
是渔船灯火。

二十 , 八 , 十二 在秦皇岛 , 与丁在君同住

## 十月九夜在西山

许久没有看见星儿这么大，  
也没有觉得他们离我这么近。  
秋风吹过山坡上七八棵白杨，  
在满天星光里做出雨声一阵。

似是二十年二月的残稿

## 怎么好？(为燕树棠先生题冯玉祥先生画的人力车夫)

冯玉祥先生自题诗云：

苦同胞！不拉车，不能饱。  
若拉车，牛马跑，  
得肺病，活不了。  
苦同胞，怎么好！  
君不见，委员们，被鱼翅燕菜吃病了！  
社会如此好不好？

1931.11.15

怎么好？我问你。  
不怕天，不怕地，  
只怕贫穷人短气，  
作牛作马给人骑。

怎么好？有办法。  
赛先生，活菩萨，  
叫以太给咱送信，  
叫电气给咱打杂。

怎么好？并不难。

信科学 ,总好办。  
打倒贫穷打倒天 ,  
换个世界给你看。

二十年( 1931 )十一月二十九日

## 狮子(悼志摩)

狮子<sup>①</sup> 蜷伏在我的背后，  
软绵绵的他总不肯走。  
我正要推他下去，  
忽然想起了死去的朋友。

一只手拍着打呼的猫，  
两滴眼泪湿了衣袖；  
“狮子，你好好的睡罢，——  
你也失掉了一个好朋友。”

二十，十二，四

---

① 狮子是志摩住我家时最喜欢的猫。

读了鹞峰寺的新旧碑记 ,敬题  
小诗 ,呈主人林行规先生

谁创此者？释子深。  
谁中兴此？法家林。  
五百年中事翻覆，  
惟有山水无古今。  
我游此地独心喜。  
佛若有灵亦应尔。  
建刹养僧修四禅，  
不如开山造林福百里。

二十一年( 1932 )八月 偶效黄山谷体



## 戏和周启明打油诗

先生在家像出家，  
虽然弗着傖袈裟。  
能从骨董寻人味，  
不惯拳头打死蛇。  
吃肉应防嚼朋友，  
打油莫待种芝麻。  
想来爱惜绍兴酒，  
邀客高斋吃苦茶。

二十三，一，十七

启明曾说他们的祖父爱说诙谐话。有个朋友受他的恩惠，后来不曾报恩，反成嫌怨。此人死后，周老先生说，夜来梦见此人反穿皮袄来拜，说，今生负恩，来生报答。周老先生说，后来每吃猪肉总不免想到这位朋友。

## 飞行小赞

看尽柳州山，  
看遍桂林山水，  
天上不须半日，  
地上五千里。

古人辛苦学神仙，  
要守百千戒。  
看我不修不炼，  
也腾云无碍。

二十四，一

## 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 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三月，日本军队占据了热河，全国都大震动，从3月初旬到5月中旬，我国的军队在长城一带抗敌作战，曾有过几次很光荣的奋斗，其间如宋哲元部在喜峰口的苦战，如徐庭瑶、关麟征、黄杰所率中央军队在南天门一带十余日的血战，都是天下皆知的，但这种最悲壮的牺牲终于不能抵抗敌人的最新最猛烈的武器，5月12日以后，东路我军全退却了，北路我军苦战三昼夜之后，也退到了密云，5月21、22两日，北平以北的中央军队都奉命退到故都附近集中，22夜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开始与敌方商议停战。

当5月23日的早晨四时，——当我国代表接受了一个城下之盟的早晨，——离北平六十余里的怀柔县附近正开始一场最壮烈的血战，这一战从上午四时直打到下午七时，一千多个中国健儿用他们的血洗去那天的城下之盟的一部分的耻辱。

在怀柔作战的我方军队是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总指挥即是民国十六年以孤军守涿县八十八天的傅作义军队，他们本奉令守张家口，4月29日，他们奉令开到昌平待命增援，命下之日，全军欢呼出发，用每小时二十里的跑步，赶赴阵地，5月1日全部到达昌平，仅走了二十四小时，5月15日第五十九军奉令开到怀柔以西，在怀柔西北高地经石厂至高各庄的线上构筑阵地，17日复奉令用主力在此阵地后方三十余里的半壁店、稷山营的线上构筑主阵地，他们不顾敌军人数两倍的众多，也不顾敌军器械百倍的精利，他们在敌军飞机的侦察轰炸之下，不分昼夜，赶筑他们的阵地，他们决心要在这最后一线的前进阵地上用他们的血染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页。

23日天将明时，敌军用侵华主力的第八师团的铃木旅团及川原旅团的福田支队向怀柔正面攻击，又用铃木旅团的早川联队作大规模的迂回，绕道袭击我军的后方，正面敌军用重野炮三十门，飞机十五架，自晨至午，不断的

轰炸,我方官兵因工事的坚固,士气的镇定,始终保守着高地的阵地,那绕道来袭击的早川联队也被我军拦击,损失很大,我军所埋地雷杀敌也不少,我军的隐蔽工事仅留二寸见方的枪孔,必须等到敌人接近,然后伏枪伏炮齐发,伏兵齐出,用手掷弹投炸,凡敌人的长处,到此都失了效用,敌军无法前进,只能向我高地阵地作极猛烈的轰炸,有一次敌军轰中队攻进我右方的阵地,终被我军奋力迎击,把阵地夺回,我军虽无必胜之念,而人人具必死之心,有全连被敌石炮和飞机集中炸死五分之四,而阵地屹然未动的,有袒臂跳出战壕,肉搏杀敌的,有携带十几个手掷弹,伏在外壕里,一人独力杀敌人几十的。

到了下午,他们接到了北平军分会的命令,因停战协定已定局了,令他们撤退到高丽营后方,但他们正在酣战中势不能遽行撤退,而那个国耻的消息又正使他们格外留恋这一个最后抗敌的机会,直到下午七时,战事渐入沉寂状态,我军才开始向高丽营撤退,敌军也没有追击,次日大阪朝日新闻的从军记者视察我军的高地阵地,电传彼国,曾说:“敌人所筑的俄国式阵地,实有相当的价值;且在坚硬的岩石中掘成良好的战壕,殊令人警叹!”又云:“看他们战壕中的遗尸,其中有不过十六七岁的,也有很像学生的,青年人的热狂可以想见了!”

怀柔这一战,第五十九军战死的官和兵共三百六十七人,受伤的共二百八十四人。

5月31日停战协定在塘沽签字后,第五十九军开至昌平附近集结,凡本军战死官兵未及运回的,都由军部雇本地人民就地掩埋暗树标志,6月,全军奉令开回绥远复员,9月,怀柔日军撤退后,傅军长派人备棺木殓衣,到作战地带,寻得官兵遗体二百零三具,全数运回绥远,绥远人民把他们公葬在城北大青山下,建立抗日战死将士公墓,并且辟为公园,垂为永久的纪念,公墓将成,我因傅作义军长的嘱托,叙述怀柔战役的经过,作为纪念碑文,并作铭曰: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 大青山公墓碑

雾散云开自有时，  
暂时埋没不须悲。  
青山待我重来日，  
大写青山第二碑。

二十四 ,七 ,五

公墓碑刻成建立之后 ,何应钦将军有命令 ,一切抗日的纪念物都应隐藏。  
于是傅作义将军在碑上加一层遮盖 ,上面另刻“ 精灵在兹 ”四大字。

## 哭 丁 在 君

(用元微之别白乐天诗的原韵)

明知一死了百愿，  
无奈余哀欲绝难。  
高谈看月听涛坐，  
从此终生无此欢！

爱憎能作青白眼，  
妩媚不嫌虬怒须。  
捧出心肝待朋友，  
如此风流一代无！

二十五年二月(?)

(附录)丁在君在秦皇岛用元微之别乐天诗寄适之诗：

留君至再君休怪，十日流连别更难。  
从此听涛深夜坐，海天漠漠不成欢。

逢君每觉青来眼，顾我而今白到须。  
此别元知旬日事，小儿女态未能无。

## 无心肝的月亮

我本将心托明月 ,谁知明月照沟渠 !  
——明人小说中有此两句无名的诗

无心肝的月亮照着沟渠 ,  
也照着西山山顶。  
他照着飘摇的杨柳条 ,  
也照着瞌睡的“铺地锦”。<sup>①</sup>

他不懂得你的喜欢 ,  
他也听不见你的长叹。  
孩子 ,他不能为你勾留 ,  
虽然有时候他也吻着你的媚眼。

孩子 ,你要可怜他 ,——  
可怜他跳不出他的轨道。  
你也应该学学他 ,  
看他无牵无挂的多么好。

二十五年 ,五 ,十九

---

<sup>①</sup> “铺地锦”小花名 Portulaca。

## 扔 了？

烦恼竟难逃，——  
还是爱他不爱？  
两鬓疏疏白发，  
担不了相思新债。

低声下气去求他，  
求他扔了我。  
他说：“我唱我的歌，  
管你和也不和！”

二十五年



##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从神户 到东京 道中望富士山

雾鬓云裾绝代姿，  
也能妖艳也能奇。  
忽然全被云遮了，——  
待到云开是几时？——  
待到云开是几时？

七月二十一日 太平洋船上追记

廿六年七月廿三日是高梦旦先生  
周年忌日 ,我在庐山上作此诗  
寄慰君珊、仲洽

九年后我重到庐山，  
山色泉声都还如旧。  
每一个山头 ,每一条瀑布，  
都叫我想念当年同游的老朋友。

他爱看高山大瀑布，  
就如同他爱看像个样子的人。  
他病倒在游三峡上峨眉的途中，  
他不懊悔他那追求不倦的精神。

他不要我们哭他。  
他要我们向前 ,要我们高兴。  
他要我们爬他没有上过的高峰，  
追求他没有见过的奇景。

## 从纽约省会( Albany ) 回纽约市

四百里的赫贞江，  
从容的流下纽约湾，  
恰像我的少年岁月，  
一去了永不回还。

这江上曾有我的诗，  
我的梦，我的工作，我的爱。  
毁灭了的似绿水长流。  
留住了的似青山还在。

1938年4月19日

## 寄给在北平的一个朋友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梦，  
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  
飘萧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醒来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人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1938.8.4 在伦敦

## 追哭徐新六

1938年8月24日上午,新六的飞机被日本驱逐机五架击落,被机关枪扫射,乘客十二人都死了。十日之后,我在瑞士收到他8月23日夜写给我的一封信,是他临死的前夜写的。

拆开信封不忍看,  
信尾写着“八月二十三”!  
密密的两页二十九行字,  
我两次三次读不完。

“此时当一切一切以国家为前提”,  
这是他信里的一句话。  
可怜这封信的墨迹才干,  
他的一切已献给了国家。

我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  
这人世丢了一个最可爱的人。  
“有一日力,尽一日力”,——  
我不敢忘记他的遗训。

二十七年(1938)九月八日  
在瑞士的鲁塞恩(Lucerne)

## 抄新六遗书三篇 题此诗

三书不厌十回读，  
今日重抄泪满巾。  
眼力最高心最细，  
如今何处有斯人！

1938.10.16

## 题在自己的照片上 ,送给陈光甫

略有几茎白发，  
心情已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  
只能拼命向前。

二十七年( 1938 )十月三十一日 在美京

## 一枝箭，一只曲子

我望空中射出了一枝箭，  
射出去就看不见了。  
他飞的那么快，  
谁知道他飞的多么远了？

我向空中唱了一只曲子，  
那歌声四散飘扬了。  
谁也不会知道，  
他飘到天的那一方了。

过了许久许久的时间，  
我找着了那枝箭，  
钉在一棵老橡树高头，  
箭杆儿还没有断。

那只曲子，我也找着了，——  
说破了倒也不希奇，——  
那只曲子，从头到尾，  
记在一个朋友的心坎儿里。



## The Arrow and the Song

By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I SHOT an arrow into the air.  
It fell to earth , I know not where ;  
For , so swiftly it flew , the sight  
Could not follow it in it 's flight.

I breathed a song into the air ,  
It fell to earth , I know not where ;  
For who has sight so keen and strong  
That it can follow the flight of song ?

Long , long afterward , in an oak  
I found the arrow , still unbroke ;  
And the song , from beginning to end ,  
I found again in the heart of a friend.

这是美国诗人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的一首小诗，题为 The Arrow and the Song 原为三节，我把第三节分做两节，比较明白一点。

这诗不算是朗菲罗的好诗，但是第三节人多爱念。我十几岁时在中国公学念这首诗，就想译他。那时候我还写古文，总觉得翻译不容易。今夜试用白话，稍稍改换原诗文字，译出后还觉得不很满意。

## 谈谈“胡适之体”的诗

今年1月到上海,才知道南方谈文艺的朋友有所谓“胡适之体新诗”的讨论。发起这个讨论的是陈子展先生,他主张“胡适之体可以说是新诗的一条新路”。后来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听说是反对的居多。

这真使我“受宠若惊”了!我这十四年来差不多没有发表什么新诗,有时候,偶然写了一两首,或者寄给朋友看看,或者送给办杂志的朋友去填空白,从来没有收集过。我总觉得新诗的运动已有许多新诗人在那儿努力了,用不着我这“缠过脚的女人”去参加了。所以这十四年来,我自己只做自己的诗,好和歹我自己知道,我从不希望别人学我的诗,正如我不希望我自己学别人的诗一样。我万想不到陈子展先生会提出“胡适之体”来讨论,使我又无端挨了不少的骂。

挨骂是小事,子展先生的好意是我应该感谢的。他说:

胡先生呵,你不要说“提倡有心,创造无力”。我很希望你仍旧拿出先驱者的精神,在新诗上创造一种“胡适之体”。这在你的前途上打算似乎不失为一条路,在新诗运动上也不妨做一条路,——许多路中的一条路。便是失败,也可以告诉无数的来者“此路不通”!(《申报·文艺周刊》第六期)

使我感觉兴趣的,是陈子展先生举的“胡适之体”的例子。他举的是我去年在空中写的《飞行小赞》,各报引此诗颇有脱误,我把它抄在下面:

看尽柳州山，  
看遍桂林山水，  
天上不须半日，  
地上五千里。

古人辛苦学神仙，  
要守百千戒。  
看我不修不炼，  
也腾云无碍。

子展先生说：

像《飞行小赞》那样的诗，似乎可说是一条新路。老路没有脱去模仿旧诗词的痕迹，真是好像包细过的脚放大的。新路是只接受了旧诗词的影响，或者说从诗词蜕化出来，好像蚕子已经变成了蛾。即如《飞行小赞》一诗，它的音节好像辛稼轩的一阕小令，却又不像是有意模仿出来的。

其实《飞行小赞》也是用《好事近》词调写的，不过词的规矩是上下两半同韵，我却换了韵脚。我近年爱用这个调子写小诗，因为这个调子最不整齐，颇近于说话的自然；又因为这个调子很简短，必须要最简炼的句子，不许有一点杂凑堆砌，所以是做诗的很好训练。我向来喜欢这个调子，偶然用它的格局做我的小诗组织的架子，平仄也不拘，韵脚也可换可不换，句子长短也有时不拘，所以我觉得自由的很。至少我觉得这比勉强凑成一首十四行的“桑籁体”要自由的多了！

以上说的只是要指出，子展先生说的“胡适之体的新路”，虽然是“胡适之体”，而不是“新路”，只是我试走了的一条“老路”。我自己走我的路，不管别人叫它新旧，更不敢冒充“创造”。我曾屡次说过：“工具用的熟了，方法练的细密了，有天才的人自然会‘熟能生

巧’这一点工夫到时的奇巧新花样 ,就叫做创造。’现在有许多人 ,语言文字的工具还不会用 ,就要高谈创造 ,我从来没有这种大胆子。

我借这个机会 ,要说明所谓‘胡适之体’ ,如果真有这个东西 ,当然不仅仅是他采用的什么形式 ,因为他做的诗并不限于《飞行小赞》这一类用词调作架子的小诗。“胡适之体”只是我自己尝试了二十年的一点点小玩意儿。在民国十三年 ,我作我的侄儿胡思永的遗诗序 ,曾说 :

他的诗 ,第一是明白清楚 ,第二是注重意境 ,第三是能剪裁 ,第四是有组织 ,有格式。如果新诗中真有胡适之派 ,这是胡适之的嫡派。

我在十多年之后 ,还觉得这几句话大致是不错的。至少我自己做了二十年的诗 ,时时总想用这几条规律来戒约我自己。平常所谓某人的诗体 ,依我看来 ,总是那个诗人自己长期戒约自己 ,训练自己的结果。所谓‘胡适之体’ ,也只是我自己戒约自己的结果。我做诗的戒约至少有这几条 :

第一 ,说话要明白清楚。古人有‘言近而旨远’的话 ,旨远是意境的问题 ,言近是语言文字的技术问题。一首诗尽可以有寄托 ,但除了寄托之外 ,还需要成一首明白清楚的诗。意旨不嫌深远 ,而言语必须明白清楚。古人讥李义山的诗‘苦恨无人作郑笺’ ,其实看不懂而必须注解的诗 ,都不是好诗 ,只是笨谜而已。我们今日用活的语言作诗 ,若还叫人看不懂 ,岂不应该责备我们自己的技术太笨吗 ?我并不说 ,明白清楚就是好诗 ,我只要说 ,凡是好诗没有不是明白清楚的。至少“胡适之体”的第一条戒律是要人看得懂。

第二 ,用材料要有剪裁。消极的说 ,这就是要删除一切浮词凑句 ,积极的说 ,这就是要抓住最扼要最精采的材料 ,用最简炼的字句表现出来。十几年前 ,我曾写一首诗 ,初稿是三段十二行 ,后来改削成两段八行 ,后来又删成一段四行 :

放也放不下，  
忘也忘不了：——  
刚忘了昨儿的梦，  
又分明看见梦里的一笑。

最后我把前两行删了，只留最后两行。我并不是说，人人都该做小诗。长诗自有长诗的用处。但长诗只是不得不长，并不是把浮词凑句硬堆上去叫它拉长。古人所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才是剪裁的真意义。

第三，意境要平实。意境只是作者对于某种题材的看法。有什么看法，才有什么风格。古人所谓“诗品”，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大概都是指诗的风格。其实风格都是从意境出来；见解是因，风格是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一种意境。“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一种意境。“隔户杨柳弱袅袅，恰似十五女儿腰。谁谓朝来不作意？狂风挽断最长条。”又是一种意境。“人散庙门灯火尽，却寻残梦立多时”，又是一种意境。往往一个人在不同的时代可以有不同的意境：年龄、学问、经验，都可以影响他对于事物的看法。杜甫中年的诗和晚年的诗风格不同，只是因为他的见解变了，意境变了，所以风格也变了。在诗的各种意境之中，我自己总觉得“平实”、“含蓄”、“淡远”的境界是最禁得起咀嚼欣赏的。“平实”只是说平平常常的老实话；“含蓄”只是说话留一点余味；“淡远”只是不说过火的话，不说“浓的化不开”的话，只疏疏淡淡的画几笔。这几种境界都不是多数少年人能赏识的。但我早说过，我只做我自己的诗，不会迎合别人的脾胃。这几种境界都不是容易做到的，我决不敢说我近十多年来的诗都做到了这种境界。不过我颇希望我的诗不至于过分的违反我最喜欢的意境。例如徐志摩死后，我只写了这样一首诗：

狮子（志摩住在我家中时最喜欢的猫）

狮子蜷伏在我的背后，

软绵绵地他总不肯走。  
我正要推他下去，  
忽然想起了死去的朋友。

一只手拍着打呼的猫，  
两滴眼泪湿了衣袖：  
“狮子，你好好的睡罢。  
你也失掉了一个好朋友！”

就在一种强烈的悲哀情感之中，我终觉得这种平淡的说法还是最适宜的。又如我写的《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铭》：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这里固然谈不到“含蓄”，至少还是“平实”的说话。又如我上文引的小诗：

刚忘了昨儿的梦，  
又分明看见梦里的一笑。

这样的写情诗，少年的新诗人当然感觉“不过瘾”。但我自己承认我受的训练只许我说这样平淡的话。

我举这几首诗做例子，并不是说他们都是好诗，只是用他们表示我自己努力的方向。这个方向在《尝试集》的后期已大致决定了。《尝试集》的诗，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是许多选新诗的人不肯选的。那一首的题目是《十一月二十四夜》：

老槐树的影子，  
在月光的地上微晃；  
枣树上还有几个干叶，  
时时做出一种没气力的声响。

西山的秋色几回招我，  
不幸我被我的病拖住了。  
现在他们说快要好了，  
那幽艳的秋天早已过去了。

这诗的意境颇近于我自己欣羨的平实淡远的意境。十五年来，这种境界似乎还不曾得着一般文艺批评家的赏识。但我自己并不因此放弃我在这一个方向的尝试。我在十五年前曾说过：

醉过方知酒浓，  
爱过方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诗，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梦与诗《尝试集》九二页）

所以我近年只做我自己的诗，从不想劝别人做我的诗，也不妄想别人喜欢我的诗。今天我一时高兴，谈谈“胡适之体”是什么，并不是宣传什么教义，只是要报告胡适之至今还在尝试什么小玩意儿而已。

二十五 二 五

（原载 1936 年 2 月《自由评论》第 12 期）